

我一直强调生活高于民主，我倾向于认为情感世界甚至是比政治领域更高的



一个层面。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政治还是情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因为爱，我们

杨恒均 著
南方出版社

黑眼睛看世界

一个民主小贩眼里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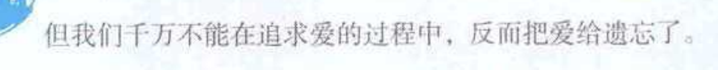


才去为所爱的人追求，但我们千万不能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反而把爱给遗



忘了。我一直强调生活高于民主，我倾向于认为情感世界甚至是比政治领域更高的一

个层面。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政治还是情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因为爱，我们才去为所爱的



人追求，但我们千万不能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反而把爱给遗忘了。

黑眼睛看世界

一 个 民 主 小 贩 眼 里 的 世 界

杨恒均所见所闻所思所言，从心中流出一篇篇优美、睿智、自然、来于生活又富有机锋的博文，被众多网友粉丝昵称为“民主小贩”。好一个吆喝民主、呼唤宪政的“民主小贩”！当今中国不正需要更多的杨恒均，更多的杨恒均式的博文，来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么！

——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以“皇甫平”笔名撰写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文章闻名于世）

相比于制度建设，老杨头更关心活生生的个人对于民主的体验。他不讲尘封的理论，也没有冲锋陷阵的激烈，只是通过自己真实经历过的事实，讲述一些涉及每个人生活的规则和道理，以实现素朴的启蒙，一点一滴，聚沙成塔。

——信力健（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时评专栏作家）

杨恒均博士的文字一向是平和的，能够洞悉人心人性，对于一切关于民主的是非曲直，总是先从自身利益开始谈起，即民主对于“我”自己，对于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像某些专家一样通篇大道理，专业名词一大堆，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大战略。杨博士的文字契合的是每一位普通人的心灵，这就是如此吸引我的原因。

——网友Tassdars

可能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老杨头这样把民主、自由、理想、价值讲得像邻居大爷和你聊家常一般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杨头的文章适合所有迷茫或者麻木没有理想的人阅读！

——网友chunwan

上架建议：时评/畅销



ISBN 978-7-5501-0235-4

定价：28.00元

杨恒均 著

黑眼睛看世界

一个民主小贩眼里的世界

我一直强调生活高于民主，我倾向于认为情感世界甚至是比政治领域更高的一个层面。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政治还是情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因为爱，我们才去为所爱的人追求，但我们千万不能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反而把爱给遗忘了。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眼睛看世界/杨恒均著．—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501-0235-4

Ⅰ.①黑… Ⅱ.①杨… Ⅲ.①时事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2534号

书　　名：黑眼睛看世界
作　　者：杨恒均

出 版 人：赵云鹤
出版发行：南方出版社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
邮　　编：570208
电　　话：（0898）66160822
传　　真：（0898）6616083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690×960　1/16
印　　张：14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1-0235-4
定　　价：28.00元

该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65068303-622

序言

越民主越好吗?

民主的理念很简单，了解西方的民主理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即可，但对民主的认识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有年轻的朋友想听我讲民主，一些学者也愿意和我讨论，可不久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讲民主既不从苏格拉底讲起，也不从托克维尔说起；我不说欧洲，也不爱谈美国。我都是喋喋不休地先谈论我自己的经历，甚至我的家庭，有时简直像个自恋的暴露狂。为什么呢？除了因为我接触民主就是靠实地观察之外，还和我对民主的认识有关：说到底，民主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无论那些理论多么宏大，无论投票的场面让个人显得多么渺小，无论你多么喜欢夸夸其谈，你最好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弱弱地问自己一句：民主对于我，对于我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愿意回答，或者你不懂得如何回答，最好先停下来，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一下民主。

我们当然都知道，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投票选举，就是有完善的制衡机制的制度，可以防止腐败。但这个大道理说多了，人人都听腻了，也就没有人听了。是的，民主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含义，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实际意义。在追求民主时，大家的想法也都会不一样，而我只是从我在其他一些民主国家生活的经历，从个人的角度解释一下

民主。

一位外国朋友对我说，你认为西方就是让老百姓当家做主吗？你看看日本，多少年都是那个党以及少数几个家庭在执政；你看看印度，民主建国多少年了，总理几乎都是出自那几个大的家族与利益集团。就拿美国来说吧，为什么一直是两党执政，始终不能产生第三个党，即便茶党也力有不逮？因为那两个党的本质都一样，始终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利益啊，这些国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我问他，那么，哪一个国家是真正的民主？他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我说，既然没有真正的民主，那“假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了嘛！这个他不反对，随后他说中国其实也可以搞这样的“假民主”……设立一种选举制度，用宪法把私产与人权牢牢地保护起来，把参政的门槛设高一点，让其他的党派与普通人进不来，保证选来选去，还是自己的人……

我们不妨按照他的思路继续思考下去：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七十多年的历史里，最高领导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可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然而，他的对手民主美国，竟然出现了好几起老子当完总统儿子再隔代当总统的事儿。苏联的体制，民怨极大，最终被推翻了，美国的这种制度却成为世界楷模，到处推广。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妙用”，民众在游戏规则（宪法与价值观念）之内选举领导人，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统治者“权为民所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谐相处，该发财的照样发财，该穷的还是一样寻不得机会，可人家不怨天尤人。即便这是“假民主”，也有假民主的妙用。作为统治者，为何不考虑一下？那些没有选票的老百姓总有一天会推翻你，没收你全部财产，甚至威胁到你和你子孙后代的生命。

然而，越民主就越好吗？全民普选真的就是衡量民主发展的终极标准吗？民主和法治究竟以何为先？民主真是万试万灵的妙药吗？未必！

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究其原因，根本上还是国民素质。

很多人抱怨：身边的人只关心个人的经济收入，根本不关心民主。于是有人就带点期待地问：是不是等到经济停滞了，或者出现经济危机，甚至经济体系垮掉了，民主就有希望了？

从历史上来说，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关系确实是太密切了。且不说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后进民主国家的转型几乎都是由经济问题（危机）引发的，就拿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法、美来说，当初促成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也都是经济问题。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统治者日子不好过，要增加税收（英国与法国是王室征税，美国是印花税），结果激起了老百姓和新兴阶层的不满，起而推翻旧制度，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三个现代民主制国家。

如果中国的经济出问题，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民主与民生，两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民生的改善将会促进民主，民主则保障民生长期向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注重人权、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来支撑，不但走不远，还可能会车毁人亡。

所以，在民主与经济的关系上，我是支持民生与民主两不误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一个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与启

蒙运动的地方，在一个洗脑特别严重、不明真相的人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的时候，真正发生了经济危机，或者因经济引起了混乱，不一定会带来民主，反而有可能会倒退回专制，长期的混乱很可能接踵而至。

所以很多有识之士说，我们需要一场启蒙。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了，问题是我们需要一场什么样的启蒙。我想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用什么来启蒙，谁来启蒙，启蒙谁，等等，当然，还可以分得更细。

先说用什么来启蒙。很多人可能想都不想就会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用先进的理论、普世的价值，用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

回想几百年前欧洲的那场启蒙运动，我们不会怀疑，把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的理论拿来启蒙中国人，不但不显得过时，甚至还有些过于“先进”了。这大概也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们一直没有放弃启蒙的努力，却和民众愈走愈远，最后弄得自己比民众还灰心丧气，还更需要启蒙的原因。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用什么来启蒙中国更有效？用理论？讲道理固然不能少，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的大环境，中国今天需要的启蒙不一定要从那些尘封的理论入手，更简单也更容易让大众接受的方式是睁眼看世界，用事实和实践来启蒙。

两百年前欧洲有启蒙运动，中国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启蒙运动，两者都是知识分子们用先进的理论思想启蒙大众。欧洲的启蒙成功了（在一些国家也走了弯路），中国的启蒙不但没有成功，现在还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导致了五四运动，把中国引向了邪路（也许可以用一个“更大的弯路”来形容更恰当）。可见，在中国启蒙和在外国启蒙，虽然拿的理论是一模一样的，结果却大不相同。

今天的知识分子，作品汗牛充栋，可有多少真正能够在思想高度上超过九十年前的那帮启蒙先锋们？有多少走出了欧美启蒙学者的理论框框？

那我们今天还启什么蒙？九十年前那帮人比我们差吗？人家那样折腾，都没有成功，看看我们今天的处境，再折腾九十年，保不准还在原地踏步。

所以，今天的启蒙和九十年前的启蒙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从启蒙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和两百多年前的欧洲以及九十年前的中国有什么不同？不同有很多，但我要强调一点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如果说两百年前（中国九十年前）启蒙前辈们用来启蒙大众的东西还只是停留在理念和理想阶段，现在那些理念已经深入世界各个角落和绝大多数人的内心，当时的理想，也早就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他们在全人类尚在黑暗中徘徊的时候，就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悟出了人类的真谛，照亮 [illegible] 的进的路。要知道，就在他们大谈人权、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时候，当时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真正是自由、民主以及讲究人权的？他们的伟大就在于此。

至于九十年前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我也是要仰视的。但读了他们用来启蒙的作品，再去读西方的启蒙理论，我就感到有些不安了。因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九十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启蒙的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他们只是把西方启蒙的理论照搬到中国，说服大众这个理论能够把我们国家带向光明。问题在于，欧洲人自己悟出的道理，也坚信这个道理，而照搬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是否真认为这些理论可行？如果说有实践支持他们的信念，那就是已经

开始把这些理念变成现实的西方国家把大炮战船开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而正因为这同一个原因，让我们那些启蒙思想家们感到了透顶的绝望，到后来几乎都一夜之间改弦易辙了。理论本来就不是原创，面对复杂的现实的时候本来就显得苍白，加上他们几乎没有启蒙几个普通民众，还有几千年沉积的专制糟粕，到后来，他们把自己都弄“蒙”了头。现在有些知识分子站在九十年后的高度，责怪当时的知识分子怎么突然都向左转，同情苏联。他们忘记了当时相比于苍白的理论，鲜活的历史事实是，五四运动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美国家陷入经济危机，苏联的经济却以比现在中国GDP增长还快的速度在飞速发展。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被美英法三国启蒙最快最彻底的日本和德国，走上了给全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邪路。

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初中国启蒙运动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引进了先进的启蒙理论，却找不到实践和事实来支撑这些理论。

然而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现在还有人试图坐在书房，拿蒙上尘土的两百年前就诞生了的理论来启蒙中国，甚至还绞尽脑汁地去向国人证明哪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哪一个理论更适合中国，我觉得肯定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们不如顺手打开窗户，指着远方和我们的周围，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让我们活在更公平的世界里，让我们少受别人欺负，让我们充分享受到个人自由，让绝对的权力受到限制，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

杨恒均　2009.5.13 悉尼

目　录

社会篇　现实照进梦想

民生篇　动什么，不能动民众

教育篇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

网络力量篇　君要臣死，臣Facebook

政治篇

有病，治病

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

最近收到很多读者通过邮件发来的“命题作文”：某某地方被强制拆迁，机场滞留而不能回来的同胞，深圳颁布了如此荒唐的访民规则，还有福建三位因言获罪的朋友身陷大牢，当然，更多的是关于广州番禺的垃圾焚烧厂……

我出国前到将要受到垃圾焚烧厂影响的丽江花园去看朋友，问一位房产公司的代理如何看垃圾焚烧厂。他无奈地说，政府说没有毒，只不过夏天会有垃圾臭味吹过来，不过，别担心，不只是丽江花园的居民闻得到，估计有三十万居民都会受影响。

我大吃一惊，广州闷热的夏天已经够呛了，再加上垃圾的味道？这是21世纪正在崛起的中国南方最大城市的体味？为什么要在这个地区建立垃圾焚烧厂？我走过世界上那么多城市，有哪一个现代化城市里的三十万居民在夏天到来的时候，会和焚烧垃圾的味道共处？做出此项决策的官员们，你们的嗅觉是不是有毛病？

单单嗅觉出毛病关系还不大，但很显然，他们的眼光也出了问题。就我在广州买房后的短短十年经验来判断，不到十年，番禺垃圾焚烧厂附近的

区域将会成为另一个人口集中的繁华区域，到时受到垃圾臭味袭击的人口就不是三十万或者四十万了。可为什么官员们做决策时如此鼠目寸光？

有人说了，人家眼睛盯着钱袋，不用看到更远。再说，现在建，到时可以再搬迁嘛。是啊，马路上施工过的新土还没有干，就又被扒开了，不停地埋管子，换设备，都是垄断企业一声令下，你不更新设备，断你的气！结果，水泥地和柏油马路几乎被翻熟了，当然，据经济学家说，每“翻”一次马路，GDP也会跟着翻。只是可惜了纳税人的血汗钱。

据说昨天上访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牛的现象，一名警察走进举着各种标语牌的静坐的人群中，要求上访的群众推选五位代表进去见领导。结果，群众异口同声地喊道：你们选五位领导出来见我们！

在邮件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简直彻底震惊了，几乎是目瞪口呆。多牛叉的主人翁精神啊，多牛叉的21世纪的广州啊，多牛叉的公民啊——这种公民，怎么能够咽得下垃圾的臭味？

不过，当晚看到的消息和邮件却令人沮丧。公仆们没有出来见“主人”，口气反而越来越强硬。同时，一封老友的电子邮件证实缺乏政治嗅觉的不是那些领导，而是我；“目光短浅”的也不是决策者，还是我。

朋友在信里告诉我，垃圾焚烧厂涉及一些大人物的利益。和厦门PX事件不同的是，厦门民众有开发商的支持，而番禺这里，本来就是广州比较没有地位的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以前都是农民的地方，更不用说背景了。

这次估计没有办法扭转他们的命运了。有钱的想办法搬家吧，没有钱的可以买口罩，或者适应几年，鼻子也就习惯了。至于说是否有毒，也只有政府说了算，对于我们这些和屁民一个级别的垃圾民来说，只有等到能够“开胸验肺”，或者毒死几个给他们看看，估计才会有效果。

不过到那时，现在的决策者早就赚得盆满钵满地退休了，新上任的也正好想建新的垃圾场，从而重新分配利益……

这么多年来，上访的作用实在是很微弱的。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上访，掌握权力的人真正解决了几个问题？而更可悲的是，那少有的几个被解决的问题，上访者最后得到的，远远少于他们付出的。更不用说，能有几个上访的案子真正推进了规则、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可是，上访却是我们这个神奇国度里民众唯一能够使用的办法，也是一种和写博客一样的“无权者的权力”。盼望开明的皇帝，祈求大公无私的包青天，跪求良心发现的“父母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一直在写这个问题，我不是不去上访，而是想找到更加有效的“上访”办法。我甚至不忍心多看目前的那些上访案子——它们只让我看到了以眼泪和血汗铺成的上访路，以及掌握权力者的傲慢和无耻。

无奈与无力之下，我读书。晚上我读了两本世界哲学、一本小说，另外还读了一本长达1000页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我一直看到深夜两点多钟，仍然不想放下书睡觉。正准备放下书时，又被一句熟悉的话吸引了——在克林顿竞选胜利在握的时候，他的竞选车队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这个小镇子的居民实在太少，团队没有安排在这里停留造势。当车队经过镇子旁的大路时，司机看到路边远远有几十个民众在那里等待，好像是要上访的民众。当时克林顿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车队继续前进，不准备停下来。

就在车队接近人群时，克林顿看到了那些人。他随即命令车队立即停下。然后，他领着夫人希拉里走下车，后面跟着自己的竞选团队，来到几十个美国市民中和他们讨论自己的经济政策和环保、医疗改革，并一一回答民众的提问和质疑……

克林顿为什么要下车？他看到了什么？那些美国民众给他下跪了？写了肉麻的欢迎标语？还是他需要在这里拍下亲民的镜头？都不是，当时稀稀落落的民众只是挺胸抬头，趾高气扬地站在路边，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标语——不，他们写了一个牌子，就像昨天广州上街的市民举的那种牌子，只是美国市民举的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

克林顿看到的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触动了掌权者的神经。于是，他谦卑地走下了竞选大巴，像一个仆人走向自己的主人那样。是的，那些人不是来请求和他见面的"访民"，而是要给他下指示，听他解释自己的政策的"选民"；他们不是来恳求他如何制定政策、惠及民生的，他们是来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管你多忙，你都应该停下来，听听他们的意见，说说你的政策，只有他们满意了，他们才会选你当总统，才会把权力交给你，让你未来八年住在白宫里！

这个故事我其实早就听说过，但第一次看到克林顿自己讲述这个故事，竟然是在我的朋友们在广州上访了一天无果，在我想为中国的访民们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在我准备用自己的博客"上访"的深夜里……

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面前，傲慢了几千年的权力顷刻间低眉顺眼下来；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背后，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解决腐败的绝对权力的唯一办法是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只要不是你手里的选票把他们推到权力的宝座上，即便你已经把自己当公民，把自己当主人了，喊出了连美国公民都喊不出的"你们选五个领导出来见我们"的无与伦比的名句，又能怎么样？

2009.11.23

伊拉克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伊拉克是美国用枪炮在中东穆斯林国家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民主国家，有如二战后建立的日本一样。如果从制度框架上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了，可连美国人都认为伊拉克的民主还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前段时间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到伊拉克转了一圈，回去后很郁闷，对我说，伊拉克的民主真的有问题，“制度”是建立起来了，但好像伊拉克人不太会用，或者他们并不想去用。他们见到美国人就抱怨。他说，同当地精英知识分子见面时，常常要先花半个小时听他们抱怨，一位伊拉克的大学教授一见到他就怒气冲冲地嚷道:“家里的水龙头又没水了，你们美国人怎么搞的？这就是民主？”至于因没有工作、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而抱怨的，比比皆是。这位美国人不解地说，从人均收入的统计数字上看，现在的伊拉克人比十年前富裕了很多，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可抱怨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可这位美国朋友还是坚持认为，这么多抱怨，总让他感到美国人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至少是有些事没有做对。他的话也触动了我的思绪。

本来，在萨达姆时代，恐惧与信仰交织，恐惧变成了信仰。现在，民主在炮声中突然降临，民众正在竭力弄清这个所谓的民主同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在没有恐惧与信仰支撑的时候，当然就会民怨沸腾。可这当然不是伊拉克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伊拉克的民主制度是在一场军事入侵推翻了独裁者萨达姆之后建立起来的。问题是，美国人能够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一个制度（框架），谁能帮伊拉克人建立起新的信仰，以及民主的价值理念？

据我从一些资料上了解，伊拉克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多少人曾经宣扬过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而这些都是美国人带过去的那个“民主框架”必不可少的。而美国本身也没有宣传部门，占领伊拉克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除了用话筒高喊“站住、不许动”之外，就没有使用过“话筒”（宣传与说教）。想到这里，我故意去调侃这位美国朋友。我使用了“宣传”一词，并假装责怪他们推广普世价值的力度不够。

果然，他一听就笑了起来，说美国政府和军队从不搞宣传，也不会搞宣传。“宣传”一词在美国是近似贬义的，他还说我的思维是东方式的。我听后也乐了，我说，美国人现在是不搞宣传，但并不是以前也不搞，你们现在是忘记怎么搞宣传了，例如有对外宣传功能的《美国之音》，也宣传得不怎样。可美国以前并非如此，美国从《独立宣言》到《宪法》，处处在宣传自由、法治的民主价值理念。20世纪的头五十年，美国的学校还非常热衷于爱国主义教育，部分学校的学生每星期上学都要对星条旗敬礼（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党旗敬礼），学校教育中一度出现敏感词（例如和苏联有关的东西都不能随便说出来，有些小学教学用的地图上竟然没有苏联的位置，那块地竟然是一块空白）。在占领日本期间，美国国务院与驻军曾经协同日本相关机构做过一系列的“洗脑”工

作（民主宣传）。

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经过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与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公民社会劫后重生，更趋成熟，政府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推崇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民主取得主导地位，注重程序（程序共和国），对宪法的阐释也越来越偏向价值中立，社会拥抱多元，政府不再扮演引人向善的道德角色。对美国来说，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两百年的公民社会与权利共享的熏陶，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已经融入美国普通人的血液里。基于“政府会犯错，大多数美国人却总能做出正确判断”的理念，政府的最大职能成为保障公民的自由与人权，而公民最大的自由与权利就是对善恶做出自己的判断，包括对政府的评判。普世价值说白了，就是被最多的普通人所拥抱的价值。

这种变化，正好反映在美国占领日本与伊拉克这两个国家的不同做法上。占领日本后，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肃清军国主义流毒（正如它在国内也正在肃清“马克思主义流毒”一样），加上日本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性格，所以，日本的民主框架搭建起来的同时，国民的民主素质也迅速提高。战后的西德也是类似的情况，那里的知识分子对民众进行了大量的民主理念的“洗脑”工作，但这还不足以让欧美人放心，于是他们制定了禁止纳粹分子游行聚会的法律条文——而这一法律在美国不但无法通过，还是违宪的，因为美国人用“自由”来限制与抗衡“民主”。政府在自由的内容方面保持了价值中立。宪法的解释者最高法院认为，既然黑人民权运动分子马丁·路德·金博士可以游行示威，那么，主张种族隔离的新纳粹也同样有游行示威的权利。这种看上去“善恶不分”的制度与法律，为什么没有让美国出现新的纳粹？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众自己“心里有杆秤”，而且，可以用选票显示这杆秤的分量。

据一些学者研究，德国希特勒时代的“民主制度”也挺完善，可这个完善的民主制度选出来的希特勒却成了有史以来最邪恶的魔鬼。为什么？因为当那个民主制度的内核并不是以（尊重个人）自由、人权与法治为价值理念的时候，当民众接受的不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普世价值”的那些价值观的时候，拥有投票权的民众选出一个希特勒，选出一个现代的秦始皇，并不出奇。这也是在“普世价值”出现前，历史上一些大学者并不支持“民主”的主要原因——到这里，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一下现代民主制度的两个含义：以选票、监督机制（例如三权分立）为主的制度设置，以自由（恰恰是限定民主权限的反义词）、人权与法治为核心价值观的“民主理念”。民主只有结合了这两种含义后，才是一个好东西。

同占领日本与西德时不同，到了伊拉克时代，美国已经走出了罗斯福总统用“炉边谈话”来充当美国人导师的时代。总统变成了聆听民意的学生，政府渐趋价值中立，相信有了程序（完善的制度），民众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可美国人却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更没有想到，美国的“制度”（框架）不一定适合伊拉克人。且不说穆斯林宗教中民主理念的成分比较少，仅仅是萨达姆多年的独裁和愚民教育，加上当地知识分子又不给力，一个好的架构如何能够立即发挥应有的作用？

伊拉克的民主制度本身没有出什么问题，问题是伊拉克的公民社会必须从零开始。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伊拉克民众对民主理念的接触甚少。当然，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民众的民主素质才能得到培养与磨炼，可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不需要努力的。即便拿美国这个鄙视“宣传与说教”的国家来说，学校的教育仍然是在树立普世价值

观，而无处不在的媒体与公众言论平台，更是每时每刻都在鞭策、拷问、彰显美国人拥抱的价值理念。

我反对文化决定论，更不认同素质论，但我驳斥素质论更多是针对统治者的。如果认为国民素质与民主何时到来以及到来后的质量没有关系的话，一切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的言行也就都失去了意义。大家都坐在那里等有人把制度建立起来就万事大吉了。抱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妨去研究一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的制度框架，即便拿到现在，也并没有多少漏洞，可运作起来呢？

民主大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每一次运动，某一个民主体制的建立，几乎都有其偶然性，无法预测。与其寄托偶然，寻求“民主离我们还有多远”的答案，不如做一些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做到的小事：传播民主理念。民主制度的建设与民主理念的普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每当多一个人接受了民主的价值理念，我们也就离民主的理想又近了一步。

2011.02.23

美国选民只关心经济议题吗?

打开网站，我看到了头版头条新闻:“美国中期选举今日投票。”打开更多新闻网站，我愣住了，因为是一样的:美国中期选举专题。我急忙打开所有能够找到的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我震惊了——因为几乎所有网站的头版头条都是关于美国中期选举的……

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即便在美国，也没有碰上过所有的新闻网站都把中期选举置于头版头条的新闻事件啊，更不用说和美国关系密切到“同生死、共存亡”的澳大利亚与日本等盟国了。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或地区）来说，几乎每两年都有一次上规模的选举，这已经成为常态。选举也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民主国家选民用来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种工具与手段。虽然世界各地的选举从形式到方法都有所不同，但其本质几乎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外选民对自己亲身参与的选举很重视，却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举漠不关心。而且，对于某个国家和地区的选举，如果你不是当地人，要想真正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容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发生在外国的选举就不重要。对于政府决策者、

智囊、专家学者与国际问题专家，认真研究外国的选举，对决策与研究都大有裨益。可中国大陆出现的各大媒体对海外选举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一下子涵盖了西方国家所有选举的内容，弄得全民都关心另外一个国家（地区）的例行选举，还真是我们所特有的现象。人家世界各国也就那么轻描淡写地报道几次，哪里出现过中国目前这样的疯狂报道？

有人可能会说，关心五都选举是关心两岸关系，关心美国中期选举是关心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关系、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等等。这个没错啊，可两岸关系已经六十多年了，中美关系也一直如此，什么时候值得你如此关心过？什么时候真正影响过你的生活、工作？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关心自己的县委书记是从哪里来的，邻居被拆迁是否合法，所交的税是否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却个个都弄成了外交家与两岸问题专家，实在让人大惑不解。中国一位普通民众对美国两党选举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们所在地区的人大选举，却不明白，美国哪一个党上台，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孩子前途的影响，可能远远不及他们所在地区的一位公安分局副局长（不一定叫“李刚”）的作用。

我当然不是反对大家关心其他国家（地区）的选举，只是觉得这种关心的强度和热度几乎已经超过了选举所在国家的民众。而且，离奇的是，中国民众关心选举，按说应该对选举认识比较全面和深刻吧，可恰恰相反，中国部分民众对选举的理解肯定让当地的选民们都哭笑不得。

不知道是资讯不全，还是被有意误导，我接触的相当部分关心海外选举的网民都对选举存在严重的偏见和误解。一些报道把在民主国家已经融合成生活一部分的选举同民主生活方式剥离开来，单纯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来报道、分析，往往给远离选举的中国读者一个印象：选举就是

瞎折腾，而且，每次选举都伴随着混乱与你争我斗，以及更严重的是，好像每一次选举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增加了更多的问题，由此得出结论，选举制度是有很大瑕疵的。

举个例子，既然选举，就有输有赢，这对于参加过几次选举的民主国家的国民来说，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谁都不当回事了。可是，那些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的人就无法摆脱那个“输”的情结，他们就是闹不明白，西方的每一次选举后，几乎都有将近一半的人在选举中“输掉了”，那种社会能和谐吗？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中国主流的新闻报道中常常出现民意调查——当然，都是海外那些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地区）的民意调查。这些民意调查在他们自身的国家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自然不用我来啰唆和解释。可是一旦拿到根本没有真正的民意调查的地方，就全变味了。我举个今天的例子：中央某台新闻报道，美国一项中期选举前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47%的美国选民关心经济议题，相比而言，只有不到17%的美国人关心美国的民主政治质量。

一位朋友看到这则民意调查后对我说，你看，连美国选民都只关心经济问题，没有多少人关心政治，更少人关心民主……看我沉思不语，他趁热打铁地补充了一句，你老人家该清醒了，中国其实也一样啊，民众关心的是经济问题，是贫富悬殊，是如何更好地瓜分改革开放的大饼，有一口饭吃的民众是不会想到你说的那些民主的……你整天喊民主，有多少人理睬你？

我没有回答他。我想起了几天前的一条新闻标题——“温家宝：调整收入分配群众呼声最强烈”。当初看到这条新闻，我久久不语，还特意收藏了这条新闻。有朋友不理解，问我，这条新闻为什么让你那么沉

思？我说，我想知道，温家宝总理在说这话的时候，是否也像我一样沉思过？他是什么心情？

毫无疑问，温家宝总理发现了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民生，政府对民生的措施（例如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全民医保、降低房价等）也得到超高“民调”的支持……

而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温总理连续七次高呼政治体制改革，要发展民主政治，加强法治建设，保障和扩大民众的自由权利……得到了多少呼声？民众的呼声不高也许可以理解，可连一些知识分子也说起了风凉话：来点实际的，要减少贪污腐败，要缩小贫富差距，要废除……一时之间，给我们的感觉是高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理不务实、不实际了。

真应了一些朋友的结论：民众最关心经济问题，关心他们是否有饭吃，房价是否降低了，关心是否又要加税，等等。中国民众如此，美国民众也一样。自由、民主太遥远了，大家不关心……但是，果真如此吗？

这些人哪里知道，美国中期选举民众关心经济多过政治议题的民调，本身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恰恰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选举本身就是用政治的方式来决定经济问题啊。美国人之所以只关心经济，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利，他们关心经济，关心奥巴马是否增加税收，是否要搞“社会主义”，他们要用政治的手段来决定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前途……如果他们只能提经济建议，然后等到某一个党来决定“从善如流”，你再去民调一下试试看，保准没有一个美国人再关心“经济问题”，而都会只关心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求用投票的方式决定谁来为我们的经济问题做决策！你说，这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美国民众只关心经济问题，其实和中国民众只关心经济问题完全不是一码事。如果没有政治权利作为后盾，如果关心经济问题，只是表达诉求，希望一些好的领导人“从善如流”，会有什么结果？我不排除历史上有一些好皇帝爱民如子，也确实在极短的时间内做了很多民主政府都做不到的好事。但整个历史就摆在那里，足足有几千年了，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只要民众一天不掌握解决“经济问题”的政治权利，他们的“经济问题”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这已经是这个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常识了，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搞不明白？

如果经济问题都可以靠“经济办法”来解决，那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可是，你什么时候看到腐败、贫富差距、不受限制的权力被真正控制住了？这些东西不被真正控制的话，其他的问题又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又能维持多久？如果民生问题是靠民众呼吁，当权者“从善如流”就可以解决的，温总理去“从善如流”就足够了，为何要仰望星空，要大谈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他关注民生的时候，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可当他呼吁那个唯一能够彻底解决民生问题的民主问题时，却鲜有人呼应。他能不郁闷吗？

2010.11.02 香港

CNN为什么那么爱国

对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时的那种片面和偏激，我是早就领教过的。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到美国工作，为了尽快让英语听力过关，我每天趴在电视机前看新闻时事或脱口秀节目。起初，完全能够听懂的几乎只有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因为熟悉新闻背景。说实话，从美国新闻里看到报道中国的新闻和他们的评论，确实很让人不爽。

即便我把批评当己任，自认通过批评自己的国家从而促使其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有时真想找人教训他们一下，可是找谁呢？西方的新闻媒体好像没有主管单位，看看他们如何整天批评甚至攻击总统和政府就知道了。特别是美国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攻击起克林顿夫妇，简直极尽侮辱之能事。

但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美国遭受“9·11”袭击，以及美国先后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期间，美国的各大新闻媒体包括CNN等都显得非常爱国。这真让我迷糊了。因为那时我对美国媒体有了一定的了解，确实知道这些媒体是享受充分独立和自由的，和政府没有什么关

系，更不是什么上下级关系。那么他们怎么都那么爱国起来？好像是白宫统一安排了舆论导向似的。

恰好当时在香港参加文学节，和 CNN 前驻京首席记者芮贝卡（Rebecca Mackinnon）同台主持我的作品研讨会。芮贝卡的父亲是汉学家，她自己会说很流利的中文。芮贝卡在 CNN 工作很久，从 1992 年到 2001 年在 CNN 驻北京站任首席记者。我最早见到她就是在电视屏幕上。她目前在香港大学从事媒体教学工作。以她对 CNN 的了解，我想，我自然会为自己的问题找到最准确或者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在我们一起吃中饭时，我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说，一向对美国政府桀骜不驯的新闻媒体特别是 CNN 怎么一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时就忽然爱起国来，弄得我不得不怀疑白宫有幕后黑手在操纵。我想，芮贝卡一向对美国的媒体拥有比较独立和公正的看法，对中国人民也持友好的态度，她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芮贝卡的回答证实了我的观察没有错。那段时间，CNN 等美国大媒体确实“挺爱国的”。但她纠正我说，政府没有给压力，白宫更不敢干涉，也不会是因为 CNN 的老板是美国人这些原因，主要原因是有一双更加有力的无形的大手在操控。

芮贝卡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向我解释。阿富汗战争期间，她曾经带一个日裔摄影师前往阿富汗前线，为 CNN 做现场报道。她说，作为一名记者，她自然知道该报道些什么。当时，阿富汗战争刚刚打响，很多阿富汗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当时芮贝卡所在的地方（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正是遭受战乱的阿富汗穷人逃乱的必经之地。不断涌来的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的炮火下不得不逃离家园，有的妻离子散。具有敏锐新闻头脑和人文关怀的芮贝卡把这些难民的真实生活都一一拍摄下来，不停地

发回美国CNN总部。

就在芮贝卡以为找到了最好的新闻素材，干得正起劲时，来自CNN的指令下来了。指令要求芮贝卡少报道一些难民——这些被美国炮火赶离家园的难民潮对于美国那场反恐战争来说毕竟是负面的消息。CNN总部希望芮贝卡多报道一些来自阿富汗前线的能够激励美国人爱国心的新闻。CNN总部的理由很简单：观众不爱看那些难民，他们要看反恐的、爱国的。

芮贝卡给我讲完这件事后有些无奈，她说，现在你明白，CNN为什么爱国了吧？不是政府让他们爱，更不是他们那些老板良心发现突然想爱国，而是因为当时美国观众们在"9·11"后正在爱国的兴头上，不喜欢看那些"不爱国的"——如美国发动的战争造成的大量的难民。

当时CNN的对手福克斯新闻（Fox News）狂热地支持布什政府（福克斯一直为难克林顿政府），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CNN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迎合美国主流的爱国激情，CNN不得不放下一些原本够料的新闻，而去报道能够激起美国人爱国热情的东西。

芮贝卡后来离开了CNN，我想这也许就是原因之一，她对于那些超级的国际大媒体持一定的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往往为了收视率，为了广告，为了迎合主流人群而放弃一定的新闻原则。

无论西方媒体如何标榜新闻自由，讲究职业道德，他们充其量还是一个赢利的跨国大公司，他们也有上帝——就是他们的观众，也就是暗中操控他们的那只无形的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抛开自由民主等这些核心价值不表，西方媒体要供奉起来的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广大的西方观众。当然，这和他们崇尚民主自由并不一定矛盾，因为西方的绝大多数观众已经接受了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

有人也许就会问，西方民众不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吗？那这样不就是恶性循环？话是这样说，但并不尽然西方观众如果想看，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节目也是完全可以看到的，据说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是我们的新闻联播，可在美国除了搞情报的以及那些和中国大陆做生意的华人外，很少有人会去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这并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国大陆的朋友大多想看海外的新闻节目却看不到，而西方人可以看到中国的新闻节目却根本没有人愿意看。

虽然说我们的新闻媒体具有中国特色，但不要忘记，新闻媒体本身就是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我们虽然谴责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新闻，却不能把自己孤立于西方媒体之外。西方媒体在舆论监督、民意表达以及报道真相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中国想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想从坐在电视机前的上帝——观众入手，彻底解决问题的话，还应该在自己的新闻媒体的改革上加大力度，学习西方媒体的积极一面。放弃一言堂，放弃只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模式，放弃把新闻当成喉舌，当成说教的工具——如果我们拥有能够得到世界观众信任的媒体，就能够把更公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但如今的现实是，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对西方的歪曲和偏激也是让人胆战心惊的。要知道，我这里不是小看 CNN，以我对他们的理解，他们那个辱华节目的收视率并不怎么样，而且，就算西方观众听见了他的辱华言论，也不会太介意，影响也很有限。而且美国观众有很多选择，甚至有权选择看中央电视台。

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媒体就不同了，基本上是一个声音说话，所以，以前出现过八亿人民激动地关起门来，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解放全世界的奇观。现在当然好多了，但还远远不够。

一个在国内只能听到一种声音的、言论自由还有待发展的国家，不仅在面对世界时会显得过于简单、易于愤怒、容易受伤，而且也是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民众真心尊重的。

2008.04.22

马桶上的政治

上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欧美一些国家搞了一个评比，请各国民众投票选出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结果你一定想不到，既不是原子弹，也不是互联网，连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也名落孙山，排名第一的竟然是——抽水马桶。

一开始我还以为外国人恶搞，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坐到抽水马桶上使劲一想，才“扑通”一下想通了。原来，这抽水马桶带给大家方便时的方便，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我小的时候，每年都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在上厕所时双腿疲软体力不支，或者一不小心，一头栽进大粪池里活活——淹死？我一直认为是臭死的。真的，我不骗你，不相信，你去试一下蹲在一个大化粪池上“方便”的滋味。我向你保证，那比没有互联网和民主自由更让人难以忍受。

我是大学毕业到北京参加工作后才第一次住进了有抽水马桶的房子。对这玩意儿，几乎是一见钟情。从那以后，每天都离不开了，估计如果终老前不是病得卧床不起的话，一定会和它白头偕老的。当然，我情有独钟的还是自家的马桶，那份静谧那份舒坦那份惬意那份浪漫……

你没有从我文章中感觉到特别的味道吗？

不过，由于满世界跑，总不能背着自家的马桶吧，所以，我和世界各地的抽水马桶也结下了一段又一段的奇缘，当然大多是“一夜情”。下面，本人根据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总结一下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旅行时与天下的抽水马桶们相遇的情形……

啊，忍不住了，请问，厕所在哪里啊？……谢谢，然后你推门进入机场、餐厅、商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厕所，推开一个小门……

第一种情形：一股臭气扑鼻而来，你几乎想落荒而逃，找个荒山野岭就地解决。但情况危急，时不我待，你只好憋气吞声，左手捂住鼻子，右手去摁抽水马桶的冲水钮，“哗啦”……你不敢看，但听到它们都被争先恐后地冲走了，你身体却更觉沉重，可你不敢坐下，你得先忍住。于是，你撕下一大条卫生纸或者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消毒纸巾，用两个手指夹住马桶圈，轻轻放下，然后，你开始有条不紊地工作，你先得一点一点擦洗靠背和马桶圈，那上面一定有很多水滴——谢天谢地，但愿是水滴啊。有时马桶圈上有鞋印，你就得使劲擦，擦洗过后，你再次冲水，然后用卫生纸垫在马桶圈上，然后，你小心地慢慢地坐下——注意，一定要小心一点，你不能确定这个马桶的身体是否依然健康，如果禁不起你压，那就成“大事件”了。然后，你总算松了一口气，随即松了更多的气……方便过后，如果你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很有德行的人，你会顺手再按一次冲水钮，然后拍屁股走人。

第二种情况是我到香港和后来到欧美澳等国家碰上的。刚刚出来时对比特别明显，甚至有些不习惯……推开那扇小门，那白白胖胖丰腴得有如杨贵妃似的马桶亭亭玉立地等在那里，一副哀婉可怜、不见不散的样子，简直让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你“呼哧”一屁股坐下来。坐

下后才大吃一惊，竟然忘记先冲水，也没有先清洗一遍啊，不过来不及了，好在朝四周一看，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着习惯性地冲一次水，正因为太干净了，你忘记了当一次义务厕所清洁工……这种前后鲜明的对比让坐下来后的你开始前思后想，这并不是宾馆的厕所啊，好像也没有清洁工啊，而且，国外的清洁工实在太贵，这些公共厕所哪里请得起那么多清洁工呢？

可是，刚进来时就发现这里这么干净，好像刚刚被清洗过似的，怎么回事？蹲了几次，我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是通过偷听和观察隔壁那个抽水马桶上的老外的动静得来的。看起来一进来就坐上马桶的绝不是我一个，但在他们使用完冲水后，我却发现他们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听到卫生纸擦拭的声音，然后再听到一次冲水。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我推门进来看到这么干净的抽水马桶是上一个使用者擦拭过的。

好吧，肯定有人又要说我借题发挥，要用中外如何使用抽水马桶来对比民众的素质、文明与非文明以及民主国家民众的真正无私了。

我现在讲的可是比互联网、原子弹和民主自由更重要的发明——抽水马桶啊，你就不能暂时忘记一下民主自由？你扯到文明、文化和道德的差异上，我能够理解，但我切身的感受却让我觉得这次真的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智商问题。

第一，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你到公共厕所去方便，一定会清洗抽水马桶的（特别是坐圈）。请注意我上面讲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坐下前一定会清洗掉排泄物，特别是马桶圈和后背的“水滴”；第二种情况下，也得清洗一次，但不是进来的时候，而是起来后离开前。两次清洗的劳动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第一种情况，你为大家清洗粪便；第二种情况，你清洗自己留下的污迹。

第二，清洗他人的粪便，你是在做好人好事，比目前公布的雷锋同志的事迹还感人（雷锋没有帮不认识的那么多人清洗过厕所吧）。但你做好事的态度成问题，因为你得捂住鼻子带着厌恶，甚至在心里还咒骂前一个使用者：妈的，吃什么东西，这么臭啊，你去死啊！而第二种情况下，前一位使用者已经替你清洗好他使用过的抽水马桶，你放心使用，使用后你清洗自己用过的，这时，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全身轻松了，而且，你也觉得，自己的污迹总是没有别人的那么难闻。

第三，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当你走进中国大陆一个臭气烘烘的马桶旁，或者坐在澳大利亚一个干干净净的马桶上，你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自私自利的中国人比起来，素质高的外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真是惭愧啊。如果你这样想，我就要嘲笑你的无知了。因为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外国人很自私，他们“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们蹲过马桶后之所以要清洗干净，并不完全是不想把臭味留给下一个“伦敦”者，而是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使用后不清洗，你使用后也不会清洗，大家使用后都不会清洗，那么，下一次他再进入厕所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们每次都能跑回家坐马桶吧），他需要弯下胀得难受的肚子清洗他完全不认识的某个人奇臭无比的大便。

从这方面说，中国人要无私得多。你只要蹲过公共厕所，你都能够在单位学习中自我表扬曰：我学习雷锋好榜样，曾经无数次地清洗过同胞们的大便，义务干过厕所清洁工；你还可以到没有机会出国的同胞们面前自豪地高喊：“在中国，我为国人冲厕所；在国外，老外为我洗马桶，啊！”所以我说，中国和澳大利亚人对待抽水马桶的不同做法，和文化、文明、人种和宗教都没什么关联，也请不要和个人品德联系起来。因为，你很难解释这样一个现象：难道私德不好的中国人竟然喜欢

清理别人留下的大便，为此而不惜把自己的大便留给别人？

不好意思，怎么一和抽水马桶联系起来，人就变得粗俗了？我还是文明一点吧。其实，文明一点的说法也有，而且是约定俗成的，那就是如今的中国人搞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个“互害的社会”。大家都在做一样的工作，但却互相伤害，又并没有获得更大的利益。这里只是举抽水马桶的例子，其实，国人所做的千奇百怪的互相伤害，绝大多数的伤害程度当然要比大便的臭味更强。

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每个人几乎做同样的工作，却形成了一个“互利的社会”。差别如此之巨，原因何在？从抽水马桶的例子，我想你怎么都说不出是文明、人种、道德和宗教的原因吧？在抽水马桶事件中，唯一的区别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如厕之前和之后冲洗厕所，这其实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约定俗成的规则，但会让你感觉到胃部不适的痛楚。

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和发达国家的差别，却没有看到希望。有些人要死要活，感觉到绝望，其实，这问题很容易想通，坐到抽水马桶上就能够想明白的：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也就是规定、游戏规则和制度的不同而已。

好了，如果你一下子没有搞懂我在说什么，去吧，到抽水马桶上去好好想一阵子……

2010.01.13

谁有资格代表总理

11 岁的儿子写了一篇作文，我觉得挺有意思，题目是“历史不断地重复自己”。

“我们常听说‘历史是不断重复的’这句话。我倒希望一些历史还可以再来一次。例如 17 世纪发现澳大利亚的大探险。那种探险精神将会激励我们开始新的冒险。另外一个就是 19 世纪 50 年代的淘金热，带来了经济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最后一个我希望重复的历史是 2000 年的悉尼奥运会。那次奥运会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让世界都看到澳大利亚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我们可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举办奥运会的。

“虽然有些事我们希望不断重复，但也有一些历史是我们不想再看到的。毫无疑问，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被偷的一代’（指澳大利亚白人把土著孩子强行抱走抚养），这是一个悲剧，也是我们的羞耻。但我们也有做对的时候，那就是分别于 1988 年和 2008 年，我们两次对‘被偷的一代’说了对不起。还有一件我不想看到重演的是世界大战，摧毁了那么多土地，死了那么多平民和战士，更不用说，还有更多人失去了

家园。很不幸的是，这些只不过是历史上发生的那么多可怕事情的几个例子而已……我真希望，那些该重复的历史能够重复，那些不应重演的历史，永不再来！”

这篇作文之所以吸引我，首先在于我以前真的很少看他写的作文。这次发现他无所事事的时候，还在电脑上敲打一些未来故事自娱自乐，挺新鲜。其次，看到儿子用如此短小的篇幅写如此宏大的历史主题，而且言简意赅，不像他老爸一样拖泥带水，啰啰唆唆，我挺惊讶的。

儿子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虽然他见到其他澳大利亚人时经常自豪地说自己也是中国人，但除了几句带洋味的中文外，他所受到的教育确实都是澳大利亚的。我们做父母的也并没有对他倾注中国教育。可是我们从这篇作文里看到，他对历史的思索，其实和我所受到的教育差不多，主要就是为自己的历史和国家感到骄傲。可惜的是，澳大利亚历史太短，值得骄傲的还真不多。所以，儿子选择了地理大发现，那代表西方人推崇的“冒险精神”，又选择了 2000 年的悉尼奥运会。儿子说，真希望这些“历史”能够重演，表明了他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的骄傲。注意，这种骄傲不可能是儿子天生的，我可从来没有教育他地理大发现有啥值得骄傲的，欧洲人不发现澳大利亚，说不定我们中国早就把这里占领了，没准我就是今天澳大利亚省的党委书记呢。

同时，儿子在第二段写了他不希望重演的那些历史事件，一是欧洲白人移民澳大利亚时对土著孩子的“偷窃行为”，他们认为土著对孩子不负责任，于是擅自把孩子抢走寄养在白人家庭。澳大利亚历史很短，也没有什么侵略行为，所以没有这方面的可怕记录。但澳大利亚被日本人侵略和占领过，于是儿子选择的第二个不愿意重演的历史事件是“世界大战”。看到这里，我的感觉是什么？

澳大利亚对孩子的历史教育和中国差不多啊。如果我的儿子没有出国，老师布置一篇“历史有时会重演”的作文，他回来让我指导他写，我也会告诉他，儿子，这样写，我希望中国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能够重演，希望盛唐风光能够再现，希望2008年让世界都了解中国的奥运会能够再来一次（当然不要把人都赶出北京）……但，让中国百年受侵略受欺负的历史不再重演，让一些可怕的历史事件永不再来……

中澳之间的小学教育竟然如此相像？当初我两个儿子分别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读小学的时候，我就隐约感觉到，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小学出来后的儿子会和我不再一样了。我当时就知道，我之所以是“我”，很多东西早在小学时候就注定了，已经被“灌输”进来。所以，我曾经暗自决定，要和儿子一起读“小学”，看看他们是如何从小做起，培养公民意识的。只是后来我一忙，就没有时间关心孩子了。其实，也许我所有的忙，都忙错地方了。如果我真从一开始就从儿子受到的具体教育入手研究美澳的小学课本和教育，我早就找到了中国的富强之道。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句话：中国的问题在教育。那么，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呢？

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多少人受到教育，不在于教师是否多牛，是否都是博士硕士，甚至不在于我们是否填鸭式地“灌输”孩子，而在于：我们教育孩子一些什么知识和道理。简单地说：在于那本薄薄的课本上面记载的是真实还是虚假，是真理还是谬误。

三年前在中国大陆陪伴病中的母亲时，我曾经请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把她所有的语文课本拿给我，高高一摞。我和她一起用三天时间，一篇一篇翻课文看，然后问她从那些课文中学到了什么。后来，当我把这些课文挑了一些拿到海外给儿子讲，然后问他们学习后的心得时，他们茫然无知，不知所云。例如，一篇改革的舵手讲的是邓小平同

志到云南一所小学视察电脑教学，然后鼓励孩子们要为了祖国的将来学好电脑，孩子们激动万分。我反复给儿子讲后，读小学的儿子还是不明白：一个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到学校去鼓励学生学习电脑？学习电脑难道不是老师或者卖电脑的商人们的责任？还有三年级学生为什么要激动万分？领导人给他们送了电脑，还是带来了玩具？

但是，从我11岁儿子的这篇作文中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也在培养孩子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奥运会）和历史（地理大发现），好在澳大利亚只有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否则，儿子也要写很长的作文了。但这篇作文的重心不在于热爱自己的历史，不在于希望美好的历史可以重来，而在于希望那些可怕的历史不再重现！

在翻译儿子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插曲。作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也有做对的时候……我们两次对‘被偷的一代’说了对不起。”这说的是澳大利亚总理两次就历史上的错误公开道歉，可儿子竟然用了“我们”，口气实在不小。我一开始翻译成“澳大利亚总理”或“澳大利亚政府”，并发表在博客上，但想了一会儿，觉得这样篡改儿子的意思不太好，于是又改成了原文We——“我们”，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第二天查看留言，果然有读者发现了这个大言不惭的“我们”。于是，我找到机会问儿子，不是澳大利亚总理道歉的吗？你这里为什么要用“我们”？

儿子甩给我一句话：“澳大利亚总理是代表所有澳大利亚人与国会发言的，当然是我们！”然后继续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玩乐去了。我心里真是百味杂陈啊，原来，澳大利亚人也玩“代表”，竟然让儿子也自然乐意地接受了“被代表”。

而且，如果注意作文的英文原文，就会发现，这两个“我们”特别

突出，而这两个“我们”强调的都是一件事：澳大利亚人对于历史上犯过的严重错误的认错精神，那种让一个11岁孩子忍不住自豪地用“我们”——如此大的口气——来表达的，不是探险精神、奥运会等辉煌的成绩，而是“我们”做对的一件事：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说了对不起啊！

这是儿子这篇作文在第一时间打动我的地方，可惜，我看到读者的留言中很少提到这一点。儿子的写作才能，对历史的认识，那都是扯淡，11岁的孩子懂个啥？但，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能够靠“洗脑”，靠“灌输”，让一个11岁的孩子，如此自豪、自信地把“我们说过对不起”当成是这个国家历史上“做对的一件事”而写进作文呢？

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如果我的儿子还在国内，他的作文会很长很长，他会为很多事情骄傲，希望历史不断重复，如果有北京户口的话，他甚至还会为2008年的奥运会自豪，但他会不会在这篇作文中，也毫不犹豫地写上：我们的历史上也犯了那么多错误，但“我们”也有做对的时候，例如，“我们”向“文革”中的受害者说对不起了，“我们”向受毒奶粉伤害的孩子们说对不起了，“我们”向很多受难的矿工和弱势群体说对不起了……

2010.04.11

中文好的澳大利亚总理为何读不懂中国

很多朋友希望我讲讲当今的国际关系，其实相比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当今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实要简单得多。而且，国际关系又多是国内各种矛盾和关系之延续。一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和它所拥有的价值观，就是指导这个国家外交关系的两个大原则。

由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之间，基本上都拥有了相同或者类似的价值观，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要简单很多，就是一个“争钱夺利”的关系。可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同了。如果以为拿钱去买他们的东西，再把中国制造的东西卖给他们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和平相处”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

如果要找出一位最懂得中国的西方国家首脑的话，那一定非陆克文莫属。迄今为止，我印象中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西方国家首脑能够像陆克文一样说如此流利的中文。而且，对陆克文上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观察显示，对中国他是非常亲善的，他的亲善甚至扩散到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关心。

陆克文刚刚当上总理时，由于经常说中文，又对中国多有褒扬，加

上好像有一次在外交场合还同中国来宾说中文，结果遭到了反对党的猛烈攻击，也受到澳大利亚媒体的诟病，指责他亲华亲共，说他媚态十足，话说得很难听。那段时间我在澳大利亚，就我的观察，陆克文对中国友好属于“真情流露”，大概由于学中文的缘故，他确实对中国比较亲近。但受到反对党攻击后，他有所收敛。

可是，时至今日，陆克文的态度为何180度大转弯？不停激怒中国政府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弄得中澳关系也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高处直落低谷。难怪有些观察家惊叹看不懂陆克文了，不知道他“意欲何为”，更多的人则认为是陆克文看不懂中国所致。

其实，不是陆克文看不懂中国，而是那些人看不懂澳大利亚的外交。陆克文的对华外交根本不是建立在他对中国有多少了解之上，也不受他个人与中国的感情所影响，而是他对澳大利亚有多少了解，以及澳大利亚人想让他如何处理中澳关系。陆克文是一名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政客。选举他的是澳大利亚人，不是中国人，所以，无论他的内政还是外交肯定是要对他的选民负责的。他努力去读懂的是澳大利亚，而不是中国。

力拓案发生后，被澳大利亚媒体渲染成政治事件，澳大利亚民意有很大的反弹。这件案子由于牵扯到巨大利益，被一些人暗中操控，成功地激起了从去年开始就在澳大利亚人中酝酿的反感中国的情绪。奥运会火炬传递时，澳大利亚的民意中开始有一股暗潮在涌动——就是我们说的“反华”，澳大利亚人认为的“反共”。这股暗潮在力拓案后被澳大利亚媒体煽动起来，一度成为主流。

陆克文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澳大利亚民众和媒体对华态度的转变，作为一名民选的领导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应民心”，以便捞取更多

的政治资本。所以大家也注意到，当他在说到中澳关系的时候，他不是面对中国，而是好像在对澳大利亚人喊话一样。事实上，他强调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兼顾利益和价值观的观点，得到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认同。至于如何兼顾利益和价值观，就是实行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的政策。

陆克文在澳大利亚人面前对中国强硬，凸显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并没有耽误同中国做生意。例如，就在大家眼看中澳关系陷入低谷时，中澳两国竟然签署了价值 500 亿澳元的天然气协议，中国公司还向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企业投资 70 亿澳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这说明什么？两国政府都非常理智，都不会头脑发热。在网上看到不少中国的网友头脑发热、义愤填膺了。正如当初声称不要买法国空客和美国国债一样，现在也要求政府不要买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好像他们不买澳大利亚的天然气，人家的天然气就得当屁放掉，澳大利亚人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似的。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有钱买第一架飞机前，法国就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了，今天，就算中国把所有的空客都换成波音，法国在世界上的富裕排名也不会下降的，甚至每年的 GDP 也不会少一点。更何况，当你把所有的空客换成波音的时候，你也许才发现，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要远远大于中法之间，那时又怎么办？难道再把波音一个一个换成空客？

这种游戏玩不得，中国在国际上没有那么牛，多出去走走就知道了。在西方富裕国家，中国因素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创新率几乎等于零）。只有生活在中国大陆两耳不听墙外事的人，才时

常感觉到我们在世界上牛哄哄的，其实我们是被自己的宣传以及断章取义节选自西方人写中国的文章弄得“被强大”了。

生意归生意，政治归政治，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是少数几个和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之一。如果我们把生意当成外交的砝码，最终受害的不是他国，而是我们自己。西方人唯利是图毫无疑问，但更加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不会为了利益真正去损害他们的核心价值观。

中澳关系目前处于低谷，但很快会走出来的，这正如去年中法关系处于谷底，现在基本走了出来一样。但千万别以为我们到家乐福抗议，或者抵制法货起了作用，更别以为不到法国采购就改变了人家的外交政策。相反，目前继续做生意的中国和澳大利亚，很可能会更快地走出关系的低谷。两国交往的原则应该是不能让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受损，同时不能为了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核心价值。

其实不需要陆克文读懂中国，中国只需读懂自己，就能够很好地把握国际关系了。但毕竟，陆克文懂中文，这倒让人有点担心。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不妨到澳大利亚的报纸和网站上去看一下，虽然有一些批评中国的文章和帖子，但对我国领导人口诛笔伐，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的帖子几乎没有。然后，你再看看遍布中国各大网站的新闻跟帖和论坛帖子，看看中国网民是如何批评、嘲讽，甚至攻击和辱骂陆克文的。

你说，如果陆克文真想读懂中国，正好又看到了那些帖子，会怎么想?

2009.08.26 北京

换裤子的时间澳大利亚就可以换一个总理

早上起床，吃早餐的时候顺手打开电视机，看到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正在主持一个党内选举的会议。因为要去唐人街会朋友，我匆匆吃罢早餐后走进房间换了一条裤子，穿戴整齐准备出门，拿起遥控器关电视机时却瞥见屏幕上换上了陆克文的副手茱莉亚·吉拉德讲话，下面打出的字幕竟然是：澳大利亚新总理茱莉亚·吉拉德。

我大吃一惊，原来在我换一条裤子的时间里，澳大利亚竟然换了一个总理，而且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60后，没有结过婚，目前和男友同居。

我因换了一条裤子而错过了澳大利亚政坛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刻。澳大利亚实行的内阁制与美国的总统制不同，四年一次的大选，选的是执政党而不是最高领导人。澳大利亚的总理职务是由选举上台的执政党党魁出任的。

像今天这种情况很少见，那就是执政党搞了一次“党内民主”，把党魁给换掉了，按照法律，也换掉了澳大利亚的总理。我出门的时候，

在火车上，在街道咖啡厅里，听到很多澳大利亚人在谈论这件事，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好像议论同事身上穿的一条新牛仔裤似的。

工党这样做其实也是冒一定风险的。2007年的时候，大家选这个党执政，很多选民可能也因为同时看好陆克文这个人。当然，工党大佬们换掉了陆克文的理由也是为了今年十月份的澳大利亚大选。他们声称，如果让陆克文继续当党魁，工党有可能在十月份选举中失去执政党的地位，那时，总理职位就是人家的了。

澳大利亚大多数媒体也是这样议论的。我一直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没什么兴趣，可既然正好碰上了如此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也就多看了几眼新闻，心中免不了生出疑问。这两年陆克文的民调都居高不下，高得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虽然最近跌得厉害，可仍然高于在野党推出的候选人。而且，离大选还有好几个月，作为总理，陆克文争取连任的机会还很大。可他的党说他“独裁”，不和党内大佬商量而做出一些决定，破坏了常规和游戏规则，于是就把他给提前“民主”掉了……

我一直对西方民主产生的政治人物有兴趣，在研究他们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归类。例如，我按年龄、出身和性格、行为方式等把陆克文、奥巴马归成一类领导人。他们出身普通（甚至底层贫困）家庭，野心勃勃，靠奋斗爬到最高位置；他们始终充满激情和战斗精神，内心时常愤怒，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不满，对底层民众生活熟悉，而且常常想打破常规帮助民众做一些事；他们的激情、能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常常让他们大起大落，民调也像过山车一样……

虽然从来没有深入研究澳大利亚政治，可政治直觉告诉我，陆克文下台和他的这种性格有直接关系。目前最明显的原因是他坚持要征收高达40%的矿业暴利税。大家想一下，矿产资源可是澳大利亚的大产业，

澳大利亚很多大富翁都是矿业巨子。陆克文要征收矿业暴利税，首先得罪的是谁？当然是澳大利亚最富有的那个阶层。这段时间，他们几乎是群起而攻之，估计用来倒陆克文的钱绝对不会少。

澳大利亚是高福利国家，征收的这些税收最终会用在哪里？相当一部分会成为福利，用到穷人和普通人身上。所以，如果等到十月份选举，即便陆克文执意要征矿业暴利税，他仍然可能连任。可是，谁让他得罪了澳大利亚最富有的那批人？他得罪得起，他的党也得罪不起啊。于是，工党的大佬们联合起来，逼迫陆克文今天临时举行“党内民主”选举会，把他自己给选掉了。

这里只是挑选一个突出的问题，简单议论两句，政治当然不会如此简单。每一个执政者都有失误，但如果陆克文所在的体制和美国是一样的，这些失误绝对不会让他失去最高领导人的宝座。更何况，陆克文在位短短几年，干了很多了不起的好事，例如，他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向原著民说“对不起”的总理，他带领澳大利亚人走出了金融危机，他比较草根，对富人征税，有可能用于相对不富裕的澳大利亚人。

也许有人说，陆克文的下台，难道不正说明西方的民主是富人的钞票操控的？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例如，澳大利亚人当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不是“矿业巨子”，可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对政府加税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有天生的反感。你今天可以对澳大利亚矿业征收暴利税，明天也可以对其他行业征税啊。福利往往帮助的是低收入人群，而在澳大利亚，中产阶级才是最大的群体，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加税。

再以奥巴马作为例子。美国的总统制不可能让奥巴马中途下台（如果他不违反宪法的话），可是，有理由相信，如果从奥巴马去年的表现看，他真有可能只干一届就得搬出白宫，去找新地方住。他和陆克文上

台后的民调都像过山车一样，高得吓人，跌得可怕。

奥巴马上台两年折腾最多的是全民医保，现在总算向他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大家可能纳闷，美国有四千多万没有医保的人，奥巴马的医保改革，让三千二百万低收入的美国人受益，为什么他的前任搞了大半个世纪都不能成功，而他在几乎要成功的时候，民调竟然会跌得如此之低呢?

大家看一下，他推行医保都得罪了哪些人：全美的保险公司和美国商会。你知道他们的势力有多大吗？在奥巴马搞医保改革的去年，全美商会仅仅一年就花了一亿四千五百万美金，专门和奥巴马作对；而保险公司每天都花费一百四十万美元反对奥巴马的政改方案——所以啊，各位，你在网络上看到的辱骂奥巴马是希特勒和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很可能是美国“五毛党”写的。

也许又有人要质疑，奥巴马为穷人着想，要搞全民医保，为什么民调（选票在平时的表现形式）如此之低？

简单一点说：你看到了三千二百万低收入的美国人，可你看到了比这个三千二百万低收入人群要多得多的近两个亿的美国人没有？他们靠勤劳致富，靠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购买了医疗保险，结果，你奥巴马一上台，就把那些没有医保的穷人也“医保”了，请问，这些为数更多的将近两个亿的美国“富人”，他们心理能平衡吗？会不会有人从此再也不想出去工作了，等着你奥巴马来“医保”呢？

当然，又有人来质疑了：这样说，资本主义的穷人只有受苦受难的份，比我们富士康的工人还惨？你正好又错了，澳大利亚始终是高福利国家，这个国家的穷人是世界各国穷人中过得最舒服的。而在美国，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毕竟获得了通过。

扯远了，回到正题来。澳大利亚原副总理，现任澳大利亚新总理茱莉亚·吉拉德的同居男友是一位理发师。大家知道，这位理发师即便荣升为“第一家庭”的“第一先生”——错了，应该是“第一男朋友”，在澳大利亚这种民主国家，估计他还得继续给人理发维持家用。本人正在打听他在哪个理发店工作，等你到澳大利亚时，我带你去……

2010.06.25

对华外交怕中国

美国外交有两根支柱：价值观和利益，或者说它的理想（民主、自由、宽容等）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本性。这两个支柱孰重孰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要争出个结果可能不容易。

我反对的是一些人用一个支柱否认另外一个支柱，例如，有人说美国人在国际上唯利是图，完全有违它在国内高举“民主、自由、法治和宽容”的理想形象；又有人转弯抹角来证实美国人哪怕在国际上胡作非为也是为了“民主自由”的大理想。这两者都有失偏颇，走了极端。

我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没有坚持自己在国内事务中坚持的价值观，大多时候是“唯利是图”的，但美国人也知道从长远利益看，在国际上推销自己的价值理念，让世界各国都接受他们认定的价值观，往往会让自己更加“有利可图”，所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并不都是鼠目寸光到唯小利是图。

在分析美国的外交和内政的时候，最好能够用例子来说明，美国是地球上最注重理念，却也是最务实的国家。先拿冷战时的美国外交来说事，很清楚，那是长达三十多年的意识形态之战，也是理想和理念之

战。能说冷战中的美国是唯利是图的吗？如果真是唯利是图，他应该向苏联东欧靠拢以开发市场发展贸易，而不是来拉拢当时相对穷困的中国。

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冷战中一定要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要把民主和自由推广到苏联控制的铁幕另外一边。可是，让人困惑的是，它却对自己占领的韩国独裁一忍再忍，对蒋介石的威权也睁只眼闭只眼长达三十年之久，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除了一些凌乱的思考外，至今也没有答案。

主要的一个观点是，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喜欢听话和便于控制的“独裁”远甚于无法掌控的民主国家，这个曾有人提到过。我自己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想法：美国等西方的白人在骨子里也是文化决定论者，甚至有很深的种族歧视观。他们认为欧洲（包括苏联和东欧）人天生更适合民主自由这些需要国民有自觉素质的制度，而亚洲（包括中东）、非洲等并不适合西方白人发明的这种最不坏的制度。

于是二战后美国虽然占领了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他们却只在欧洲、日本推行了民主制度，却并不急于在亚洲、非洲其他地方推行。可是，为什么在亚洲的日本推行？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优等民族，是可以与西方白人世界抗衡的唯一的亚洲民族。至于中国台湾这些地区，他们并不抱多大希望。他们要放弃和支持蒋介石，好像都不是因为蒋介石有多少民主宪政思想，而是因为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所以，我看到中国台湾地区在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几乎并没有得到多少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与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意识形态政策相反，他们对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比苏联的更“社会主

义”）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1979年中美建交，回顾从那时到现在三十余年的中美关系历程，可以说除了中间有短短不到两年的理念之争外，美国对华外交基本是基于利益考量。

当然这个利益考量也被冠上了一个大帽子：要实行接触政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要和谐相处，逐步影响中国，最后达到和平演变。其实，美国内部决策者很少有人真正认为能够和平演变中国的，倒是从去年开始，中央情报局有些担心中国已经开始“和平演变”美国了。

你知道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而是，中国会不会乱。

美国确实有理由担心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因为中国的不稳定不但会摧毁自己的经济，给美国主导的世界留下无力负担的大包袱，也会全面波及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以，华盛顿有些决策者甚至比北京的一些当权者更加担心中国的稳定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中，有相当大一批人心中揣的对华外交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

其实，早就有很多人对美国对华外交持有异议，认为他们失去了理想。甚至连每一次的总统候选人也在大做文章，我们记得，克林顿上台的时候就攻击老布什“和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拥抱”，而等到小布什去竞选总统的时候，又着实把克林顿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讽刺了一通。现在这位奥巴马也不例外，一上去就在美国内部高层紧锣密鼓地制定和平演变中国的新计划，但不到三个回合，你放心，他一定先被北京演变过来。

从客观上说，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但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利，也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随着中美经济、社会、

政治和军事交流的进一步深化，任何试图改变方向的做法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都会遇到无法预测的阻力。

前几天在香港，有美国官员和智库研究员向我了解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我想他们大概是为奥巴马访华收集一些信息和情报，我如实告诉他们我这几篇文章中将要写出来的一些看法。之后，他们问我，那你认为美国政府在促进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上能够做些什么？

我对这个问题完全失去了兴趣，摊开手说，它想做什么我不管，但我知道，它可能什么也不会做，或者什么也做不了，又或者它做了也毫无效果。

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我这些年对中美关系乐观其成，但却并不寄托什么新的惊喜和希望的一贯立场。已经好些年了，我不再愿意和美国人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等问题，我知道他们能够做的很有限，有限的作为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更加有限。再说，政治民主化、法制、自由和体制改革等，那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不是吗？你看看和美国人对抗的苏联、东欧，你看看在美国人保护下的韩国，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真是因为你美国人折腾成功的？

2009.10.27 海口

崛起了怎么再谦虚

我曾经说过：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我们周边的一些中小国家，开始对中国说“不”。现在，我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一下这个现象。就从日本人上街抗议中国说起吧。

中日建交的这些年里，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我们一般只看到中国人涌上街头抗议日本，很少看到日本人上街抗议中国的。至于日本一下子涌出这么多人，几乎创造了他们抗议中国的历史记录，还真是闻所未闻。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之前的某一次中国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日本、抵制日货开始说起，那次，我正好在日本旅游。我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感觉，都显示日本很平静，民众的“情绪很稳定”，绝大多数日本人对发生在中国的反日游行都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当然，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不令人愉快，因为，它暴露出日本人对我们一种发自内心的蔑视。你游你的行，关我什么事？你能咬我？

于是，屡次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反日”游行，不管闹腾得多凶，在日本基本激不起多少浪花。虽然有时也有一些反应，顶多也就一小撮

日本右翼分子穿上滑稽的皇军军服，象征性地原地转一圈。而且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即便这种右翼举行的游行示威，也并不直接针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是日本右翼不敢得罪中国？还是照顾亚洲人的面子？都不是，是因为被我们蔑称为“小日本”的他们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亚洲邻国放在眼里，他们也从来没有把现在的中国、韩国作为他们的对手。这种逻辑很简单：你会与一位你看不起的人计较？去和他针锋相对地搞游行示威吗？

我们不妨去检视一下日本最近二十年涉及他国的游行示威，你会惊讶地发现，所有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直接或间接的矛头几乎都是针对美国。这说明什么问题？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不错，在绝大多数日本人眼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从来没有打败过他们，是美国用原子弹和民主制度征服了他们。日本人眼中只有美国，也只认美国。日本不会和亚洲国家“计较”，也自然不会真心去“道歉”。可以这样说，只要美国不强迫日本对二战所犯的罪行赔礼道歉、深刻反省、痛改前非，日本永远不会顺应亚洲的民意，更不会真心对亚洲国家说声“对不起”。

我们常常说德意志民族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却忽视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拥有强大势力的犹太人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没有他们从不间断地“督促”与“强迫”，出了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真那么善于“自我反省”？要知道二战后到今天，德国的新纳粹分子一点不比日本极右分子少，有时他们袭击少数民族的行为更加暴力。

经过上面简单的分析，我们现在都会忍不住要问：日本这次为什么出现了大规模的反华示威游行？而且参加游行示威的早就不再是平时意义上的“日本右翼”，连我认识的一位日本“白领”也表示想上街了。放下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崛起了，

日本人心理不平衡了，或者说，他们感觉到了危机与威胁。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像美国一样的“大国”，值得他们怒发冲冠，“配得上”他们上街游行示威、表达不满……

几个月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悄悄地超过了日本，这在中国不但没有引起赞叹，反而引发忧思。日本表面上也显得平静与情绪稳定，可从我稍后得到的一些资料显示，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相当关心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一些人甚至担心，日渐崛起的中国，会不会终有一日不再把日本的保护伞美国放在眼里而随时对周边国家动粗？像当初崛起于亚洲的日本一样？如果历史重演，自从二战后就被美国解除了进攻性武装力量的日本，又何去何从？中日之间虽然一直磕磕碰碰，但大多都是日本人欺负和侵略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二战后的三十多年里，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却一直折腾来折腾去，日本人有充足的理由对中国“掉以轻心”。可是，你不知不觉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它，跃居世界第二，直逼它的保护国美利坚合众国，它能不紧张，心理能平衡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撞船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这个事件的肇事者是日本。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网民的支持下，一路强硬，连美国都介入，最终日本不得不灰溜溜放人……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有增无减，日本被迫放人，这一系列事件对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在心理上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有多大？恐怕不是我们一时之间说得清楚的。

也难怪，这次反华大游行中出现了过去一直和日本右翼保持了一定距离的日本人，部分日本人士甚至萌生了“重新武装”日本的念头。以前日本人不“反华”，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你根本不值得他们反，他

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你。现在他们突然搞起了针锋相对的“反华”游行示威，甚至有不断升级的趋势，一个主要原因是你在他的眼里发生了变化，你强大了、崛起了，成了值得他们“反”的对手。

是喜还是忧？也许恰当的说法是喜忧参半。我相信中日关系能够处理得好，毕竟两国的经贸关系非同小可。然而，从这件事，以及今年发生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摩擦等事件，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崛起的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时候，是否应该有与自己大国地位相应的策略、手段与心态？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近日与中国网友的一系列交流中传达了一些有意思的信息。我认为，这位懂中文的美国大使也是在向中国传授美国的经验。毕竟，中国只是刚刚崛起，而美国，已经立于世界头号强国的位置长达大半个世纪了。那么，美国是如何处理自己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上的不同声音的？

如果我们去粗略统计一下世界各地的游行示威，不难发现，凡是涉及国际关系的那些，几乎80%都是针对美国的。可是，如果你再去看看发生在美国国内的游行示威，几乎没有几个是针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而主要是针对美国人的政府——白宫的。

作为一个小国，一个弱国，或者一个心智不那么成熟的国家，民众动不动就上街抗议外国政府，甚至把自己的国旗挥舞到外国的领土上去享受一把自由的权利，地球上并不鲜见。可如果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动不动就要以牙还牙，要上街抗议他国，宣誓要断绝关系、发动战争……又会如何呢？这样的国家是否能够真正崛起，显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他们不会接纳一个这样崛起的大国。

中国显然已经崛起了，否则，不会让目中无“华”的日本人也忍不

住走上街头。但我们掌握了大国思维，学会了如何与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和平相处没有？我们应该如何在国际上交往？在交往中，我们又推崇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呢？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种大国的心态可不是坐在会议室里就能商量出来，也不是能够装出来的，它是这个国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的真实反映。一个国家所持的价值观念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国内对自己民众实行专制，听不得一点点不同意见，那么它在国际上也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尊重他国权利与容纳异议。

2010.10.24 斯德哥尔摩

别了，穆巴拉克们！

有些名字像我们的记忆一样久远，听上去比我们自己的名字还更加熟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朝鲜的金正日、古巴的卡斯特罗以及埃及的穆巴拉克……对学习国际关系的我来说，这些名字像历史的幽灵一样，徘徊在世界的上空，挥之不去，他们成了这个时代抹不去的标签。

在埃及执政三十多年的穆巴拉克迫于人民的力量而辞职，“穆巴拉克”时代结束了。虽然这十几天来，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和那些埃及街头的民众在一边，但我的“国际知识”却让我无法对“穆巴拉克”这个名字生出更多的痛恨，我甚至有些惆怅：埃及少得了穆巴拉克吗？埃及不就是穆巴拉克吗？

埃及、穆巴拉克、木乃伊，至少对于我这个年龄的读书人来说，已经无法分开了。我们被看上去改变不了的现实，以及穆巴拉克自己制造的“事实”告知：“穆巴拉克”这个名字曾经让埃及在动荡的北非与中东之间稳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统治时期的埃及，有一段时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而且，穆巴拉克的政府也是这个地区最世俗化的政权之一；是他，解决了埃及人民的温饱，带来了稳定；他和木乃伊都成了埃

及必不可少的象征。穆巴拉克，这个名字一度承载了埃及人的光荣与梦想，也控制了世人对那个文明古国的想象。

埃及与伊拉克，还有东亚的几个国家，都是人类历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正因为如此，现代民主理念在这些国家遭到了相对比较顽固的“古老文明”的抵触，这使得埃及、中东、东亚等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反而成为地球上最后几个仍待进一步民主化的国家集中地。不过，这本来应该成为穆巴拉克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啊，穆巴拉克应该知道，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顶多推迟几天，绝对无法阻挡，他为什么不在执政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的任何一个时刻改弦易辙，利用手中的权力，同民众一起，让古老的文明焕发青春？他为何一味拖延、抵制，对一些原本可以为埃及带来光明、为自己也带来出路的改革说“绝不”，最后等来的是被迫黯然辞职？

穆巴拉克，原本还可以承载埃及人更多的光荣与梦想的。如果他不是以这种方式下台，如果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里，或者在他享受了三十年的绝对权力之后的最后的岁月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他能够顺应民意，抓住机遇从善如流的话，他不但可以风风光光走下政坛，甚至有可能会被知恩图报的埃及民众摆上圣坛供奉起来，像美国人对待华盛顿一样。但这种可能性没有了，他犯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忘记了艾森豪威尔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民只要温饱就能够满足，他们还不如待在监狱里。

说实话，以我有限的国际知识，我并不认为今天以后的埃及就会比穆巴拉克统治时经济发展更快，政局更稳定，社会更和谐——这些也正是他一直不肯放弃绝对权力，还权于民、进行改革的理由与借口，也是美国一直支持他的重要原因——但如果他有点历史知识的话，他应该清楚，今后的埃及无论经历怎样的阵痛与磨难，都再也不会回到穆巴拉克

时代了。而且民众会逐渐认识到，今后的这个国家即使经历民主转型的混乱，也不是因为没有了穆巴拉克，而是曾经被他统治太久的缘故！别了，穆巴拉克！

我尚在大学的时候，就在研究与背诵他如何治理人民，带领他们打仗，解决他们的温饱，用他的方法与埃及特色构建和谐社会；我儿子如今又在大学里阅读关于他的教科书；现在，埃及人民终于站出来，给全世界上了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最重要一课：不合法的政权，终究是不合法的，不管拥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管如何花言巧语，不管他的军队如何强大。对于穆巴拉克这位老人来说，这显然是最后一课。但对于这个世界上其他别的国家与掌握绝对权力的人来说，却不是最后一课。我真希望穆巴拉克能有机会谈谈对这一课的体会，给这个世界最后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

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民众走上街头，局势急剧变化，这期间，他一定犹豫过、彷徨过，可能还考虑过是否下令向人民开枪，最后，他只不过希望民众能够再给一段时间，哪怕只几个月——有人说他想利用这段时间安排后路，转移家族和他庇护下的利益集团贪污的钱财，让自己交出权力时能够软着陆，但我却有另外一种想法，或者说是幻想：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这十几天他依然挣扎着想保住权力，会不会是因为他心中幡然醒悟，后悔了？于是，想抓住最后一点权力，为他的人民做一件小事，把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还给他们？也同时为他自己做一件大事：把梦想留给人民，让自己光荣离开，也让自己名垂青史？

但，太晚了！他有足足三十年的时间，可都没有给埃及人民机会，这次他们自然也不愿意再给他哪怕一天时间的机会，他不配了。

因为他的下台，今年的情人节仿佛提前到来，让一些仍然生活在散

发出木乃伊气味国度的民众突然想起，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和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有一个不见不散的约会。

别了，穆巴拉克们!

2011.02.12

美国将军因言论自由而到白宫作检讨

美国驻阿富汗最高司令官麦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大概以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讽刺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副总统拜登，并就自己的艰难处境对白宫政策提出批评。杂志出版后，舆论哗然，震怒的奥巴马总统目前正等他回白宫“作检讨”，可能会炒了他的鱿鱼。麦克里斯托也在第一时间道了歉，并有可能主动辞职。

麦克里斯托是奥巴马亲自指定的驻阿富汗最高司令官。他是特种兵出身，在对伊拉克战争中立过大功，指挥作战能力一流，好评如潮。然而，因为这次不恰当的自由言论，他可能会丢掉驻阿富汗最高司令官的职务。

美国各大媒体岂肯放过这个话题？于是，各大电视频道开始找政要、议员、专家学者上电视发表评论，组织各种辩论，纸媒与互联网上的相关文章更是铺天盖地。

我最喜欢西方国家出这种“乱子”，看他们互相攻击、互相揭短，一片混乱，可最后总能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在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里，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每一次危机都变成转机，把本来要让他们

沉沦的危机，弄成了一次又一次把国家和民族向上提升的机会……这双看不见的手就是“言论自由”。

从“水门事件”到“伊朗门事件”再到“拉链门事件”，从黑人抗暴、华人游行再到黑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坐在电视机前，从自由言说的媒体中揣摩西方、学习美国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跟踪每一个带来危机与混乱的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最终结果，我收获的远远超过我所有的学校教育能够带给我的。

有人可能会说，媒体很肤浅，学不到真正的东西。其实不然，现在的媒体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载体，一个表达与传播的平台，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各种声音都能够借助媒体第一时间传播出来。

就拿“滚石”事件来说，我一早起床就从电视上看到好几位熟悉的华盛顿专家学者与将军们在侃侃而谈。有的批评麦克里斯托违反了军人的职业道德，有的谈到了美国的宪法与传统制度，还有的讲到民选总统对军人的绝对领导权。当然，也有的在为麦克里斯托司令官辩护，认为目前没有比他更适合担任驻阿富汗最高司令官一职的候选人，从国家利益出发，希望总统把他训一顿后，别撤他的职。

当然，更有趣的是，媒体说来说去，最后变成讨论奥巴马的阿富汗政策，美军在那里的策略……自然就有人开始攻击奥巴马在阿富汗政策上前后不一，竞选的时候承诺要撤军，上台后却立即增派了三万多美军……真不知道这种讨论还会牵扯出什么。而对于我来说，这无疑又是一次免费学习的机会。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如果你问我从哪里学到了最多的知识与理念，我的回答是从各类自由的媒体上。不管你是中国的专家学者、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员，研究一下当今西方人在媒体上

争论的那些问题，以及他们如何争论那些问题，往往对解决当今的许多问题大有裨益。

每个国家都有突发事件。发生这类事件后，媒体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封锁消息，粉饰太平，维护执政者形象；另外一种是利用开放的媒体，把现实中的突发事件弄到媒体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民众通过媒体了解真相，听取各种意见，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在后一种情况下，“言论自由”不但不会制造混乱，反而可以“转移矛盾”，甚至可以用集思广益的办法化解矛盾。“言论自由”的本质是对民众的智慧与理性的信任。谁能想到，在美国，推动官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良性互动的幕后推手，竟然是让一些人提心吊胆的“言论自由”。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在这类事件中，各方都多多少少受到了批评，甚至包括那些出来评论的嘉宾们，也忍不住互相指责对方。唯一没有人批评的却是“罪魁祸首”——那本刊登了将军讽刺批评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的《滚石》杂志，还有那些“添油加醋”、“唯恐天下不乱”的全美电视、报纸和互联网媒体。

只要大家还拥有“言论自由”，对“言论自由”的定义就会一直自由言说下去。而我们也只能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去认识、拥有言论自由，在言论自由中去体会、提升言论自由……

在这个尚未完全展开的事件中，我们对言论自由有了新的认识：现役将军没有讽刺和批评总统的言论自由，媒体却有刊登与“炒作”此事件的言论自由，而每个普通的民众则都有借题发挥地去批评和指责美国政府与其政策的言论自由。

这就是言论自由。

2010.06.23

社会篇

现实照进梦想

不给肉吃，老虎还怎么猛

儿子回国旅游，我最担心就是他们在街上过马路的问题。没有红绿灯的地方他们不敢过，因为几乎所有的机动车辆在看到前面有人准备过马路时，都不是减速而是加速，力求用自己的车把行人挡住。有红绿灯的地方我也不敢让他们自己过——如果你以为绿灯亮时就可以放心过马路，也许你永远无法过到马路那一边。

这次回广州，情况有所不同。我和儿子都发现了，在车多人多的交通路口，红绿灯两边多了一个个穿黄色马甲的“交通协管员”，他们手持红黄相间的小旗子，口里含着不时尖声响起的口哨，手臂随着红绿灯，不停变换动作，指挥着车流和人流。

有好多次，在路口等红绿灯时，我发现九岁的小儿子都聚精会神地观察这些一般被中国孩子们忽视的交通协管员。我很想知道儿子的小脑袋在想什么，果然，昨天当我们再一次一起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终于提出了自己的疑惑：“爸爸，他们和红绿灯指示的一样，为什么？”

我理解儿子的问题，每一个红绿灯下都配备两个协管员，既然他们指示的和红绿灯一样，为什么还需要他们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指挥？我

说："你也看到了，你想一下为什么需要他们。"

为了让他思考，我故意在红绿灯旁边停了一会，引导他观察红绿灯的变化与行人和车辆的行为，以及那个交通协管员的动作和行人车辆的关系。看了好一会儿，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看懂了没有，但他却突然说了一句雷到我的话，他说："哦，他太酷了。人家不听红绿灯，都要听他的，他太酷了……"

这是小儿子这次回国第一次说一个人"太酷了"，而且以佩服的口吻连续说了两遍。儿子显然是顺着我的引导在思考问题。因为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二个国家在有红绿灯的地方还安排两个以解释和执行红绿灯命令为己任的协管员——他们是用手中的小红旗与口中的口哨代替更先进的红绿灯。很有趣的是，由于他们也是看红绿灯来指导，很自然地，就比红绿灯慢了半拍。而无论是行人还是车辆，很多都是听从他们的指示，懒得去看红绿灯了。

二十多年前，我从北京调到新成立的海南省工作，当时我们是怀抱着要建立中国最开放，与世界接轨最快的经济特区大省的雄心壮志而去的，但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海南岛大概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连一个交通红绿灯都没有的陆地。当我们野心勃勃要计划开发海南省，在那里酝酿和推广有可能领导全国的新理念的时候，一位来访的美国专家调侃道，也许你们应该先教会海南岛民众"红灯停，绿灯行"的基本知识。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但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拥有红绿灯绝对数量第一的国度，然而就在这个国家经济发达的城市——广州的闹市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交通协管员站到红绿灯下面……

我想，过去二十年里，如果我们的学校少灌输点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多教育一些“红灯停、绿灯走”的基本规则，同时多花点时间告诉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必须遵守那些法律和规则的话，中国也许会更适合人类居住？

人类在本性上是差不多的，我也从九岁的儿子对交通协管员的“羡慕”中感受到他幼小心灵里的那种人类的原始本性。他为什么会认为一个代替红绿灯的协管员很酷？儿子出生在澳大利亚，在他所受的教育中，除非有紧急情况，例如停电、警察执行任务、封路等（儿子很少碰上，大概也不记得了），否则，不管你是谁，红绿灯的规则是必须遵守的。而所有人类的本性都告诉我们，如果可以不遵守用来约束我们的规则和法律，如果可以凌驾这些法律和规则之上，那就更“酷”了。

谢天谢地，儿子并不生活在这里，否则，他就会知道，如此“太酷了”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很多。

可这些事儿子是不懂的，好在我和他有更多的交流（看起来，我的智力更接近于九岁的儿童——这是大儿子有一次对我的评价），九岁儿童的原始思想常常能够引起我的思考。例如，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动物园看驯虎表演，当一男一女手持长鞭像驱赶羊群一样把十五头白色的老虎赶进表演场时，我由衷地叹道，那么凶残的老虎，他们怎么能够让它们如此服服帖帖呢？

九岁的儿子听到了，顺口答道，你没有看到那两个驯兽师右手拿鞭子、左手不停地在口袋里掏出肉块喂那些白老虎？

我看到了，并且对儿子的观察力感到很惊讶，赞赏了两句，儿子得意地说，就是再猛的野兽，只要你把它们关起来，给它们吃的，它们就听话了，如果不听话，你就不给它们吃的。

儿子说完后，继续沉浸在世界上白老虎最多的集体表演中，我却陷入了思考。我们常常说“苛政猛于虎”，可眼前的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呀！正如儿子所说，只要把它们关进笼子里，让它们知道口中的肉块是谁给的，你看它们还猛不猛得起来。

我想，那些把苛政和统治者比喻为老虎的，应该从我九岁的儿子那里得到启示。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他们知道“是谁在养活他们”，至少让他们尊重和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和其他各种法律法规；而要让他们真正听话，不让他们胡作非为，不让他们动不动就折腾老百姓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们吃的，不把肉块喂进他们的口中……想到得意处，我情不自禁地嘀咕道，对啊，让他们知道是人民在养活他们，供养他们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就听话了。

正在看表演的小儿子听到了我的嘀咕，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他把视线从白老虎那里转向我，表情严肃地说：“你不给我吃巧克力，我也不会听话的！”

2009.04.26

谁为绝望买单

富士康发生N连跳——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矛头与火力也逐渐集中到富士康身上。我想，富士康难辞其咎，跑不了的。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20岁刚刚出头的孩子们轻生自杀？

匆匆浏览了一些网络文章，觉得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禁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几种说法是富士康用加班、超负荷劳动以及令人压抑的企业文化等把员工逼得跳楼自杀。

如果这些原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简单：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哪怕真如外界传说的，存在血汗工厂和残酷剥削，可它毕竟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企业，既没有发生绑架、强迫他人进去工作的事件，也没有像一些传销公司那样，把年轻人锁在房间里限制自由，结果不得不翻窗逃离，跳楼身亡……

这个假设的问题你能回答吗？富士康自己显然无法回答。否则，他们绝对不会找高僧去帮他们驱邪。我今天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我想从其他的地方与其他的问题入手。从我常常去做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东莞与新塘入手。在那里做调研时，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朝气蓬勃的私营老板与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强烈对比。我在广东接触到不少勤劳聪明的私营老板，其中部分来自内地。和内地相比，这里的经商环境好，市场成熟，私营企业发达，寻租空间少，如果不涉足垄断企业，当地政府还会适当扶持你。所以，基本上都能赚钱，比在内地强多了。

可我同时接触到的也有那些同样来自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价钱，不会多给一分钱，而他们又没有任何保障或保护自己的集体行动。虽然拼死拼活也能够赚到几百、一千甚至两千的工资，但他们付出的却是超时超强的劳动。很多打工妹说，在这里，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工作。而工作，却只是为了活着。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国家和社会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拿我经常去的新塘来说（号称全世界的牛仔服装生产基地）。你到了这里，会被这个小镇的繁华迷惑住：街道上运送牛仔服装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老板的奔驰和宝马到处都是，豪华酒店里谈生意的老板和伺候老板的小姐们络绎不绝。只要你细心一点，还能注意到繁华阴影下匆匆赶路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虽然占这里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仿佛只是这个地方的过客，是这个地方繁荣昌盛的点缀。在这里，你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这里充满了活力，可却总让你感觉到这活力是畸形的。按说，这里比内地更加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国家功能大面积地退出了经济领域，或者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国家减少了干预，还给了民众一个社会空间。可是，这空间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个完整社会的存在。

我们不妨这样问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那些并没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个让他们厌倦的企业门前自杀？他们都是才二十岁左右的孩子，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离开啊。难道这些

孩子眼里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绝望与死亡？请问：国家在哪里？社会又在何处？

每一次看到国家有大事发生，群情激动的都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爱国如痴如醉，让人看得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别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总统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竟然是今天中国的打工仔与打工妹。

那些在改革中下岗的工人们，享受了自由的农民们，纷纷奔向打工之路。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好用让无数“中国制造”的产品、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以及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阶级相比，他们价廉物美，没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补助，他们几乎不给日渐崛起的国家制造任何麻烦——修奥运建世博，他们招之即来；等到辛辛苦苦建设好后，等到这些东西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他们挥之即去……他们病了自己解决，没钱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救济；这让他们宁肯加班加点不要命地工作，而我们的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勤劳中繁荣昌盛起来。

也许到了我们该问一句的时候：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以更学术一些地提问：哪些事应该是国民为国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须是国家为其国民做的？就我所知，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条件、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都到了极差的地步。在没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况下，你给他一个一个月超过两千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事，直到把他们弄得崩溃……这不是富士康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区广泛存在的问题。

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下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保护那些孩子的。富士

康们只是雇佣他们工作，如果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眼里看不到国家，没有了社会，只有一个公司的时候，那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就可以轻松剥夺他们的生活、人格甚至生命……而当孩子们对一个本来可以随便离开的公司绝望到自杀的时候，说明他们早就不对我们的社会抱有一丝的信心与希望！

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

社会取代国家，公民利用社会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层治理，另外一条就是民众基于不同的利益、爱好而结成的组织、社团，包括NGO、工会与行业工会等。在以前，这些本来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事情，都被国家大包大揽了。后来，国家退出了，基层治理基本上只服务于权贵与投资者，国家也在社会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

可是，国家却不肯在社会更多的领域放松控制，还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要和国家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西方的社会一直大于国家，在中国却相反。

你能想象吗，在西方一些国家，甚至连流浪汉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的甚至办有不定期杂志，来维护“族群”的利益。可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不但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或报纸。甚至，有些NOG组织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当地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就拿沿海地区来说，各地政府引进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经济，加上大小老板基本上也都有一些共识。可是唯一没有组织起来、可以向老板讨价还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就是总数高达两个亿的打工群

体。富士康跳楼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有很多。

就算是最伪善和最虚伪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勤劳与好用，如果这些劳动者像西方社会里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求自己的权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国经济可能还真没有如此繁荣。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的劳动者也获得了应得的权益，国家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钱，能够大手笔地举办出世界第一的奥运会与世博会。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让公民们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2010.05.20

美国是如何解决春运的

有人会问：美国根本没有春节，何来春运？

少安毋躁。首先，洋人不过春节，但确实有春运，而且一点也不比中国的客运流量小——那就是圣诞节和元旦新年期间，我们姑且也称之为“春运”。这期间也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有时不提前半年，休想买到回家的票。

还是先从国内铺天盖地的对春运的恐慌与对铁道部的口诛笔伐开始。每年都有春运，每年的春运都搞成这样，按说，无论怎么攻击甚至辱骂铁道部都不为过。但铁道部和很多领导出来向大家保证，要在几年内或者2012年的时候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脑筋开动得真快呀，不过，这个保证似乎无法兑现。

为什么短期内解决一票难求不现实？因为春运的问题在本质上不是靠开动脑筋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加大投入就可以解决的，更不是靠改善服务质量就能解决的！春运问题的症结应该是一两个亿的中国人同时想坐飞机、乘火车回家和旅游，而飞机火车不够。

有人说，不够就加，增加到够，不就解决了？哎，你以为那么容易

吗？中国的交通投入要加大是应该的，可如果真加大到能够满足春运需求的话，那是个什么概念？假如说现在真修铁路、建公路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投入的超过一半的交通工具将会在平时（非春运期间）处于闲置状态，请问哪个国家会这么干？不妨再想一下，如果靠加大投入就可以解决春运问题，那么为什么比我们富有很多的美国不建更多机场和铁路，让圣诞节时大家都可以到处跑？

那样做成本太大，得不偿失。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这成本都会让顾客出。如果我们加大投入几百个亿甚至上千个亿、上万个亿，前后长达四十多天的春运问题肯定可以解决了，那么这些增加的交通工具在平时怎么办？我去年一年在全国各地调查，发现平时火车票基本上还算好买（当然需要适当增加投入），有时还挺闲的。增加的交通工具只为了解决春节前后四十多天大家回家的问题，而闲置的另外三百二十天由谁买单？

有人又说了，中国有钱了，中国人买得起单。人均 GDP 排名一百多位，老百姓医保和教育都没有解决，如果真有一笔钱，是救命和教育更需要投入，还是解决回家的问题更需要投入？

再说一下服务质量问题，中国的铁路服务当然存在服务质量问题，但这和能够运输多少旅客没有直接关系。请问在春运期间，有多少交通工具是闲置在那里？或者因为调度失误而浪费？绝对有，但数字不会太大，至少不是造成春运问题的主要原因。至于说到服务态度问题，那完全是一个心态问题。不要说比印度，就算是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火车的服务质量也不算很差的。

中国的“春运”是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很难在短期内使用经济或者政策手段解决这一问题。使用加大投入的办法并不可行，而且不能一蹴

而就。即便要解决中国的交通难问题，也应该以中国平时（非春运时段）的交通需求为依据，不能浪费。如果不同意这个看法的，不妨看一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他们始终不让国民在圣诞节用和平时一样便宜的票价到处旅游？为什么我在圣诞节期间在美国买不到票？

对照美国的春运问题，中国的春运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是造成春运问题的根本原因；二、政府的政策是造成春运困难的最重要原因；三、绝对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使得中国的春运问题和美国的春运问题有了本质的区别，也是加剧中国春运问题的最严重的原因！

先简单说一下中国人的春节习俗和家乡观念。大家知道，美国人圣诞节也是要全家团圆的，如果有可能，孩子也会尽量赶去和父母一起吃圣诞大餐。可是说真话，我不知道以前的美国人是什么样的，现在的美国人对这种习俗已经越来越淡了。是因为经济发达，还是不想假期折腾？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一些发达地区，春节的观念也有淡化的趋势。可是，中国人的春节团圆和归乡的观念要比世界上很多有相同习俗的民族强得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政府的政策也许有用，可是，用国家政策来改变国庆和五一长假还说得过去，是否能够干预春节，值得商榷。

春运如此严重的第二个症结就不能不和国家政策联系起来了。前面说了中国人的家乡情结，这无法改变，可是中国政府现在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严重加剧了老百姓春运困境，特别是户口制度和城乡二元制。

在中国，除了公务员可以随着工作迁移户口外，其他几乎所有阶层和领域，迁移户口都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八九亿农民和工人阶级了。

所以出于归宿感和在生活方便的考虑，相当大一部分人到了春节就要回家，这不光是像有些文人所写的，要回家吃香肠，要看看家乡的小河流，怀念故乡的云。不是的，因为那里仍然是他实实在在的家。绝大多数打工仔在城市生活几十年，但仍然是暂居人口，到了春节，心理的失落，也只有回到家乡才能抚平。

这次在美国我特别留意了这个现象，也询问了很多美国朋友。大家知道在美国只要你愿意，你到哪里，只要有住址，即使没有工作，也马上成了当地人，可以参加当地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享受和当地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这在精神上让很多人对所住地有了一定的认同，也就渐渐地减少了一些归乡心切的人口流动。

因为这种原因加剧的流动人口有多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心理因素，自然无法统计，但即便不考虑心理因素，实际的困难也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流动。例如农民工的孩子无法在当地读书，在城市打工的人户口在外地，不得不去办理一些手续等。这一问题在美国就不存在，父母住在哪里，孩子就是哪里的人，不会千里奔波为上学。

有没有人计算一下，因为我们的户籍政策，让收入最低的广大民众多花费了多少金钱和时间在路上？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买不到票，为什么美国人忍气吞声，中国人却怨声载道？

有国外生活经验的人也应该知道，如果要在圣诞节期间出门，往往半年前就开始计划，否则就买不到票，或者票价飞涨了。可是，如果是临时起意，上网一搜索，发现没有票了，哎呀，怎么办？

不怎么办，取消行程吧。奇怪了，整天鼓噪不安的美国佬怎么那么老实？他们为什么不到网络上（报纸也是随便可以发文的）去攻击航空

公司，去辱骂铁老大呢？他们买不到票时，为什么不上纲上线去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去质疑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呢？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却激起如此大的民愤？

如果那些买不到票的中国同胞在美国遇到同样的事情，如果他们激动，他们竟敢辱骂铁道部门，那么在这样一段话之后，他们就会心服口服地闭嘴：你买不到票吗？因为现在太忙呀，大家都想走，飞机火车太少，没有办法呀。你为什么不早订票，你为什么不早点去排队？啊，对了，不是只有你买不到票，除了国家的特殊工作人员（例如为了国家利益奔波的警察和政府公务出差的公务员），就算你是白宫的工作人员，就算你是美国高级警察，就算你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的红人，就算你是航空公司的，就算你是高干子弟，只要你是因私旅游，对不起，请你排队，对不起，请你在电脑上买票，对不起，请你到旅行社定位！

现在你明白了吗？在美国，除了少数工作人员本人出差以及紧急公务外，私人假期和出行，买票一律一视同仁，就算是公司和政府一般的出差，也是和中餐馆打工的非法移民一样：电脑订票，卖票处排队，早到早得。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如果抱怨飞机不太多、火车不够，那么人家告诉你：我们再多，平时没有人坐，我们就不赚钱了。你如果又嫌资本家赚钱讨厌，那么你自己去开航空公司呀，反正这些企业又不是垄断的，你如果不愿意按照经济规律办，你愿意烧钱，那是你的事。

现在你明白中国要怎么解决春运问题了吧？

2009.01.17 拉斯维加斯

要社会还是要政治

缅甸风灾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到十万人，早上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新闻，让我头皮发麻。虽然CNN和BBC都把这条新闻放在头条或者靠前的位置，可是只用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却让人心情沉重——毕竟，那是一个南亚小国的人命。美国人更关心的是希拉里还能坚持多久，澳大利亚人还在关心一个星期前港口遇难的六个澳大利亚人。好在还有世界各国慈善机构以及政府伸出援手，采取行动。

据报道，联合国要求缅甸执政的将军尽快发放入境签证，让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援人员和物资进入缅甸。美国将在联合国的授意下动用几艘海军救援舰艇紧急救援（我曾经在几年前参观美国洛佛克海军基地的流动医院，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艇医院，可以同时救援上万伤员。可惜这次在救援舰艇中没有看到它的名字）。但问题在于，没有缅甸军政府的点头，不管是救援人员还是物资都无法第一时间进入缅甸。

缅甸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风灾过后，目前食物短缺，很多受伤的人亟待救援，尸体还没有收拾，已经发臭，现在死亡人数继

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伤病无法治疗以及营养不良，缅甸向国际发出救援请求。问题在于，这样的救援一直以西方为主，就算把物资给缅甸政府，他们也没有能力及时救援，这是需要学问和经验的。也就是说，物资和救援人员必须一起进入，才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成功救援。

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在批评缅甸军政府（1962年政变上台）恶劣的人权纪录。在这个时候，西方要求缅甸军政府大量放行救援人员，缅甸军政府会配合吗？

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发言中说，这不是政治，这是人命关天的人道救援。美国媒体也说，现在缅甸灾民的命掌握在军政府手里，我们看他们怎么办。据CNN报道，风灾过后的头几天，国际观察家竟然没有看到缅甸军政府派出军人救援，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间。现在国际上积聚人力物力前往驰援，却不能得到军政府的配合。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灾难，缅甸军政府根本没有办法独自处理。国际观察家说，多拖一天，缅甸灾民就会多死不少人。

风灾过后，世界各国确实把政治暂时抛在后面，但美国第一夫人在白宫草坪发言，指责缅甸军政府对自己的人民漠不关心，不积极救援。如果缅甸军政府在考虑主权的时候不积极配合西方的救援，政治议题可能会发酵。然而，西方的批评则又让缅甸军政府紧张不安，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如果我是缅甸军政府，也就是统治者的话，我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毫无疑问，主权问题是第一重要的，否则西方国家早就以人权为借口把缅甸给和平演变了，但救援工作也是刻不容缓，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政府，总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人民一个一个死亡吧？

问题在于，主权事大，还是多救几个国民更重要？摆在那里的事

实是，及时配合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的救援（以联合国的名义），肯定会多挽救不少缅甸人的生命。然而，这会给缅甸军政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潜在威胁？会不会颠覆缅甸军政府？这些都是缅甸政府不能不思考的。毕竟，在缅甸这种国家，就算死再多国民，一般也不会影响政府的权力，也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他们控制得比较好。

现在再假设我和读者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政府，我们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我想，救命第一，这应该不是问题，我们不用怀疑西方的价值观确实把人权和个人生命看得比较重。而且，西方参与救援的绝大多数组织和机构都是纯民间的，根本和政府挂不上号，有些甚至在政治理念上和政府唱不同调。

可是问题就来了，毕竟从 1962 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反对缅甸军政府。如果他们有机会，在不流血的情况下，他们是否会利用这次风灾渗透缅甸社会，颠覆缅甸军政府，或者把人权的概念和救援物资一起送进去？对于缅甸军政府，救援物资不进来，最多再死几万人，或者更少的人，可是，如果把美国的一些观念直接迎进来，也就把不稳定和破坏和谐的东西一起迎了进来，这个政府就有可能玩完。大家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西方政府的立场上，如果你反对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几十年而不得，甚至无法进入这个国家，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你会怎么做？

这是超级悖论，所以，在联合国里，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要求不理睬缅甸军政府、紧急救人的提议已经被中国等亚洲国家否定，目前还在等待缅甸军政府的决定。中国的态度应该很明确，主权重要，人权和救援也重要，但国际救援必须经过缅甸军政府，通过外交。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也符合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方针。

可是那些没有被风灾带走生命而活了下来、可是现在自己的生存权正在被灾后的食物短缺、缺乏救援逐渐剥夺的缅甸灾区人民，他们又作何想？

按照很多人的思维逻辑，在把自己放在缅甸政府、美国政府和西方政府位置上思考过后，就以为全面思考了，却忘记了，我们不是任何政府，当我们面对那样的灾难，当我们面对艰难和死亡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本来最不应该忘记的是——人，缅甸的人，缅甸灾区正在经历炼狱般的苦难的人！

希望我们永远不会真的身处在那种处境下去思考人权、主权和生存权。可是，我很怀疑，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把自己放在缅甸灾区人民的位置上，我们能够弄清楚主权、人权和生存权的内涵吗？

2008.05.08

抗灾不是歌功颂德

基本上每一次灾难过后，打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或者随便翻开一份报纸，都是对抗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们铺天盖地的赞扬和歌颂，从解放军指战员到公安干警，再到人民公仆公务员以及火车、电力等部门的代表，经过媒体渲染的事迹绝对能够融化你心中最后的一块坚冰。如果你的神经比较脆弱的话，搞不好还会一次又一次泪流满面，感激莫名。

比如这次雪灾，对于这些在雪灾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党政要员和公务员、武装警察以及电力和运输工作人员，我们除了表示敬意之外，本来不应该说三道四。但我对一些现象却不能睁只眼闭只眼，更不能闭口不言，否则我会良心不安，会觉得自己对不起另外一批人——我认为，他们才是我们最应该感激的人!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灾民，中国的灾民！他们本来是这场雪灾中的受害者，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里的主角。但他们从头到尾，却都成为这场灾难中的配角和陪衬。

前不久一位朋友同我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来往于中美之

间，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中国这次雪灾和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都是百年难见的灾难，如果说到规模尤其是危害程度，刚刚过去的雪灾可能要更严重一些。飓风造成的水灾来去如风，也比较猛烈，可是雪灾却是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破坏时间更长，破坏性也更大。如果对比两次灾难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的水灾造成了那样严重的后果，而中国的雪灾却要好很多？甚至给人一种雪过天晴、啥事也没有发生的感觉？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救灾能力强过美国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由于美国那场灾难发生时我正好在国外，几乎一个不漏地收看了灾难报道和事后的各种深入分析节目；中国雪灾时，我也正处在灾区中心，通过互联网时刻关注，所以，我还算是了解情况的。

我在互联网搜索后，发现很多中国网民已经把这两起灾难做了比较详尽的比较。不过，我发现，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朋友在比较两次灾难时都没有提到的一件非常有争议也很值得回味的事情。估计由于这件事没有收进美国主流媒体的新闻分析里，而且美国政府和白宫不敢拿来作为理由之一为自己辩护，所以中国大陆的朋友也忽视了，或者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看到翻译过来的详细报道。

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水灾发生后，美国举国哗然，此后好长一段时间，美国从上到下，都在借助媒体和各种研究机构、论坛等公众媒介对这次灾难中的人为因素不依不饶地追问和追究。民众和媒体的穷追不舍迫使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检讨救灾行为，并不断地进行反思。直到前不久，才总算把民众的火气消得差不多。当然少不了巨额的赔偿和昂贵的重建，只有这样受灾灾民才最终放过政府。

在当时灾难过后的各种反思中，也不都是指责政府救灾和应变能力的，我注意到某一个电视台的焦点分析节目就曾经报道了一个惊人的内容。几位记者深入灾区，在各种指责当局的声音中追寻到另外一种声音。不久终于挖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证据。

据报道，虽然说卡特里娜飓风的突然转向造成了水灾，但在这次灾难发生前，当地政府和警察部门已经多次要求当地居民疏散，也发出过最严厉的警告，可是被大多数黑人居民忽视了或者拒绝了。报道进一步分析，这是个美国黑人最集中的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不高，这直接导致他们不相信政府和警察的警告，最终碰上了这次百年一遇的灾难。

这个报道后来还有一些有理有据的跟进报道，以我在美国生活的经验，我认为是可信的。在美国一些黑人较集中的贫困地区，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对当局很不以为然，他们抱有极端排斥心理，拒绝执行军警命令或者政府的要求不足为奇，没有想到这次真就出大事了。当然，美国一旦有飓风到来，政府总是号召民众疏散，有时不严重的飓风他们也号召疏散，这可能也是造成居民对政府的警告当耳边风的原因之一。

然而即便是这样，政府部门在灾难前是否发出了疏散警告也是很重要的，如果美国政府以此作为撇清责任的借口之一，也无可非议。只是这件事的背景涉及种族问题，例如该电视台就明确指出，那个地区的少数白人们都听话地疏散了，大批黑人居民却拒绝执行命令，并在灾难发生后也不听当时前来营救的警察和军队的指挥等——后来我一次也没有听到美国政府和白宫当局把这个理由拿出来为自己辩解。相反，他们都是一副谦卑的样子，不停检讨和表示改进。

新奥尔良水灾发生后，我还陆续听到更多不听从政府或者军警指挥

而造成的混乱，还发生了抢劫和打劫。其中很多抢劫和打劫犯本来就是有前科的罪犯，他们趁火打劫，引起了很多不满。另外，救助不及时的民众也参加了一些冲击救援物资的行为，一度造成了与水灾同样可怕的人为治安灾难。

针对那次灾难中出现的灾民和政府对抗的局面，我曾经对一位美国朋友说，这是不是“很不美国”。他说，不是的。大家对“9·11”灾难发生后美国人“万众一心”的场景记忆犹新，不过那是因为政府和民众有共同的敌人。而在一场既是天灾又是人祸的灾难中，政府自然成了民众的出气筒。他说，这正是“很美国”的表现。

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在我们的雪灾中，这种局面出现过没有？这种“很美国”的场景是否出现在中国？我们又是否出现了“很中国”的场景？有几个中国老百姓不听政府的指挥？又有几个人在饿肚子、面对五十块钱一包方便面的时候会想到抗议？更不用说抢劫以及与政府对抗了。在中国刚刚过去的雪灾中，灾民积极配合，表现出超强的忍耐和理解，是度过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这样说，中美都遇到了百年一遇的灾难，却产生如此巨大差别，其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听话，比较容易管理，而且又有超强的忍耐力。不管老百姓是否因为素质高（或者低）而遵守要求，不管老百姓是被教育得（或者因为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从而变得）逆来顺受，也不管是因为他们看到一层又一层的军警，感到了害怕抑或为军警同志们的身体担心，他们顺服、听话和毫无怨言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段时间，中央电视台不断推出歌颂雪灾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的节目，称由于他们才使得我们取得了抗击雪灾的阶段性胜利。不可否认，没有广大的军警和公务员以及电力和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抗击雪

灾不可能取得胜利。然而，抗击雪灾要取得胜利，他们的工作要能够顺利开展，他们最应该感谢的却不应该是他们自己，而是人民——尤其是灾民。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有些怀疑了，那就是我上面对两个灾难的比较真的站得住脚吗？我的比较——包括所有的中国大陆作者的比较都是从哪里得来的证据？也就是说，他们关于美国灾难和中国灾难造成不同结果的比较是从哪里得到的材料？毫无疑问，对于这种灾难，一个人如果不依靠媒体的公开报道和政府的统计是不可能独自完成的，这就是说，当我们比较两次灾难造成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是在使用美国的媒体、官方和中国媒体及官方发布的结果来作比较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灾难发生后，美国的媒体唯一的工作就是挖出每一个尚未披露的秘密，揭露每一个公众有权利知道的真相。大家也看到，新奥尔良水灾后期的救灾和重建还算是成功的，但迄今为止，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媒体，也没有找出一个英雄模范大书特书。在美国民众看来，无论是军队警察还是公务员，救灾是他们的工作，人民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他们，就是让他们干这活的。

而在中国就截然不同了，迄今为止，全国各级政府“评选”出来的英雄模范和集体先进工作者应该已经超过上万人了，但是对于那场灾难的报道特别是追问，却是躲躲闪闪。一个中等城市停水停电达十天之久，当时的民众如何生活？有多少年老多病或者急需救治的患者没有活到解冻的那一天？武汉冰冻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两千多起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那么整个灾区又出现了多少交通事故，死了多少人？我当时在在的地区湖北随州，这个受灾不重的城市就在短短几天内发生了两起因为厚重的冰雪压塌房子而砸死砸伤农民的事件，那么整个灾区难道就只

像某些媒体公布的那样，才死了一百多人？那个在火车站被挤死的大学生后来被如何善后的？人被活活挤死在火车外，那么手持火车票的她是否得到了中国最赚钱的行业的赔偿？还有多少人被挤坏了？这次雪灾造成的国家损失可以用庞大的财政——老百姓的税钱填补，可受灾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农民工的损失是否有人补偿？

也许我们用来作为对比和研究的事实并不全面，甚至并不真实。特别是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机和报纸，那场雪灾因为被某些部门禁止报道和反思而渐渐成为一件遥远的记忆，又正被一幕幕表彰大会、授奖大会和英雄人物的特写这种中国特色新闻所代替。在这部英雄的剧中，灾民只不过是英雄们的道具和陪衬而已。

有时他们甚至连灾民这个陪衬都抛弃不用了。记得以前在歌颂宣传英雄典型时，电视和广播还经常拉几个民众，让他们现场发言，说几句歌颂英雄人物以及自己如何受到感动的话。可是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我注意到，他们竟然都是自说自话，在那里决定谁是英雄谁是好汉。公安部抢着推出自己的英雄，铁道部树立了更多典型，电力部门用金钱奖励模范，CCTV 用专门的时间歌颂战士和将军……灾民自然不属于任何部门！虽然他们是这场灾难中的主角，但被有关部门很快地忘记了。各部门说，自己的人如何了得，在雪灾中，疏散了几百万民众。可几百万民众就这样被一笔带过！几百万灾民的意义只不过是产生了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他们在歌颂自己的时候，是否可以先问一下几百万灾民对他们的疏散是否满意？

什么叫以民为本？大家知道，这次抗雪救灾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具体领导抗灾的就是当地政府和军警。然而，在雪灾后选拔和树立英雄人物的也正是这相同单位的领导。我知道，作为一名中国人，对

这种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是有悖世界常理和人伦常情的。其实政府和军警是否做得好，不是靠电视和报纸反复歌颂几个英雄人物就能够忽悠民众的，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心里还有一杆秤。如果你做得好，老百姓是不会忘记的。而如果你做得不好，却想靠宣传和歌颂来忽悠老百姓，老百姓也是忘不了的。

我们说雪灾是天灾，并不是人为的灾难，既然发生了，从上到下积极面对，灾难过后，大家认真反思，群策群力。可是，民间的反思被官方掌握的媒体一刀切地屏蔽和删除，而官方却立即开始了忽悠民众的老一套。

一场百年难遇的雪灾几乎还没有完全过去，灾民们还在为损失痛心的时候，亲人们甚至还没有掩埋掉受难家属的尸骨，就有人急不可耐地要把那场灾难变成立功授奖的机会和歌功颂德的舞台。这种人实在是太有才了！

2008.03.02 广州

开启“民智”不如开启“官智”

在西方多年，最让我得意的就是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常常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政治报道与公众人物言行中的失误。我不止一次从电视上的政治报道或者公众人物的发言中发现错误，有时还会立即告诉身边的西方朋友，而当地的媒体，则要等到一两个小时后，才开始发出零星的批评之声，随后批评声就铺天盖地了。在西方，盯住官员与公众人物的言行进行挑刺是公民的义务和媒体的职责，但我毕竟是一名中国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眼光，还是挺自豪的。

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思想认识不清或者一时糊涂而说出不恰当的话、做出不恰当的事。小人物如我等犯过错误，大人物如奥巴马也无法幸免。还记得哈佛大学一位黑人教授被一名白人警察误以为是窃贼而遭刑拘的事，奥巴马在第一时间严词谴责这位警察“歧视黑人”的“令人愤怒”的行径，激起了轩然大波。奥巴马显然是失误了（那位白人警察只是尽警察的职责而已），但没有关系，意识到错误的奥巴马立即出来解释并向这位白人警察道歉，还请两位当事人（黑人教授与白人警察）到白宫做客，硬是把一件坏事弄成了一桩美谈。所以你看，其实领导

人、高级官员、公众人物也是人，也会犯我们这种普通人犯的错误，只要在别人指出或者自己觉悟后能够面对错误并有勇气改正过来，不但不会让他们失分，而且还会为他们加分。

中国的官员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越来越高，有些官员打破了以前的沉默，积极地在电视、平面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博客、微博）上与普通民众交流，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这就常常会暴露一些官员的真实水平，怎么办？我认为，不要怕说错话，说错了就出来认错，改正过来。不要害怕群众批评，不要以为自己比普通人厉害，更不要假装自己是永远光荣正确的人，乃至做报告、回答记者提问甚至写微博时，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开启民智”的德行。

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在急需开启的不是“民智”，而是“官智”。例如，正在北京开会的人民代表和委员们的发言与一举一动，都无法逃脱网民的视线，一旦发表了离谱或者不靠谱的言论，网民们就可以立即指出他们错在哪里，是违反了常识，还是罔顾事实，又或者他们正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甚至于他们公然违反了宪法，自打嘴巴，等等。

最近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竟然冒出一句“不要用法律当挡箭牌”。“民智”已开的网民们难免大吃一惊，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法律可是人民唯一可以用来有效保护自己的“挡箭牌”啊！想一想，如果没有了法律的保护，民众岂不是要任人宰割？

这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常识，它同民主国家记者可以合法采访、可以自由聚会这个基本事实一样，地球上往少里估算也有四五十亿的民众知道这回事，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上亿的网民们。难怪，当外交部发言人又把纽约时代广场不会允许那么多记者采访的话说出来后，连那些不但没有到过纽约时代广场、甚至都没有离开过自己出生地的网友

们都知道发言人错了。为啥这样简单的事实，外交部发言人也会搞错？

最近负责香港事务的一位官员说出了更加不靠谱的话，他在讲到香港人上街抗议政府的财政计划时，说香港太政治化。这说明他对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自由与法治的香港社会实在是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话说回来，无论是外交部发言人，还是负责香港事务的内地官员，真要想全面了解美国与香港，可能也有一定的困难（例如受外交纪律所限）。随着现在官员不再被要求死板地照本宣科，他们有时也想发挥几句，难免也就要说错话。说错话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些官员绝对不会出来认错，而似乎体制也绝对不允许他们出来认错。你可以对比一下，美国历史上几乎任何一届领导人，都至少一次（或者很多次）向全国民众、某个团体、媒体记者认过错，说过“对不起”。中国的官员应该认识到，世上最高的道德品质不是永不犯错，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是知错就改的道德勇气。官员有错就改，体制就多少拥有了部分纠错的功能。

“民智未开”成为很多官员愚弄民众、营私舞弊的挡箭牌。其实，“民智”易开，“官智”难搞。互联网就给大众提供了发挥“民智”的机遇与平台。从民众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判断来说，西方人利用平面媒体走了几百年的路，中国网民利用互联网十年就达到了一定程度。当我看到中国一些官员与公众人物失言，准备指出来的时候，互联网上早就炸开了锅，让我不得不佩服中国网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练就的“火眼金睛”。互联网时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被充分印证。

可怕的反倒是“官智”不开，或者官员们拒绝接受潮流，不许民

众监督、批评他们，一边愚民，一边拒绝开“官智”。更可怕的是，在中国，官员们还扮演着教育人民、引导民众的角色。一帮“官智”未开的官员在教育与引导“民智”已开的国民，能没有冲突？国家能够真正和谐吗？

2011.03.13

民生篇

动什么，不能动民众

全民医保太“恐怖”

一位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外科医生，为了让孩子能够考上精英中学，给学校老师送了两次信封，信封里总共装了2500澳币（相当于一万多人民币）。为什么要送钱呢？很简单，澳大利亚学校的考试不像中国一样决定胜负就在最后的升学考试，澳大利亚学校平时就会根据一些考试成绩和老师的观察给学生打一个分数，这个分数和升学考试的分数综合起来，才能决定孩子到底上什么学校。

那位医生给孩子的老师两大信封钞票时，还夹了一张纸条，意思是，我很想看到我儿子的各科成绩（特别是英语）都有显著的提高。

这位医生送完红包后以为没事了，可不久廉政公署来找他了。接下来是起诉，后来这个案子惊动了整个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法官看来，这是赤裸裸的贿赂，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原来，在医生离开后，那位打开信封的澳大利亚老师傻眼了，立即报了警。对于这位老师来说，身为老师，教育学生是自己的责任，一视同仁更是教师的基本职业标准，收下这些钱无疑是对教师身份的玷污。如果受这些钱支配，那就有可能是犯罪了。

这件案子对那位医生很不利，据说他已经输定了。

可是，这位据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家长医生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说了一句刺痛我们广大中国人的话。他在法庭上解释，他不是行贿受贿，只是为了感激老师对孩子的照顾。就在大家对这种说法半信半疑的时候，他补充说，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这是我们两国文化差异造成的。

不错，我们中国的孔子确实说过，去见老师啊，带两条干鱼吧。这就是表示我们尊师的方式。可文化是前进的啊，西方在学校没有公立公办的时候，你要拜师，你要学手艺，也要送礼、送钱的，甚至被剥削劳动啊。可那是什么年代啊。现在全世界都与时俱进了，怎么还在拿所谓中国文化为自己辩护？现在中国大陆的家长据说为了让老师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是要请客送礼的，那些老师难道不是本来就应该照顾好你们的孩子吗？我想知道，有哪一个家长在给孩子的老师送礼的时候，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迫使他们这样做的？

再说，澳大利亚有三十万华人华侨，还有第二个中国家长封了2500澳币给老师作为感谢？难道我们这三十万澳大利亚华人华侨就都没有文化了？

这位华人在国内是外科医生，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些更不愉快的事。十五年前，帮一位香港朋友在国内联系外科医生动脑部肿瘤的手术，交了昂贵的费用后，医生暗示手术时还要送红包，最后那位香港朋友无奈地送出了一万元的大红包，手术很成功。

据说现在在中国，不少外科医生动手术都要收红包，否则你就要担心他们在你亲人身体上划下去的刀子是救命的还是要命的，而我们那位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外科医生，一定受到了这种“中国文化”的熏陶。

不好意思，回到正题，关于澳大利亚全民医保的故事。

澳大利亚可能是世界上全民医保做得最好的国家，远远强过美国，这也是我把儿子放在澳大利亚不放在美国的原因之一。在澳大利亚只要你拥有一个医疗卡，看病基本都不要钱。而且，所有的医生只要看一个病人，就收三十多澳币（相当于一百多人民币），这钱从哪里来？当然是由国家医保那里出，也就是全民上交的税钱的一部分。

这个制度好不好？当然好，你们没发现我每年都偷偷去几次澳大利亚吗？我去干吗？去看病啊——开玩笑的，别当真，我除了有时身体有些虚之外，啥病都没有。

可当我一知道澳大利亚有这样的全民医保制度后就暗中为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捏了一把汗，为啥？因为这个制度实在太大方了，稍微不注意，就会有人钻漏洞，澳大利亚政府受不了的，最终吃亏的还是纳税人。

可我担心了好久，都没有问题出现，就在我不再担心的时候，却突然爆出了一件案子，惊动了澳大利亚。

原来，一位不良医生和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好像还包括街坊邻居）串通好，于是那些亲戚朋友们每天不停地来“看病”，可能有时根本不来，只提前或者事后签个名，于是这位澳大利亚医生一天竟然看了一百多位病人。大家算一下，一百多个病人，每看一个，医生就收相当于一百多元人民币的诊金，这位医生一天收入多少？一万多元人民币啊！按照澳大利亚全民医保的规定，来看病的病人如果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数字，一分钱也不用出。那么就是说，那位不良医生每天欺骗来的钱都是从澳大利亚政府国库里拿的钱，也是澳大利亚老百姓交上去的税金。

这正是我当时了解到这个医保制度后所担心的。虽然澳大利亚至今公开的只有这一例，而且已经得到了严肃的法办，可这漏洞还在那里，想一下，是不是很可怕？

但你不用担心，在澳大利亚这种制度性的漏洞还有很多，可去钻这些漏洞的人却越来越少，少到几乎没有。

就在我刚刚回到广州时，又听到一个好消息，中国的医保方案公布了。这个医保方案和前几天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都是很让人鼓舞的。至少可以这样说，是和国际先进文化和生产力接轨的重要一步。

特别是医保方案，我能够感觉到，如果成功执行，十几年后，我们国家的全民医保真不亚于西方国家。如果有了完善的全民医保，我就不用偷偷摸摸跑到别国去看病，很不光彩地花人家纳税人的钱看我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病了。

从长远来看，这医保计划几乎可以和西方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相媲美。可问题是，我们有适应这种从外面引进的全民医保的文化和制度吗？这种从外面引进的制度肯定是有漏洞的，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制度，那样的道德水平，那样的职业道德标准，那样的环境，那样素质的民众……情况会如何？

西方是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医院大多是私人的，私人投资医疗也是主流，所以就有了竞争，有了竞争，就有了选择，也就保证了医疗的质量。我们呢？公立医院始终是独大，谁来保证质量？在全民医保的盛宴下，会有很大问题的。

当然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大的制度，如果没有很好的制衡和防腐败的机制，加上中国文化造成的有一点小权就要贪污腐败一下的中国特色，我很想知道，在中国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到后来，一定会出现没有病的人发了大财，有病的人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腐败深入到这种外来的制度中，最后弄得国家财政紧张，普通百姓又得不到好处，搞不好

真要国破（产）人亡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别笑我又扯到核心价值观上了。你们也注意到，我们一边和国际接轨，一边拼命把人家先进的东西搬进来（人权啊，劳动合同法啊，全民医保啊，教师待遇啊，等等），一边却在那里拼命抵触支撑这些东西的价值观。这样下去，大家好像生活在冰与火之中，搞不好会精神分裂的。

2009.04.16

食物还是出口的好

8月17日《新闻联播》播报了关于《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的相关新闻，白皮书显示，“中国食品总体合格率稳步提升。全国食品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从去年的77.9%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85.1%，同时，中国食品出口到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中国出口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

回忆了一下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十年是否看到过类似的新闻。结论是，没有！而且，以我对那两个国家的理解，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如果公布的食品安全白皮书上有上面的那些内容，我相信，这两个政府都会备受批评的。

没错，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也不是百分之百，再说我们国家发展的水平还差很多，没有必要用人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说实话，中国一年的食品合格率提高了5%，确实说明政府以前的失职，而不能说是今年取得了成绩。但即便这样，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有必要钻牛角尖。

可是，我还是认为，如果上面引用的白皮书中的两句话出现在美国

或者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白皮书中，民众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政府。

为什么？

请大家看看那两个百分比，一个是今年国内食品安全合格率——85.1%，去年只有77.9%，前年呢，前年的前年呢……一个是过去多少年来中国出口到欧、美、日、澳等全球200多个国家的食品合格率——一直在99%以上，今年达到99.9%！

对不起，各位！我就是被上面这几个百分比震住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不会为国家出口食品的合格率达到99.9%而自豪，我也不会为我们国内食品合格率只有85.1%而自卑。可是，我会为我的同胞消费食品的合格率与他们出口给外国人享受的食品合格率相差15个百分点而感到可悲和气愤！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不管日本还是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出口到中国的食品合格率绝对不会高于供其国内公民消费食品的合格率，更不会高出15%！因为这些民众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清楚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如果用来供外国人消费的出口食品的合格率远远高于国内民众消费食品的合格率，民众会毫不犹豫地让那个关心外国人超过自己的国民、注意国际形象而忽略本国国民的感受、重视出口赚外汇而不重视国民身体健康的政府滚蛋！

2007.08.17

在中美两国开车，不是堵与不堵

从广州开车到深圳，刚过新塘不久，后面就传来警笛声。这个时候车虽不多，但毕竟是广深高速，三条道上都有车在行驶，所以警笛在我后面响了好一会儿。等有了空隙，这车“呜呜”叫着从我右边超了过去，原来是一辆带“广”字头的广州军区的车。军车超过我之后，没走多远，就又被堵住了。我看到，如果前面的车想让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让出快车道，或者和旁边的车拉开距离，鸣笛的军车就能过去，可是没有一辆车这样做。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好多事，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公里的高速路上，我紧跟这部闪烁警灯鸣着警笛的军车寸步不放，一直来到东莞境内。

这可是享受高速路上的“警车开道”，可哪里想到，仅仅三十公里，简直把我辛苦死了。原来，这一路警灯警笛没有闲下来，可不但没有车让出快车道，即便有条件闪避的时候，也没有一辆车主动让开，结果可想而知，那辆任务中的军车几乎是一路避让绕行，我也跟着它走了三十公里的S型，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就慢了下来。

高速路上的军警车警笛嗡鸣的时候并不多，也许速度太快不好让

道。但在城市街道和普通公路上，“你的警灯闪你的，我自岿然不动”的情景太常见了。这种景象常常让我困扰，因为没有什么比警灯警笛更能展现一个国家的权威和权力了，而中国人应该是最屈服于权力的民众。可是，如果你把中国司机对待警灯的态度和西方其他国家一比，你就会发现，把警灯不当一回事的反而是中国人。

世界各地闪烁的警灯常常让我驻足思考。我对警灯的关注当然也不止一天了。在澳大利亚、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开车的我，最害怕的就是听到警车声音，因为我总是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闪避。其实，在西方和中国学习驾驶的那个小本子上，都有教导大家在看到执勤的警车和救护车时立即避让。如果你到澳大利亚、欧洲或者美国等地，当你听到远处传来警笛的声音时，你会注意到身边的车都会慢下来，等到看到那警车是朝他们方向开过来时，那条道上的车一定会停下来。

这一情况我当然并不陌生，但我还是被在美国时的一件事惊到了。在华盛顿南边的北弗吉尼亚，有一条在美国很有名的公路，叫哥伦比亚道。这条路很有历史，道路两边韵味十足，好像还有什么讲究；路面有起伏，但却笔直，是我以前经常开车散心的一条路。一次，我去吃晚饭，正好开车经过这条路，我正欣赏雨中的小道时，听到了警笛声从身后传来。

这条路虽然拓宽了，可仍是窄窄的两条，旁边救援车道非常窄，中间是修缮得很好的草坪。正在我不知道怎么避让的时候，一个让我惊讶的场景出现了，两排望不到头的车队，从我前面那部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辆又一辆迅速转向，车头朝两边滑开去。转眼间，我前面所有的车几乎都成了车头朝向左前方或者右前方，停止不动了。那景象好像摩西出红海时的感觉，摩西的手一挥，“水”向两边分开，以最不可

思议的形态静止在那里。

我当时被眼前整齐划一的好似军事训练的场面震到了，差一点就把车停在路中间。好在前面一辆车给我让了一点空间，我滑了过去，刚刚停好，后面那辆警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当时震惊于眼前所见，急忙找出相机，调正了车头，拍下了照片。当然，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由于警车已经离开了，刚才停得一动不动的车也已经开回到路上。在这张照片上，那些车显然还没有完全回到自己的道上，左边的比较靠左，右边的比较靠右，有些车因为没有错开，还毫不犹豫地开上草坪，而我由于闪避不及，还在比较居中的位置。

住在海外十几年，"呜呜"的警车从眼前过去当然是屡见不鲜。为什么这一次把我惊到了？我想，这和那条道有关。因为当时是下午六点左右的下班时间，这条有名的道路上挤满了下班的车辆。突然来了一辆警车，这个时候，你根本不能使用慢行或者走入其他道路来避让警车，唯一的办法就是所有的车都尽量向两边靠，留出中间狭小的空间。只要有一两辆车不这样做，警车就无法通过。而且，那条道是美国最著名的起伏直道，一眼望不到边，就因为听到了警笛声，路上我目力所及的大概有上百辆车，竟然如此齐刷刷地转动了方向盘，停了下来。

美国人一向对军警和权力不当一回事。可是，看到他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国佬如此敬畏一辆也不知道去干啥的警车，我真的有点感动。这也是为什么我电脑里始终保存着这张拍摄失败了的照片。

从我看见这部左避右闪的军车，我就一直在想：如果这辆军车真是去执行军事任务，去保卫国家，去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坐在车里面的军人的心里会不会升起一种悲哀？超过上百辆的车竟然没有一辆主动避让。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就要开打前夕，海南军分区司令员驱车从海口到三亚海军榆林基地视察，车到途中，被一辆慢吞吞行驶的大货车挡住了。当时的路很窄，只要那部大卡车不主动让路，司令员的车还真就挤不过去。可任凭那司令员的司机如何闪警灯按喇叭，那大货车司机只当没有听到，就是不让，大概足足有半个多小时，司令员的车终于在一个弯道超了过去。超过去后的司令员命令司机立即停车，截停大卡车，然后怒不可遏的司令员掏出手枪，就把大货车的轮胎给击破了。

这事后来传出来，几乎没有人说司令员做得过火，按照相关法律，这种故意阻拦军警执行任务的行为是要受到起诉的，中国是这样，西方也如此。可是，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却发现，最害怕军警，常常匍匐在权力脚下的民众，却偏偏是最不敬畏警灯警笛的人；而从来不必害怕军警，甚至往往不把军警放在眼里的西方人，却对警灯警笛言听计从，一副随时听从召唤的样子。

是的，不是老百姓不敬畏和尊重象征权力的警灯，而是我们的执法者太多次滥用这种权力了，当统治者使用特权愚弄了民众，民众就对那些正当与合法的权力也产生了蔑视。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军警车辆在不执行任务时，甚至以前在送老婆孩子的时候，也总是无视交通规则，甚至闯红灯。就在他们每一次玷污权力的时候，那本该受到民众敬重的用于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权力也受到了侵蚀和轻视。

好了，最后再讲一个故事。那是二十年前了，有一次在广州环市路区庄立交附近的远洋宾馆的一家潮州菜馆吃饭，当时在场的都是政法系统的领导。菜开始上的时候，一位领导突然提到他办公室里有一瓶什么法国出产的限量的洋酒，另外几位一听就起哄，说立即去拿吧，好久

没有喝那酒了。于是，领导招呼司机进来，让他马上开车去取。过了十几分钟，那位领导说怎么还没有到啊（办公室就在离远洋宾馆不远的农林下路附近）。我就起身走到窗边查看，这时，我看到闪烁的警灯由远及近，车停到宾馆门前时，那临时放到车顶的警灯几乎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看到那位领导的司机抱了一个大盒子从皇冠车里爬出来，两个健步就冲进宾馆。原来，司机开着警灯警笛在最快的时间里取来了洋酒。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想指责什么人和机构。我自己前后对权力的看法与理解，让我知道哪些权力是必须摈弃的毒素，哪些权力应该珍惜，哪些权力是用来保卫国家和保护民众所必需的。

如何让民众不再害怕军警，同时又对真正执行任务的警灯怀有敬畏，可以说是检验军警持有的公权力是否合法与合理的试金石。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只有当权者遵纪守法，民众才会认同法比天大的道理，只有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民众才会对权威保持应有的理解与尊重。

2010.03.03 香港

穷人心理都不正常？

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报纸杂志上常常报道发家致富的事迹，这些人是在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指引下最先抓到老鼠的好猫，俗称万元户。这些人有靠摆摊发家的，有靠搞运输发财的，更多的是靠小工厂发迹。我和周围的人一样，对这些万元户是充满了佩服和向往的。

那时可能早就有了靠不正常手段发家致富的人，但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至少我们看到的万元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中的一员。虽然这种印象被80年代后期不断爆出的贪污腐败案破坏了，但总体感觉“邪不压正”，总觉得大多数致富的人还是靠自己的双手。

可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老百姓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进入到90年代，这种变化就越来越明显了。最先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是富翁们自己，他们开始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了。整个90年代，中国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诞生新富翁，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用了十年时间，而千万富翁取代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取代千万富翁则越来越短，仿佛一夜之间，致富易如反掌了。

这种看上去越来越容易的致富，渐渐疏远了普通老百姓，也让他们知道了致富与自己越来越无缘了。如果说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你可以摆个小摊，起早贪黑，靠出卖自己的脑力和劳力赚钱，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你要想大富大贵，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出卖了。而这时，最容易致富和换钱的就是公权力、整个国家的道德底线，还有良心。

这个时候，民众依然渴望致富，但对于普通民众，靠勤劳和智慧致富几乎比买彩票中奖还要难。对于大多数人，致富变成了幻想，而仇富则成了天经地义的。

我不知道西方或者整个世界，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经历了多长时间，对于中国，也就是十几二十年。这个变化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可以理解的反而是整个社会对致富和富翁们的态度。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有仇富心理，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多大年纪，但从他们的心理年纪来判断，一定是80后。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一点也不仇富——当大家看到你的财富如何得来，当大家知道你如何致富的时候，他们对富人充满了敬意和向往。

可以这样说，“白猫黑猫”理论是有其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的。中国人被管死，国家被管死的时间太长了，老百姓发财致富的主观愿望与能动性被压抑得太久。在百废待兴的时候，邓小平的号召在民间起到了比任何政策都有效的作用。当时，能炒瓜子的就去炒瓜子，能蹬三轮的就去蹬三轮，会种水果的不再种粮食……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最有利可图的发财资本。可同时问题也就出现了，这一“白猫黑猫”理论也很快渗透到党政机关，国家干部也开始加入致富的行列，不管白猫黑猫地去抓老鼠了，于是倒卖批文、划地圈地、收受贿赂等都应运而生。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一理论不但与时俱进，反而更上一层楼了。我们毫无保留地引进了资本主义那一套市场经济，却把另外一套用来调节和限制市场经济的民主机制（特别是监督机制）摒弃在外了。

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底线被拍卖，底线一再被突破；公权力都被投入到自由市场待价而沽，其他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制约的游戏规则被我们拒绝，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普通中国人眼里，富翁不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级，类似于以出身来划分的那种阶级——是天生带来的，或者命中注定的。

当发财致富不再是普通民众可以望其项背的事，当富翁是一生出来就被注定了的时候，仇富变成了理所当然。于是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老先生成了众矢之的。

茅老可能至今也没有搞懂他为什么受到攻击，颇感委屈。他老人家不清楚的是，他和攻击他的人都没有错，他们在两个语境中对话，一个在讲经济，一个在说政治。当茅老从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为富人说话的时候，那些攻击他的人却在宣告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发财致富不再是经济问题，也不再是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经常听到有识之士摇头叹气，为社会上的仇富风气担忧，认为这样下去对中国发展不利，可他们倒是很少去担心那个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正在对大多数的老百姓不利。

当今中国的富翁比二十和三十年前要多得多了，可媒体报道却少之又少。现在，如果还有媒体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推出一个典型富翁，那无异于对那个富翁的公开预审。富翁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不再张扬。可民众的仇富心理却在与日俱增，上个星期，一群工人殴打一位私企经理致死，我听到的竟然是一片痛快之声。其实这

一现象早就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一个大陆的富翁被抓起来，民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欢呼雀跃。

我并不同意中国人有仇富情节这个说法，除了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中国人对于国富民弱是可以容忍的。在过往观察国际问题时，我常常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中国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要到一百位以后，属于发展中国家中不富裕的，但中国政府却是一个富有的政府，国家公务员用公费出国的比例可能也是全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一个稍微有点级别的领导人出国就大摆排场，在国际上大摆面子。

这种现象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民众早就不满到要上街游行了，毕竟一个国家所有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得来的。国家花的钱都是大家的，政府花多了，用到老百姓身上的自然就少了。可受到几十年特殊教育的中国人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家有面子，强大了，是好事，即便老百姓穷点，少分点钱，也值得。中国人不管多穷，即便勒紧裤腰带，也不会让国家没有面子。这样的老百姓在世界上已经成为稀有品种了，主掌这样国家的政府，应该为此感谢苍天。

中国的精英和国外的观察家们早就清楚如下的现象：中国强大了，老百姓平均的生活水平却并不高。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比西方发达国家快了几倍，可中国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速度却比人家慢很多。要知道，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工资增长水平比美国的快了70%。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都被国家拿走了，老百姓就算继续勒紧裤腰带，也不会仇富或者口出怨言的。问题在于，随着资讯的发达、互联网的成长和媒体的开放，普通百姓越来越看清楚，改革开放

的红利都被一小撮富翁和权贵占为己有了，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往往打着国家的牌子。大家不妨看看各地征地、拆迁，本来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商业行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用市场规律可以搞定的，可是各地都出动了维护国家政权的警察来对付弱势民众。这是最典型的拿国家来帮助富人发财致富的例子。

中国人不患寡，只患不均，这个不均并不完全是说的平均，而更多的是包含了公正、公平与合理。老百姓为什么一看到有富翁被逮捕就咬牙切齿，甚至认为抓到的每一个都该杀？因为让富人们致富的游戏规则本身就违反了国家法律和老百姓心里朴素的价值观，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被民众监督的权贵市场经济，很多富人的致富之路也就是权钱勾结的犯罪之路。

如果问中国富人的出路在哪里，一定有恶搞的朋友说，当然是国外。这话一点不假，我想，中国当今的富人们即便没有外国护照，没有把孩子送到海外，那么也一定转移了可以供几代人享受的资产到国外——特别是某些西方国家。即便一些新富们，也一定在积极打算“走出去”。

其实，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哪一个毛孔是那么干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富人积累财富的过程并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要邪恶和凶残。问题在于，那些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已经走出了困境，而我们的情况却难以改观：贫富差距在扩大，仇富情绪在扩张。更糟糕的是，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看过几本书的人都清楚，我们至今放着河上的桥不走，还在小河沟里摸着石头过河。也难怪，从官员到富翁，到普通老百姓，心里几乎都感觉到，这样故意摸来摸去，总有人要淹死的。所以，能够转移，就转移吧。应了路易十五的话：我死

后，哪怕洪水滔天。

过往的社会变革大体可以归结为两条路子：民众自下而上的革命和由精英主导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由民众的革命推动的，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可见要想社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应该是上下一起动，政治、财富和知识精英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拿中国目前来说，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精英和富翁们应该反思一下，如何明确致富的游戏规则，如何用良性的互动推动社会进步，从而也让他们已经获得的财富合法化，让今后所有致富的行为合法化。否则，他们除了转移资产到国外的这条出路，就是等着中纪委半夜来敲门——或者更坏的结果，等到老百姓来收回自己应得的那份。

我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香港开会。香港是一个贫富差距并不小的地区，可我没有在香港感受到强烈的仇富情绪。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开会所在地的香港理工大学，置身在校园的时候，四周一望，几乎所有的楼房上都是香港富翁的名字。原来这些发财了的香港富人，不忘回馈社会，对慈善和教育事业多有捐出。

我很感叹，和内地的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说，内地大学的楼房也越来越多以富翁的名字命名啊。我问他们是哪些富翁，他们开口说出了一串名字，我一听，又是我熟悉的港澳台富人的名字，内地富翁的几乎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主要是内地富人主张不高调，投入教育事业，建造一个教学楼，很容易成为别人目光的焦点。于是，和港澳台以及国外一些富翁们争着“包养”大学楼相反，中国大陆富翁们投入大笔的钱包养年轻的女大学生，包养二奶。

还有一个原因，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富翁们很清楚。他们能够致富，除了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机遇之外，和社会认同的致富游戏规则分不开，没有公平、公正和合法的游戏规则，富裕起来的不一定是他们。于是当他们富裕了，很多时候想到的是回馈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大陆的富人们对公益和教育事业兴趣不大，但对于投资政府官员和权贵，却很热衷。他们很清楚，让他们致富的是官员，于是他们要回馈的不是社会而是官员。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每一个富翁落入法网，其背后就能够牵扯出一长串贪官污吏；而每抓一个贪官污吏，又都能够顺藤摸瓜逮捕一大溜“包养”他们的富翁。

普通民众都怀有一个善良的愿望，期待权贵和借助体制先富起来的人也许会慢慢变得善良一些，更有责任一些，愿意制定一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看到希望的游戏规则。可没有想到，一些富人继续帮凶，甚至主动作恶。他们把公仆变成了自己的家奴，随后，他们和自己的家奴一起，把国家的主人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仆人。

一个富人再怎么剥削人，甚至花钱去道德败坏，他损害的只是他的雇员和少数愿意被他玩弄的女人。可当这些无良的富人学会了权钱交易的时候，当他们用那些肮脏的钱和官员一起同流合污、继续坑害老百姓的时候，他们污染的是整个国家，损害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民众。中国的仇富，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这些原因吧？

2009.08.04

民众是什么级别

深圳一位涉嫌猥亵女童的五十八岁官员在遭到家长质疑的时候，叫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句：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后来有比他“级别”更高的官员出来道歉，说是这位深圳海事局的喝高了。这话我相信，因为对这种长期受到教育的官员，只有喝醉了的时候，才会说出真心话。否则，他们满嘴谎言，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这位官员酒后吐真言，让中国民众再次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育。说实话，如果他不是在猥亵一个女童后，说出来这样一句关于自己“级别”的话，我们有理由有办法有能力愤怒吗？例如当他用这样的话压制民众，用这样的话耀武扬威，用这样的话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的时候，民众有几个有渠道、有办法、有能力、有胆量对抗一个和你们市长一样级别的官员？

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官民分化和官民对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宿命，但不要忘记了，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突飞猛进，中国也不能走回头路了。可是在一些官员

心目中，不但官员高人一等，而且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一个深圳市，他喊出了“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就可以压住平民百姓了。这次之所以没有压住，弄得满城风雨，恰恰在于“酒后吐真言”。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他不说这句话，如果不是有很多不屈不挠的目击证人，如果他只是暗暗用自己那“和市长一样的级别”来对付普通百姓，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你是生活在我们这块神奇土地上的民众，如果不是生活在某个利益集团的象牙塔里，你的经验绝对会让你对这样“级别”的官员的能力深信不疑。别说级别都和“市长一样高了”，就算一个小镇长、处长、科长、股长，也绝对可以摆平民众的。

写到这里，感到有些悲哀，禁不住想问一句，在这些官员眼里，民众到底是什么级别？

无论从我们的宪法还是每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文件，民众在他们口中都是级别最高的，他们就是为民众服务的。他们是民众的公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民众的。最后干脆直接说，他们就代表民众的利益！

那么，谁能够告诉我中国民众是什么级别？

问过这个问题后，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幕场景：一位道德败坏的官员突然对我吼道，我是和你们市长一样级别的，你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算个屁呀！

我听后反问道，你知道我是什么级别吗？那家伙听后一愣，他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就很冷酷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枪，瞄准他那颗腐败的心脏，在扣动扳机前，很酷地说，我的级别嘛，在我们的国名中，我排在“共和国”三个字的前面，我的“级别”比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还高。现在，我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啪啪”！过瘾，过瘾！——不过，太残酷了，而且，落于俗套，或者说是我没有逃脱当年被灌输的那些鲜活的画面。

那么，我们这些普通的民众在面对那些一层一层“级别”的官员们时，有什么办法呢？难道真要等着他们来一个一个“收拾”我们？要知道，部长下面有局长，局长下面有处长，处长下面还有科长和科员，最后才轮到平头百姓。

最近有一则新闻让我激动万分夜不能寐。这是一则假记者领取红包的新闻。话说某地发生矿难，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奔走相告，结果一些记者和更多的社会闲杂人员蜂拥而至，个个自称记者，来采访报道死伤人数。当地官员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不让消息外露，给那些真假记者共四百八十人发了二十万元（人民的币）的红包，作为封口费，点头哈腰送走了真假记者，皆大欢喜。据报道，真记者只有少数几个，绝大多数都是假的，事情曝光后，舆论哗然。

哗然的舆论自然是辱骂一片。有的骂真记者缺乏职业道德，有的骂假记者缺乏人格，更多的骂当地政府官员既没有人格也没有官德。不过，我认为，骂声一片都不得要领，要是我说的话，我们应该欢呼雀跃，何止欢呼？在看到深圳海事局那个新闻后，重温真假记者发财记的新闻，我是老泪纵横、喜不自禁呀。

这条新闻不正说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正在日新月异地进步，正在朝着光明的前途奋进？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有官员害怕民众揭露真相而给他们封红包打发他们离开的？几千年历史上，民众敢揭露真相，即便不被打死，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哪里有红包？

即便是今天，大家能够想到官员给你送红包吗？作为中国的普通民

众，或者换一个说法：非官员的人民——除了你是在家务农或者属于城市“窝囊废”之外，我们哪一个没有给政府官员送过红包之类的？

可是，这则新闻却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分明看到了官员放下架子，给记者，特别是假记者——这些非官员的人民——送红包，你真没有看出社会的进步？乱骂一通干啥？

我再弱弱地问一声，这些真假记者是什么级别呢？怎么让我们的地方官员如此害怕？如此礼贤下士？如此爱民如子到封红包？难道他们是北京派来的，难道“级别和你们的市长一样高”？要不然，我们真想不通呀，有级别的官员怎么会给没有级别的民众送红包？

好吧，让我们来拆穿那些官员害怕什么。他们不是害怕民众的级别，他们害怕的是真相，害怕的是言论自由，害怕的是民众的监督和互联网相对自由的舆论和民意！

有记者证的就叫记者？没有记者证的就不是记者？记者是揭露真相的，但有些拿记者证的只收红包，专门负责掩盖真相。而很多没有记者证的中国公民，却在生活中随时记录下真实，揭露真相。但是民众没有记者证，民众看到真实，不掩盖真相，民众就是公民记者，民众的级别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

不过事实上，看起来，民众是有“级别”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美国正在实行大选，我们看到，无论是共和党抑或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们即将掌握的权力应该属于人类历史上级别最高的，但连他们自己心里都清楚，比他们级别更高的是民众——美国的普通民众。民众将用选票决定他们的级别，同样用选票评定他们的成绩，决定他们的去留和历史地位。

在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里，从上到下都应该有一个共识：这个国家

"级别"最高的是民众。

对于长期生活在有级别的官员统治下的民众，他们对级别那夹杂着鄙视、崇拜和无奈的复杂感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正如三岁小孩都知道的，在当今官场，要想提高级别是一定要付出的，例如副厅到正厅，正厅到副省，都需要一定量的固定打点费用和人际关系。同样的道理，民众的地位和级别的提高也不会是免费的午餐。

然而，我真的很不想看到那种用冒充假记者的方法来提高我们面对官员时的级别。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我认为在现阶段，最好的就是言论自由，媒体开放，允许民众说话，让那些有级别的官员真正接受民众的监督。这样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

说到这里，该澄清一下。因为我一直在使用级别这个词，我怕有人会误会我满脑子都是等级和级别观念。其实，级别还是很重要的，有了级别才有待遇。我想提高民众在国家的级别，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举个例子，在说到级别的时候，最近又有一则新闻可以让我们这样理解，在中国，民众的级别是挺重要的。

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中国人——普通的中国民众也是有级别的，级别不同，待遇迥异。

我说的中国人是指大陆的中国人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人，我说的新闻是大陆海协会日前致函台湾，就毒奶粉事件给台湾造成的危害向台湾普通消费者和民众正式道歉，说对不起。

这件事其实是我一直主张并写博文支持的，按说，我应该为海协会的行为而欣喜若狂、老泪纵横，可是现在看这篇新闻，我却和看假记者新闻的感觉正好相反，我不由得悲痛欲绝。

在毒奶粉事件中，台湾民众虽然受到了伤害，但比起大陆那么多

民众，比起我们成千上万的苦命的孩子，他们那点伤害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人家就得到了道歉，人家就有海协会会长说声“对不起”。

我又忍不住弱弱地问一声，你们什么时候对我们这些大陆的民众道歉，说一声“对不起”？

难道大陆十几亿民众的级别还不能让那些比海协会级别高一点的人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

2008.11.01

都是“弱势群体”惹的祸

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以大篇幅报道官场“弱势”群体画像，描画“弱势”心态在中国蔓延，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统计数据显示：73.5% 的网民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公司白领有 57.8%，知识分子的比例是 55.4%，就连天之骄子党政干部，也有高达 45.1% 的认为自己属于“弱势”。

就在昨天，我这个“弱势”遭遇了更大的“弱势”，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网络风波。我带八十二岁的父亲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打针（广州只此一家），感觉他们的排队程序不合理，弄得父亲和一群中年人一起等了好几个小时，体力不支，我就去问护士：“为什么等这么久？”结果她立即回了一句：“大家都在等，你没看到？”这让我挺生气，虽然她态度马上有改变，我们也没有争论，但我还是把我对护士的“生气”发到了微博，结果竟然有十几位网友指责我“欺负弱势”、“不换位思考”，甚至上升到“恃强凌弱”。我一看，坏菜了，还是删掉吧，再这样辩论下去，我都快成“特殊利益集团”了。

我当时之所以会生气，正是因为觉得八十二岁的父亲是弱势，医院

一点也不考虑这种不合理安排（不是先来后到，而是全体一起看病，一起打针，先来的都得一起等到最后），才理直气壮，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气还没有撒出来，那个护士就成了护士这个弱势群体的总代表。

这是关于我八十二岁的老爸的故事，还有一件让我郁闷的事是关于我十八岁的儿子。如果用中国目前的标准去划分澳大利亚的“弱势群体”，毫无疑问，新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肯定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之一，除了少部分贪官污吏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一穷二白”来到澳大利亚的，和澳大利亚当地有地有房的白人没法比。这种“弱势”心理使得澳大利亚华人加倍勤奋与努力，付出更多的代价去建家立业、发财致富，可喜的是，绝大多数还真的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

但即便成功了，那种“弱势心态”依然存在，尤其反映在对子女的要求上。说好听点，就是对孩子严格要求，希望他们好好学习，说白了，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要读最热门最赚钱的专业，进入主流社会认可的热门行业。我当然也不能脱俗。好在儿子成绩相当不错，要考取最好大学的最热门专业也不是问题，可是，在考试前不久，他突然向我们宣布，他的理想是去开飞机。

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开飞机，工作不但没有保障，而且仅仅培训费就将近 15 万澳币。再说，你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富翁是开飞机发财的？可是儿子很明确地说，这是他的 passion(强烈爱好)。我想告诉他，爱好能够养家糊口吗，爱好能……我突然意识到，儿子的心态已经与我的“弱势心态”不同了。实事求是地说，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即便不去当医生、律师和商人，恐怕也不会没饭吃，也不会流落街头，或者就成了“弱势”。在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的社会，跟着感觉走，追寻理想，变得也轻松多了。

在澳大利亚，你要在老板和工人中明确划分“强势”与“弱势”还真有些困难。你当老板雇佣工人，按说够强的，可国家的各种法律和规定，让你在同工人打交道时，往往处于“弱势”。工人呢？却得到很多保障，有国家强制老板提供的，也有国家嫌老板做不来而征收税收进行再分配，用之于工人的。你要说老板不好当吧，可别忘记，老板是纳税大户，很多时候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通过自己的金钱控制的媒体与代言人等），更重要的是，法律保证他们拥有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我们大家可以记忆的这几十年里，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澳大利亚的富人被剥夺过财产？中产阶级被人抄过家？老百姓的房子被人强制拆迁过？

海内外的评论大体把中国这种“弱势蔓延”的心态归咎于收入达不到预期、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生活压力大、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等，这是有一定根据和道理的。但最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归纳到缺乏制度与法治保障。一个公正、公平与均富的社会，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一个有法治保障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自己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人，抱持“弱势心态”的人群自然会大大减少。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法治不彰，穷人可能被富人欺负，富人的财富可能被权贵鲸吞，权贵则可能被更大的权贵折磨与玩弄，最大的那几个权贵被“民意”折磨……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弱势群体”，又同时会被更加“弱势”的人认为是“强势群体”。

在西方社会学的语境中，“弱势群体”只是指那些社会边缘人如流浪汉、妓女、长期失业人士等，早就不再把工人、农民或者小摊小贩当成“弱势群体”了，“弱势群体”始终占人口中很小的一个比例，成为大众关注与救济的对象。可到了我们这里，这“弱势群体”竟然占了绝大部分，算起来会不会有七八个亿？连得天独厚的党政干部，都有将近

一半自认“弱势”。一个“弱势”充斥的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与和谐吗？当“弱势群体”的队伍日渐壮大，“强大”到接近80%的时候，那些“强势群体”还强得起来吗？

2004年我从国外回来，开始写自己的小说，我第一次猛然意识到，威胁这个国家、危及中华民族、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最“致命武器”不是什么外国人的飞机大炮，不是西方的间谍特务，而是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弄出来的这么大一群“弱势群体”……

母亲离开后，我翻看她留给我的遗物，发现了那本她老人家翻烂了的我的小说，母亲在封页里写着：“2006年6月8日……如果在政人员看了可能有很大的帮助对人民有好处。”

我们弱势但不自暴自弃，我们坚韧且充满激情地去面对与改变中国人的“弱势”，在此，我愿与诸位再次分享我的座右铭：“三种简单但又强烈的激情支配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不堪忍受的悲哀！——罗素”

2010.12.10



教育篇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

西方教育让儿子失去了“理想”

看了我写儿子在西方上学的文章，很多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就教育问题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推动一些改革。我又何尝不想呢？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教育是头等大事。如果想要一个国家发生变化，最平和又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成人加强启蒙教育或者宣传洗脑，可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彻底发生变化，则非得从孩子的教育开始不可。

对成年人的思想控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控制了现在，就可以改变过去；改变了过去，也就掌握了未来。这说的是篡改历史和控制舆论的重要性。可如果在和平年代，我就认为这句话更具有普适意义：谁控制了孩子的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

当然，我这里说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的内容，是我们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多少人读书，多少人失学的问题。

我对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和我出国之后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那时我很想知道中西文化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只要在大陆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年轻人出国后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而在西方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移民第二代也无法再融入中国

大陆的社会——你能告诉我有一个海外出生的华人华侨能够从精神上回流到中国大陆的例子吗?

十几年前出国后，我除了老老实实潜伏下来，研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外，有段时间我一度把注意力转向教育。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甚至是经济，都不能最终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最终将由我们施于孩子身上的教育来决定。

于是，我先后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里申请了教育学硕士等课程，但都因为看不到显著效果而半途而废。可我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教育形式和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因此，我一度悲观地认为，与其任凭学校把那些垃圾和有害的东西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不如让他们当文盲。当文盲的话，他们总还有靠自己的天性和经历觉醒的一天，可一旦被灌输了那些所谓的“知识”和害人的价值观，他们就沦落为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知识人”了。

没有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可我自认对教育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从中国农村小学读起，又到多个国家读书，在四十多的高龄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经验也有教训吧。可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最终认定是教育的内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而我始终无法掌握外国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不可能再靠我一直自鸣得意的“实践”的方式到西方国家的小学、中学去“潜伏”，去取经。

可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没有想到，我对中西教育最大的灵感和收获却来自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国内读幼儿园，到美国和澳大利亚读小学，小儿子出生在国外。我对他们的教育一直很重视，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本能关心。可后来，

就在我对教育很迷茫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两个分别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从幼儿园一路读到高中和小学的儿子，却给了我另外一种启示。虽然我竭力在用自己认为是对的方式方法教育他们，然而，短短两年后，我就发现在教育上（包括世界观上）他们和我渐行渐远。那时我最想知道的是，澳大利亚人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在短短几年里，把我的儿子从我身边“夺走”？我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人，可面对他们学校整天放羊似的教育，我竟然显得无能为力！

插一句，说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放羊似的教育”，我要控诉：几乎就在儿子要考大学的前一年，他们竟然还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延长教学时间，早上九点才上课，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中间竟然还有那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读小学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读到四年级，竟然没有给我带回一本让我看看他在学什么的“课本”，到他教室去，竟然发现，他大部分时间是趴在地上一边玩耍一边听老师讲课的，我郁闷啊！想当初我在神州大地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早起晚归，忙得连偷看邻家女孩的时间都没有……

把自己和儿子一对比，我深深地感觉到，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的内容，而我们长成什么样的人，是在小学和中学就被决定了的。从那以后，我发现自己在研究教育上的“潜伏”毫无意义，反而是无意中以儿子做实验，让我感受良多，也最终让我明白，人是怎样被教育出来的，我为什么是我，我的儿子又和我有什么不同？以及，你为什么是你，那些年轻人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我并没有说哪种教育好哪种教育坏的意思。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的，特别是理工科的设置和内容几乎全盘西化；就连社会科学，各科目的设置也是从欧美以及前苏联引进的。唯一

有中国特色的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语文课文内容的设置，让我们有了中国特色。

一定有人认为我想攻击一番中国的教育。恰好相反，我非常需要“攻击”的正好是儿子所受的西方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十六岁了，快要高考了。我对大儿子影响比较大，从幼儿园就灌输他要“有所作为”，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可是正如我所说的，他已经从我对他的中国式的灌输渐渐走开。

我曾经按照我的父亲对待我的方式多次和儿子讨论理想，也就是今后想干啥事，想从事什么职业。一开始，他还能听我忽悠，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要当科学家，要当公务员，要当作家，要当……可最近一次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对我说，可以开一个卖东西的小店铺啊。

乖乖隆的咚！你不在中国，我就不怪你不想当雷锋、王杰、黄继光，但你至少也应该有当一名厅长、局长或者师长、团长的志向吧。再不济，你也应该搞个科学家、不拿工资的市长、总经理、作家什么的玩玩吧？没想到他的理想就是去开一个小商店。看到我横眉冷对怒发冲冠血脉贲张浑身上下气不打一处来的样子，儿子心态平和地说，能养活自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就很快乐了。

鉴于万恶的西方教育把我的大儿子搞得一点“理想”都没有了，我就立即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刚上四年级的小儿子身上。我要多和他交流，多引导引导他。特别是利用他回国的机会，我得让他从小心中有一些榜样。要知道，在中国的教育下，像小儿子这么大的孩子，早就从课本里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但有那么好的主席（主席的睡衣）、那么好的将军（朱德的扁担）、还有让孩子都能流出眼泪的“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

志，而且，九岁的中国孩子谁不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

可是，我郁闷地发现，我的那一套在小儿子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才多少年没有把他抱在怀里啊，竟然这么快就被澳大利亚的学校“洗脑”了？

很显然，我已经无法在儿子心中树立一些我认为是楷模的榜样，无论是什么“家”还是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小儿子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说到“当官的”，在他眼中，竟然和工人、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当官的”还没有一个拥有几匹马的农民酷。在儿子眼里，当官是不实际的，又不开工厂，又不卖东西，靠什么赚钱呢？靠税收养活的人，总要看纳税人的脸色，腰杆总是站不直的啊。所以大家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最优秀的人才，总是集中在创造财富、钻研科技、从事教育等领域，至于公仆的行列里，大多是碌碌无为的家伙。

在儿子们的学校，好像没有任何政治思想教育课，也没理想培养之类的课程。我曾经和八十岁的老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他和我一样感觉问题很严重。我们当时一起哀叹，这种（西方）国家，到时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干劲和理想？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理想、道德和中国式的思想教育这一课，就由我这个老爸来完成。

不幸的是，我失败了；更不幸的是，我从中国带出来的那一套是失败的；更更不幸的是，我那失败的一套正在教育全中国的孩子！

人家的孩子培养出来却能够让这个社会挺和谐的，甚至那些整天放羊似的教育却仍然培养出在科学技术和各方面都引导世界潮流的人才。而我们，一个最注重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国家，却培养出——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好不好——我这种到了四十岁还在迷茫和彷徨的人。

我再强调一句，区别不在于教育的方式方法，甚至不在于有多少人不识字，是文盲，更不在于我们的孩子是否从小学就开始加班加点学“知识”。问题的关键，也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2009.04.30

最牛的价值输出——高考噩梦

老同学相见，音容笑貌依然，然而二十五年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及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的滚打摸爬，足可以让我们“貌合神离”了。经过多年的努力，老同学们都打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除了对过去共同的记忆和对未来一些相同的憧憬之外，其他的相同之处确实不那么多了。不过，有一点却让我非常讶异，那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共同之处：我们都做过同一个梦——一个关于高考的噩梦！

关于高考带给我的噩梦，我一直担心那是我自己心理有问题。再说，考上一个大学，竟然做了二十年的噩梦，实在不是一件值得大说特说的光荣事。

在这次迟来的高中同学聚会上，我本不会提起，可是没想到一位当时成绩最好的同学在发言中突然提到了自己一直做高考噩梦的事，并对都已经有了“备战”高考的子女的老同学们告诫道：千万不要让你们的孩子为了一个高考，再做二十多年的噩梦，像我们一样。

话一旦被这位同学说开，真可谓群情激动，于是纷纷说起了自己的

高考噩梦。高考的紧张虽然得到了好成绩作为回报，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二十几年里，那种未成年时的过度紧张造成了经常性的噩梦：有的同学梦中发现到了考场却忘记带准考证；有的则发现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根本不是自己考上的那个大学；有的一路狂奔，只因起床晚了，错过了高考时间；有的正坐在考场打开试卷，却发现一道题都不会做，在梦中崩溃了；有的在梦中看到老师铁青的脸，意识到自己考砸了；有的在高考后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跳农门无望，继续在农田里"锄禾日当午"……

最后老同学们自然不忘记加一句：你的噩梦什么时候结束的？

对于其他人，这些梦境看上去也许并不那么可怕。但对于我们经历过残酷有如战场的高考的人来说，则绝对是噩梦，常常让我们在梦中惊醒，有时惊出一身冷汗。

这种噩梦对我们这整整一代所谓精英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也许只有未来的心理学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高考那种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还在"拼搏"的所谓"学习"，对我们这些尚在发育阶段的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摧残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人对高考制度提出过质疑，也有人从孩子们的身体状况角度提出过问题，但很少有人从孩子的心理健康层面探讨这一问题。也许心理学还不够完善，还无法深入研究下去，他们只认为自杀才是心理出现问题，却不知道另外一些心理问题可能更长久地影响一个人，以及他生活的这个社会。

放下心理学理论不提，对于高考的个中滋味，作为过来人，我感觉像是从一个战场幸存下来，不堪回首。加上我们对现有的应试制度也无能为力，所以只能漠然地看着一届又一届的高中生遭受同样的折磨。直

到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时，蓦然回首，后悔却已来不及，看来，我们的孩子也要遭受同样的折磨。

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在考试制度上率先实现了，也成为中国这些年继输出中餐馆和唐人街文化之后最牛的一项价值输出。

这些年由于华人大量涌入一些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结果当地本来按部就班的考试，也因为各种补习班而变得空前激烈。现在如果到澳大利亚的一些精英中学去看一下，你会吃惊地发现，最好的精英中学里，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是华裔，这和华人华侨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的比例是严重失调的。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当初设立这种考试制度的澳大利亚人的担忧。

华人华侨的孩子能够进精英中学，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智商就比白人高，也不能说明我们中国人更聪明。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因为华人华侨的孩子刻苦，父母肯下本钱，加上牺牲孩子们玩乐和休息的时间（例如放学后的时间和星期六、星期天）送他们去各种补习班，初中就开始学高中的课，高中就开始学大学的课。在补习班里一遍又一遍地做习题，背范文。

在澳大利亚的教育制度下，特别是小学升中学，严格来说和中国的高考制度一样，但在亚裔人口大量涌入前，从来没有什么补习和加班加点“备战”考试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如果现在去到各个补习点看一下，里面坐的几乎清一色都是亚裔学生。

澳大利亚人最近在检讨这种考试制度，因为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可能会出现精英中学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澳大利亚白人的学生越来越少。而那些靠补习和所谓“刻苦”进入精英中学和各重点大学的

亚裔会越来越多。

澳大利亚人担心什么？亚裔拼命学习，牺牲玩乐的时间考上好的学校，难道不是贡献澳大利亚？难道不符合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公平竞争”？当然不是。澳大利亚人担心的是中国人带过去的那种“学习风气”，或者说被中国移民家长们带过去的那种应试方式方法——那种牺牲孩子的玩乐和休息时间的做法，不但破坏了澳大利亚的教育制度，而且通过这样“竞争”一路考上去的孩子，就算是重点大学毕业出来后，他们的工作能力——特别是创新和创造能力往往名不副实。而那些实际上有创造力和天赋的孩子，却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竞争中连大学也考不上。

澳大利亚一些有识之士是不是杞人忧天了？也许我们应该去查一下记录，为什么各种国际大考的数学和科学尖子都在中国，可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都是人家设计的？为什么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考试都遥遥领先，可环顾周围，世界上所有现代文明的科技产品几乎没有一样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不过，也有值得欣慰的地方，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输出价值？这不，我们总有一天要让我们那种折磨孩子的考试方式传遍全世界，让全世界的家长们都胆战心惊，真正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个关于考试的噩梦！

2008.10.02 随州

我对儿子讲我们是少数民族

自从把儿子送到澳大利亚后，我就发现人生最高的理想都可以实现了：你可以选择春夏秋冬——不喜欢冬天的可以一年过两个夏天，不适应夏天的可以一年享受两个冬天。再说，又可以和儿子在一起，何乐而不为？

不过一来到澳大利亚，我就发现发现问题大得很。原来最近一段时间，这里的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把西藏、中国人权和奥运圣火等当成头条新闻。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只当没有看到，可是我的两个儿子却看得清清楚楚。小儿子还可以对付过去，上高中的大儿子就不好办了，而且我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好像他爹是来自一个蛮荒之地，来自一个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家，来自一个侵略者的国度，来自一个……

躲得过别人，躲不过儿子。我还是不能回避这个集统一与分裂、宗教信仰与民族冲突于一体的超级大问题。

我的两个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上的。他们都有正规的中文名字。当时孩子出生时，远在湖北的奶奶按照家乡农村的习俗给两个孙子取了小名：大孙子叫“铁蛋”，小孙子叫“铜锁”。他们

奶奶的意思是有了如此“土”的家乡名字，今后无论在华盛顿、纽约，还是悉尼和伦敦，想忘本都难。

在我的记忆中，和已经上到十年级的大儿子铁蛋只有两次严重的冲突。第一次发生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当时，铁蛋在学校欺负一名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人家的奶奶过来求我们不要让铁蛋欺负她孙子。我真火了，对儿子动了粗——我想，儿子应该记住了，这一辈子宁肯被别人欺负，也永远不要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三年前铁蛋已经上了初中时。有一天他回到家，说起中国，满脸不屑，甚至使用很重的“恶毒攻击”的语言。我大吃一惊，他说的不是中国的某项落后或者不好，而是表现出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鄙视和愤怒。

我很紧张，问他在学校学了什么。原来，他们正在学习一些和人权有关的知识和理念，老师把中国作为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举例了。我后来猜想大概是他们的老师传播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相当负面的东西，加上儿子当时有逆反心理——反对我这个处处强调中国式教育方法的“中国人”。结果，在我多次解说和辩论后，他仍然坚持己见。

要知道，我自己就一直在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也热爱中国，我相信中国可以发展得更好，中国人可以更平等、更自由，活得更有尊严。这和儿子那段时间表现的鄙视中国的态度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儿子一直不听我说，说到中国就用极其负面和不公平的词语，最后我终于使出了杀手锏。我吼道：别以为这是澳大利亚，老子就不敢揍你，你到镜子前面去看看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就算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你老子我还是中国人！再敢在我面前说中国人坏话，老子就揍你！

当然后来情况改变了，不知道是儿子懂事了，还是我的“爱国教育”起了作用，铁蛋后来再也不和我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了。

现在电视上突然出现那么多关于西藏、奥运圣火和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我总得有个说法吧。

如果问我对儿子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小学读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是他们班上的小朋友的皮肤和头发颜色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人种的。特别是在华盛顿小学里，儿子拿回一张班上同学的合照，我一看就乐了。十几个小朋友，竟然有四五种颜色的皮肤和三四种颜色的头发，像个人种孩子博物馆。最近澳大利亚的小学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的孩子，说明澳大利亚也开始在多元文化的路上大步跨进。

第二点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孩子们都是“色盲”。我发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小学里，孩子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肤色。我多次问儿子，你的某某同学是哪里来的？他听不懂。我再问他那个同学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他竟然要想一会儿才能想起来。要知道他们都是每天在一起玩耍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族群和谐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住在海外的华人最想看到的和谐社会。毕竟，离开中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是少数民族！

虽然目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总数多达两千多万，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华人仍然是少数民族。当我对儿子讲我们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都会把西方一些国家过去排斥华人、歧视和侮辱华人的历史多多少少讲一些。我讲这些当然不是激起仇恨，而是告诉儿子，很多东西都不是想当然的，特别是有些人在灌输白人比黄人优越和更适合民主、自

由、尊重人权的社会制度时，我提醒他们：就在不久前，白人们还在疯狂践踏人权——非白种人的人权。

当然我还想让儿子知道，今天这一切也不是想当然就到来的，它是几代人奋斗争取的结果。这些前仆后继争人权的人既包括我们这些被歧视的少数民族，也包括那些和各种肤色的人一起游行示威的白种人。

在和儿子讲到我们华人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也告诉了他们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也就是西方如何侵略中国的。那时西方人以为自己是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代表，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虽然有些人一直在为西方的侵略行为辩护，说是他们给封闭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文明，但西方的文明却始终没有在中国扎根，倒是在枪炮声中，混乱和屈辱伴随中国达百年之久。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不管是真正落后还是被认为落后的民族，它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轨迹。一些自以为强大和先进的民族如果依仗强权，使用武力来施舍文明和培养一种不伦不类的新文化，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告诉儿子，有人说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我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也许在美国出生和生长的这一代很自然地融进了这个所谓的大熔炉，但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也融不进的，再说，我也不想融进去。

澳大利亚在霍华德执政时，出现了一个种族分子韩森，她是个炸薯条的，组织了一个党，叫“one nation”党（一个国家党）。这听上去就让人气愤，因为这个 nation 也可以理解为民族。韩森最终失败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回去炸薯条了。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

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当一个社会真正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享受信仰、言论、结社和游行等自由的时候，皮肤的颜色不是问题，宗教信仰不是问题，生活习惯不是问题……

这个时候，就是和谐社会了。

2008.04.09 悉尼

我们需要家长，但不需要大家长！

工信部推出电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引发网友热议，世界各大媒体随即卷入，最后连外交部发言人也加入战团。在被咄咄逼人的BBC记者追问是否是强制安装时，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连续两个反问，其中最后一句“你有孩子吗”，不但让BBC记者哑口无言，也触动了我最敏感的神经。

这句话触动我，是因为：我有孩子！我的孩子生活在最开放的澳大利亚。而且更巧合的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专门为孩子开发和生产过滤黄色和“不健康内容”软件的最先进国家之一。我给孩子的电脑也装上了过滤软件！

作为一名家长，我深深知道互联网上的黄色和暴力网站对孩子的影响，一个跳出来的变态的色情图片甚至可以摧毁一个幼小孩子的健康心灵，这就是为什么最早出现色情场所的西方国家，不但有少儿不宜的红灯区，而且在任何一个色情场所的门口都有“十八岁以下禁入”的告示。可是互联网出现后，这一“儿童不宜”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被淹没了。现在，只要有台电脑，只要会上网，只要家长不在旁边，一个青春

期的孩子只要会打“色情”两个字，他就能够看到你玩到 80 岁也玩不尽的花样！

所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触动了我，所以，我支持有这样的软件问世，所以，我给自己孩子的电脑上安装了这样的软件。然而，这却不是发言人的问题触动我最深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他这句话，我——一个急切想保护孩子的父亲，还有更多孩子的家长，要说一句：我们应该反对这样的“绿坝”！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孩子的电脑上装了过滤色情和暴力的软件，而且这种软件绝大多数是免费的，是由政府和一些福利机构资助开发和生产。然而，请大家搞清楚我支持和反对这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这个软件不是由任何权威机构下令装配到我孩子的电脑上的，更不是政府和某个公司独家经营，由政府及其支持和信赖的某独家公司找出色情和“不健康内容”而加以屏蔽的。

这就是区别！任何西方政府，不管他拿出多少资金资助这类软件开发，他都没有权力强迫用户使用，事先安装在出售的电脑上，而且，连寻找色情内容的屏蔽词都由各家公司自行决定，因此屏蔽程度和功能也就不同，质量也有差别。而选择何家公司的过滤软件，是否需要使用这样的软件，这个权力完全掌握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孩子，也最想保护孩子的家长们手里！

可是，如果根据目前我们得到的资料看，即将肩负起“保护我们的孩子”的任务责无旁贷、毫无选择地被另外一个“家长”承担起来了——那就是“大家长”！

查看了一些网站做的民意调查，支持的家长们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应该支持。他们却忘记了，资助开发这种软件是政府的

责任，可是选择安装何种软件，以及把何种内容屏蔽掉，却应该是家长们的责任，也应该由他们来选择。而反对安装这一软件的，则给人一个印象，他们连政府出钱开发旨在保护孩子（而不是成年人）的软件也全盘否定了。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类软件是否被政府垄断？开发后，到底谁决定装，谁决定不装？过滤什么样的内容？是否电脑到达用户手里前必须安装？到底是由家长决定，还是由“大家长”决定——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类整个文明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集中回答的一个问题。

比如，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或者美国政府在我购买的电脑上事先安装哪怕是我现在为我儿子安装的这款过滤软件，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就算我忍气吞声，澳大利亚和美国公民也绝对会上街游行。而如果有某一家公司把我们认为非常健康的内容也屏蔽了，或者有哪一家公司为了奥巴马的利益而屏蔽了有关美国反对党（现在是共和党）的消息，那么只要有民众立即宣布不使用他们的软件，他们就会得不到政府的资助，他们就会倒闭！而这家公司如果正好是奥巴马政府的，而且只此一家，那么奥巴马总统将要因违反美国《宪法》而不得不下台！

可是，如果由当今某个政府（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某个部门垄断了，找了独家开发商发展，而且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是健康和不健康的，结果家长们没有了选择。“大家长”的决定就是成千上万个家长们唯一的选择，那么，他们很可能（注意，我使用的是“很可能”）把一些对国家和民族非常有利，对我们孩子的前途非常有利的消息也过滤了、屏蔽了，从而让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愚民，一个顺民，而不是

我们希望他们成长的那样——一个健健康康的公民!

也许有人又说了，只是说“有可能”，这就是说，政府也许不会屏蔽那些真正健康的东西。让我告诉你世界历史和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一个好的社会、一个有前途的民族最应该做的是防止政府成为监视人民的老大哥，阻止政府成为控制人民思想的“大家长”！这是常识，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显示：色情从来没有折腾人民，但政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老百姓！色情更没有摧毁过孩子，可是独断专横却又不让人民批评的政府却一直在……

如果你认为我在小题大做，如果你认为我在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你认为我说的是纯理论而在现实中不适用，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一句“你有孩子吗”让我感触如此之深——

还记得黑窑洞的奴隶孩子吗？当时有多少家长一边和我一起流泪，一边痛斥那些败类：你有孩子吗？

还记得珠三角的童工吗？你告诉我，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问题？啊，那幸亏不是我的孩子，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孩子那样。

还有地震废墟下的孩子，如果废墟下是你的孩子呢？

你不会忘记毒奶粉吧？你有孩子吗？他从来不喝牛奶？难道他是喝狼奶长大的？

当你看到习水的人民公仆集体嫖宿幼女的时候，你难道不想质问这些很可能要为我们的孩子过滤色情内容的官员们一声：你有孩子吗？

可是，我们往往发现，在上面所有原本需要我们家长保护那些孩子们的事件中，都有“绿坝”出现，力量远远超过了家长。每当在孩子们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们，在过滤信息；他们，在屏蔽真相；他们，不是

在保护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在保护一些邪恶的势力；他们，是在保护那些连孩子们都不放过的利益集团。

如果你有孩子，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是的，作为家长，你有责任保护孩子。

如果一个家长不能管理好自己的电脑而无意中让色情侵染了孩子，他只是损害了自己的孩子；由于电脑没有管理好，或者某个过滤软件有了漏洞，让孩子们受到色情图片的侵蚀，那只是一件普通的违反刑法的案件；而一旦由某个“独家公司”借过滤色情内容而屏蔽了对他们的“健康”不利的信息，对利益集团胡作非为不利的消息，那么，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则是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我们有孩子！所以我们希望纳税人的钱有一部分是资助那些有能力开发这类软件的公司竞争开发和生产各种过滤软件，供家长们自由选择。

而同样作为一名家长，我们不但要反对别人来充当我们孩子的“家长”，更要反对那些把中国所有的家长都当成“孩子”来管理和监控的大家长、老大哥。

我们需要的是家长，但不需要大家长！

2009.06.10 广州

钱学森的最后提问

2009 年 10 月 31 日，九十八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钱学森同志生前有无数的头衔，最响亮的就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科学家”，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战士”。我之所以不愿意突出钱老的“科学家”身份，是因为和比他在科学领域更有成就的九位华人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一样，他的科学家身份并不是中国培养的，他是美国大学和国防部培养出来的导弹专家，虽然他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我更愿意尊称他为战士，却并不是因为他三十多岁时就是穿校官服的美军上校，也不是因为他回到中国后，又被授予的中将军衔。我尊钱老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是因为他的一生都像一名战士一样赤胆忠心，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相信党，像战士一样与落后的科学技术战斗，并具有一名战士最优秀的品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提问，更不提个人要求。

钱老从条件那么好的美国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显示，他老人家没有给国家添过任何麻烦，而自从他 1955 年回来后，却为共和国军事科技的发展

解决了无数的问题，扫清了航天事业上的无数障碍。

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同志，钱老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的，这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否则共和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的元勋绝对不会在与共和国风雨同舟半个世纪后，在自己生命走到最后的关头，才提出这唯一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得连前来探望他的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同志的脸色都渐渐凝重起来。实事求是的温家宝没有不懂装懂，他显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却没有现成的答案与钱老分享。

于是，总理召集了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以共和国总理之尊，提出了钱老向他提出的问题，那几位校长和专家争先恐后地答道：老师不行……大学很大，但不够强……不是大学出问题了，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温总理得到了答案吗？他满意了吗？如果他满意了的话，他一定会直奔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钱老的睡椅前，告诉钱老答案并共商大计。然而，和我们一样，温总理显然对这些大学校长和专家的答案并不满意。

于是，大家看到了，过去几年忙得东奔西走的温家宝总理突然沉寂了下来。我想，钱老的问题一定让他感到了沉重，是啊，到处跑有什么用？

于是，在9月4日，温家宝总理前往北京三十五中初二（5）班，端端正正坐在那里听老师上课，做笔记，一坐就是一上午，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对老师的讲课做了点评，然后他离开了。

那几个小时听课的温家宝总理找到答案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人才，而要不停地从美国这些国家引进？就在10月29日，在山东考察的温总理在短短一个多月里，竟然第二次来到一所中学，这次，他来到费县一中高二（8）班，亲自给同学们讲授《张衡传》，张衡，和钱学森一样，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

两次和中国教育零距离的接触，温总理是不是在为钱老的提问寻找答案？他找到了吗？也许没有找到，也许找到了，但对于一生都在为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各种问题寻找答案的伟大战士钱学森来说，显然已经晚了，钱老悄然离开了人间。

谁能解答钱老这一生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

其实无论从钱老短短的几句话里，还是从他漫长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提出的问题，也看到了问题的答案。也许，这才是温总理脸色凝重的原因，也许这才是温总理对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的答案不满意的道理，也许这才是温家宝总理放下堂堂共和国总理的公务不做，而去教室听初中老师讲课、走上讲台给高中学生上课的理由。

钱老说中国的大学出不了杰出人才，是他归国55年后说的，而早在55年前，美国的大学就出现了成千上万杰出的人才，包括钱学森本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美国等先进国家学习和研究高科技，人回国或者心回国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们带回来的是科学技术，他们和共和国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只要带回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会先进了。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大学依然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的科技依然是世界上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世界上比较穷困的一群。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前进，和培养科

学技术大师及杰出人才一样，并不是单单靠“科学技术”就可以的，还需要宽松和自由的人文思想，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学和教育制度，需要适应新的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

有网友指责说钱老一生埋头科学，不关心政治和社会，而唯一一次关心“政治”，竟然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粮食产出量会有多少？》，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以“科学”的方法，论证出一亩地可以亩产160万斤蔬菜。

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的“科学论证”，无疑给当时造成N千万人死亡的浮夸火上浇油。而到底会有多少饿死的中国老百姓应该归罪于这类昧良心弄出的“科学论证”？也许，世间的任何科学都无法计算出来。

科学无法计算出来，政治却应该有所交代！可惜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钱学森对那篇文章有任何解释，难道他当时只是像战士一样忠实地执行“政治任务”？难道他还有更加苦痛的难言之隐？

答案也许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但事实却是如此。钱学森老人家像一名勇敢的战士一样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却没有带回科学的精神，我们的国家重视所有带回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人才，却把那些与科学技术同样有用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拦阻在大门之外——而这一切，还是让我们从钱老的人生故事中体会吧。

钱老是美国培养的空军上校，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他参与设计了美军最重要的导弹，无疑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机密，无怪乎他在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要求回国被美国FBI拦下来，被禁止离开美国、被监视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中国政府通过高层接触，用11名美军战俘换回了钱学森。这也是中美交往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人命大于美国人的。

美国人后来一定后悔了，因为钱学森回国后，正是用自己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高科技发展了中国的导弹。可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1985 年，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访问中国时仍公开表示，当年对钱学森的刁难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对的，因为那时美国盛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他还主动邀请钱学森访问美国。

也许美国人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是，他们毕竟对当时对钱老的迫害做了道歉和说明。我想说，这和科学无关，这和科学技术无关，甚至和泄密、偷窃先进技术无关，这和人文精神、和人权、和一个人的自由有关，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应该一起带回来的精神。

我们从钱老的经历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其实从正在为钱老寻找答案的温总理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答案。请大家回顾一下，温总理 9 月 4 日离开北京三十五中后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被很多人忽视，被有些人说成是“作秀”的一桩小事。温总理亲笔写信，为自己在点评老师讲课时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真诚地道歉！温总理找到了答案，他并没有说出来，他做了出来。

你能够想象，在一个知错不改、没有包容精神、死不认账、扼杀自由精神的地方，在一个只注重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为何物的地方，在一个只想要最先进的技术却无法自由思想的地方，在一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钱可人的心里却缺乏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地方——那里，能够培养出真正杰出的人才？那里，能够产生真正的和谐？

2009.11.01

美国家长为啥不愿意让总统教育自己的孩子?

当今世界上最有演讲才能的无疑是奥巴马。没人会否认是他的那张嘴巴把他带进了白宫，但大家也清楚，要想在白宫继续赢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光靠一张嘴巴显然力有未逮。不过，奥巴马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所以，在最近推广医改、教育等多项政策不顺的情况下，他要趁开学的那一天，再一次鼓动如簧之舌，向全国公立学校的中小学生发表电视演讲。

可没有想到，消息刚刚发出，离演讲的 9 月 8 日还有好几天，白宫就受到了“猛烈攻击”。最先攻击奥巴马的自然是在野的共和党，尤其是保守势力，他们抨击奥巴马借演讲的机会向孩子们灌输政治理念，推销自己的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对共和党的话打一个问号，或者直接打一个折扣。在这样的民主制国家，所谓反对党，就是专门反对执政党，对执政党吹毛求疵甚至鸡蛋里挑骨头。所以，奥巴马的白宫并没有回应来自共和党里保守派的攻击。然而，他却不能不重视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公立学校的学生家长们的批评。这种批评一波高过一波，致使很多公立学校感到

吃不消了，因为无数家长们的反对电话把学校的电话都打爆了。

我的天啊，美国人怎么了？奥巴马不是他们的总统吗？公立学校不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吗？仅仅在一年前，难道不是这群家长们——不分黑人和白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奥巴马的演讲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还记得2008年就职典礼那天——华盛顿最寒冷的一天——美国人几乎都停止了活动，好像冻僵了似的，一动不动，站在各处如痴如醉地倾听奥巴马的就职演说。现在，同样是这些美国人，听到他要在电视上对学生们演讲，竟然激动地跳了起来，举起双手反对。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民众对奥巴马演讲的态度怎么会判若云泥？是奥巴马改变了，还是美国民众变卦了？其实，都不是。改变的只有奥巴马的地位——他从普通民众变成了美国总统，而永远不变的是美国人对国家拥有的价值观的追求，以及对政府的看法。

奥巴马参选总统是政治，他是一名政客，只要他按照游戏规则，他可以宣传鼓动，号召选民投他一票。所以他尽量表演，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在用尽华丽辞藻和排比句的演讲中，始终围绕“自由、民主、集会、平等、宽容”等核心价值观，加上他的一张黑皮肤脸蛋，本身就是美国价值观取得胜利的见证，于是民众推选他为总统。

现在，这位卑微的黑小伙子奥巴马已经贵为总统了，当初那些把他选进白宫的美国人却不愿意让他去学校对他们的孩子演讲？是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美国，“政教分离”除了指“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教育”的分离。民众选出的总统只不过是管理政府、为美国和民众服务的。他们不但没有“教育”民众（包括他们的孩子）的权利，反而是常常受到民众“教育”甚至教训的。

学生们无论是在私人学校还是公立学校，接受的价值观教育都一

位来自于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里）。如果说当初美国人喜欢黑人小伙子的话，那是因为他紧紧拥抱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但当他获得了最大权力的时候，美国人拥抱的价值观同时提醒了他们：当上总统的奥巴马不但不能代表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在这个国家，最有能力破坏核心价值观、与民众作对的，正是在这个位置上的最高权力者！

美国的历史也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展示，没有一个总统在进入白宫前不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没有一个总统在进入白宫前，不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忠实拥护者。但在过去两百年里，对宪法破坏最多、时常挑战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正是白宫的主人。从冷战时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到尼克松破坏宪法，再到克林顿在办公室玩弄实习生并当众撒谎，还有布什政府的“黑监狱”……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总统也肩负起教育全国民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的“神圣使命”，如果美国总统有权力制定美国人的道德标准，动不动就号召大家学习这个学习那个的话，那么现在的美国人一定搞不清随便抓捕异议人士是否正确，到反对党的总部安装窃听器是否非法，以及体罚和折磨战俘的美国士兵是否应该成为所有美国人学习的“爱国标兵”。

一个一度被视为“世界的总统”的美国总统要对公立学校的学生讲几句话，却受到家长的反对。这件事对于中国大陆民众来说，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美国人的顾虑并不是杞人忧天。家长们不会反对奥巴马在开学的时候对学生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也会欢迎总统现身说法，向孩子们弘扬美国的价值观。可是，如果给奥巴马这个机会，谁能保证他在演讲中不会搞道德说教，不会用自己的政治理念影响政治上

还不成熟的孩子们，不会拐弯抹角地对自己政府的政策歌功颂德一番？

是的，除了这个国家的民众集体认同的那些核心价值观之外，任何当权者都不能把自己的政治理念灌输给孩子，任何“德高望重”的人都不能拿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所有人，任何政府都不能把自己的政策当成国家永久的方向！政府可以更换，最高统治者最多干八年（四年一任，可以连任），而不变的是国家、民众，还有他们拥有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最终白宫顶不住压力，声明奥巴马对公立中小学的演讲属于有选择性的（注意，他演讲的对象本来就不包括私立学校），爱听不听，由各学校自己决定。我想，奥巴马如果不取消这次演讲的话，他至少得修改自己的演讲稿。他和他的政府应该清楚，这次演讲已经不再是去“教育”美国学生们，而更像是美国总统在学生和家长面前经受一次“考试”！

2009.09.06

网络力量篇

君要臣死，臣Facebook

有人民没民意

1998年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来自日本防卫厅情报部的军官提呈了他研究中、日、美的形势分析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以确凿的材料（特别是数据）展示了日、美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当权者及民间对台海局势的态度与意见。每讲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时候，他都能用调研数据列明那个政府（以及国会）对台海事件的态度和政策，同时公布比较详细的民意调查数据来说明民间的意向。

可是在他的文章讨论到中国大陆时，只是用大篇幅写了中国政府的态度，甚至津津乐道地把中国政府高层的强硬派和温和派拿出来作比较，却始终没有论述中国民众的意见。

一位与会的美国专家打断这位日本研究员问道，你在分析日本、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时候，都分析了当地的民意，只是在讨论中国大陆形势时，你却只字不提民意，难道中国大陆只有政府没有人民吗?

这位日本防务厅的研究人员一开始有些尴尬，但随后傲慢地辩解道，中国大陆当然有人民，也有民意，但我不认为我们现阶段有什么可靠的办法弄清那里的民意。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无法在中国大陆从事调

研活动，而那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政府的喉舌，媒体反映的民意基本也是政府的意思。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认为在严肃的论文里列出这种所谓的“民意”，不实际、不科学、禁不起推敲。

与会者听了这个回答，有的耸耸肩，有的叹口气，有的做一个鬼脸，作为当时唯一在场的中国大陆人，我本能地想反驳他，却不知从何下手，憋了一肚子的委屈，还有屈辱。

十年后的2008年，当我再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特意收集了上百份华盛顿几大智库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报告。我惊讶地发现，在所有西方（包括日本）研究中国的报告中，中国大陆的民众意见和看法已经占据了主要位置，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民意终将左右政府的施政方略，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民意终将决定国家的未来。

十年时间，发生了什么？是的，在这种多少年都不会有变化的八股文式的研究论文中出现了一个十年前还没有、现在却必不可少的新词语——互联网。

互联网！不但成为西方学者窥视中国民意的唯一可信的窗口，也是中国民众表达意见、实行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参政议政的最切实可行的平台。而且不可忽视的是，互联网也逐渐成为中国高层有识之士越过尾大不掉的机构直接了解民意、与民众沟通的最有效的平台。互联网提供的虽然是虚拟的空间，却让中国民众第一次能够实实在在地“触摸”到言论自由、以民为本和参政议政这些普世价值中最核心的内容。

如果说网络民意等于民意，估计很多人感情上都受不了。专家也说了，就算上网的三亿人都积极参政议政，也是十三亿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呀，更何况上网的人大多是玩游戏、看新闻、收发邮件！更何况，农民绝大多数不上网。所以，真正从网络上看到的民意只不过是一些精英们

的民意而已。

这话说得有道理，然而，却是跳入了一个陷阱。因为按照这话背后的逻辑，十三亿人能够发言的平台才能代表民意，那么就如我们说起民主的时候所说，只有每人一张选票才是真正民主一样。

可问题是，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美国这种走在民意自由表达最前列的国家什么时候才有真正民意的？大家知道美国在二百三十年前立国的时候，所有的少数民族和妇女没有投票权，大多数的穷人也根本没有条件投票，更不用说利用当时只有少数富翁才拥有的媒体表达“民意”了。正是因为当时的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美国设置选举制度时才选用了不是靠每人一张选票的大选举团的投票制（也最终造成了选票少的布什当选总统，获得多数选票的戈尔反而落选）。

无论是民主还是民意表达，从希腊的民意到美国民意，大家难道没有看到民意表达的渐进曲线？从希腊广场上的几千人，到美国建国时的少数精英和有产者，再到几十年前的多数，几乎走了几千年。

即便几千年后的今天，美国依旧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有时甚至超过了大多数）根本不去使用自己的“民意”，而且在很多时候有相当一部分（好在没有到公民的一半）美国民众连手中的民主“选票”都不去使用。但我们谁都不会去指责他们的民意没有表达出来。

有人会说，那是以前，现在不同了，要说民意，我们就要从十三亿人开始，要说民主，我们就要人手一张选票，否则就是歧视，就是精英政治。但你得知道，如果不一步步开始，不从一亿人开始，不从三亿人开始，就永远到不了十三亿人。

互联网虽然只是一个平台，但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互联网并不只是精英的互联网，在大部分农村，只要你愿

意安装，并不比有线电视和电视机贵，而且，在乡村一级，基本上都有网吧了。如果你真想利用互联网看到人家不让你看的新闻和信息，想表达你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民意”，没有人可以阻挡你的，即便你不认识字，你也可以让你玩游戏的孙子代你发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愿意利用互联网的精英正好是被自然选出的精英。或者说，是因为你使用了互联网才成为互联网精英，并不是因为你是精英才使用互联网，很多社会中的精英根本就不上网。

举个例子，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每天上网玩游戏，对论坛讨论国家前途的事不关心，认为写博客是多此一举。有人因此得出结论，你看这大批网络年轻人，他们都不关心国家大事，怎么能说互联网代表民意，难道他们不是民众？难道只有你们这些愿意在网络上发言的人才代表民意？

对，但也不对。民意当然是愿意表达才能叫民意，那些有一定条件而不愿意表达的人用他们的沉默表达了他们的“民意”——不关心自己的“民意”，认为自己的声音不重要。这种情况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比比皆是，有些人根本不去投票。

所以，并不是跟着你喊“民主、自由”才叫民意，人家什么也不说，安于现状也是一种“民意”。对于那些玩游戏的孩子来说，等到他们父母不供养他们了，等到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饭吃了，等到他们不表达自己的“民意”别人就欺负他们，把他们当屁民的时候，你说他们会不会利用自己面前的互联网表达“民意”？如果还不想利用，或者认为互联网没有用，那么就说明他们很享受被欺负，很喜欢当屁民，难道这不也是一种民意？即便民主真实现了，如果大多数人愿意当愚民，难道你就说那不是民主吗？

且不说有互联网你却不好好利用，就算没有任何平台，你不去争取，

自由会“带着微笑来到你身边”吗？换一句话说，你不去争取自由，那你也不配享用自由。你不去争取民主，民主也不会死皮赖脸地缠着你不放。

而且，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即便在美国民主制度确立后，在立国的时候言论自由就被无限推崇的美国，过去两百年，民众为言论自由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甚至付出流血的代价！你说那种连走两步路到网吧，或者少吃几顿饭装一个宽带都不愿意，发一个帖子就怕得要命的人，你真把言论自由硬塞给他们，天下不大乱，那才怪呢！

很多人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等到那一天？三十年还是五十年？我等得到吗？如果等不到，那又有什么意思？

当我收到太多这样的问题时，我心里也渐渐郁闷和烦躁起来。但我无法接受有些人仿佛只为那一天而活着，把那一天看得无比重要，仿佛那一天不到来，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但我知道，如果你只抱着等那一天到来的心态，而且认为那一天比现在的每一天都重要的话；如果不调整心态，眼前只看到差距，看到鸿沟，看到那一天的遥遥无期，而不愿意在现有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艰难跋涉的话；如果只等着某个人出现，等到某个人在讲话中让你兴奋得跳起来，等着某种东西自动消失的话。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一天永远不会自动到来，就算它被别人带到你的身边，你还是没有准备好。于是那一天也就和以前的每一天一样，至少对你来讲，没多少意义。

你得自己走过去，别等着那一天走过来。

原文《我们还能在互联网上走多远（上）》，有删节

2009.03.05 北京

自由言论不等于言论混乱

如果说当今的言论自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言论自由，那么西方人用了多少年才走到今天？例如美国，在内战时，南北双方都曾要处死记者，因为他们的言论自由危害了“国家安全”；越战的时候也出现了五角大楼文件的案子，言论自由的先锋报纸被起诉……那时的美国算是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吗？如果不算，那么，美国的言论自由从建国开始，一直在以其客观和主观的条件限制了一部分人的话语权，例如白人和黑人奴隶、无钱无势无土地的白人等，这样的发展轨迹是本应该避免的弯路，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是应该避免的弯路，那么为什么所有言论自由的发达国家，历史上几乎都走过类似的漫长“弯路”？如果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那完全绕开这种具备合理性的“弯路”，是不是会造成一些混乱？

有了一定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最近几十年，都有或多或少绕过了西方走过的漫长弯路而一蹴而就地踏上民主和言论自由之路的经历。可是，我们难道没有看出来，他们确实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当然这些代价比起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主要小得多，但如

果有一个更好的方法降低这些代价呢?

如果没有互联网，我这些话只是多此一举，不但毫无实际意义，还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当做抵制言论自由和民主的挡箭牌。

有了互联网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不像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一样有点浮躁，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看一下过去十年互联网在推进中国言论自由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网民在互联网上用了十年的时间，差不多走过了西方国家在现实中走过的上百年历程。从上网的人数——从当时的几万精英到现在的三个亿，到互联网上讨论的议题的逐渐深入，直到涉及对政府的监督和参政议政，这过程和西方经历过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程惊人的相似。

其实没有必要吃惊，也许有人会立即指出中西之间某些制度上的本质的区别，但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言论自由的本质只有一个，一旦言论自由了，最终的目标也只能是一个。

从十年前互联网起步发展到今天，互联网的特性正好让一部分对言论自由感到非常陌生和麻木的人被自然隔离，让因为自身自愿或者被迫变得愚昧的人退避三舍，让一部分哪怕你真给他言论自由他也绝对不会使用或者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人敬而远之。这在客观上，让那些愿意追求言论自由，也认为自己适合民主，认为言论自由可以让中国进步的人成为互联网上言论自由的先锋队，也就是在有些人口中变成贬义词的“网络精英”。

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这种把一部分不适合言论自由的人隔离起来的事，当今文明的社会是没有任何人和政府会去做的。如果你现在实行言论自由，却还去限制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理由是他们素质低或者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自由的言论，本身就是严重违反了言论自由和人类

的基本政治道德。

可是在人类言论自由的历史上，这种有限制的言论自由却发生在几乎每一个先进国家里，历史学家们给这种情况找的借口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包括科技落后、交通和通信不发达等。可正是这种情况，把后发民主国家置放在非常矛盾的位置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包括民众的素质，确实和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上百年前的水平不相上下。可当今文明社会，无论你多么落后，又有哪一个国家敢于像西方百年前或者几十年前那样开始实行民主、推广有限制的言论自由？

然而，我们看到，互联网的特性却自然而然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没有任何人有异议，因为这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互联网的特性使然。

其次，比起现实世界，互联网有便于控制的特性。实际上，即便在互联网上，我也多次听到一些所谓的“有识之士”大喊言论自由“太过分”、“失控了”、“低俗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去研究一下，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所谓言论自由失控的现象，更不用说纳粹德国等极端的例子。

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过激的言论，也都是西方国家在现实中经历过的。只是，由于有了互联网，我们的言论自由虽然有时显得不那么靠谱，显得不太“真实”，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没有那么严重。这对于当权者，无疑更加容易接受。

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可控性还反映在互联网本身就是由每一个分散的网民的自由言论组成的。虽然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语叫“广场政治”，而且在互联网上常常出现“广场政治”的现象，但毕竟，互联网从来都没有促成一个现实中的让一些人紧张的“广场”产生。网民都是各自为政，散布在每一台电脑后面，睡眼惺忪，或者反映在高度近视眼镜，牙

也不刷，臭屁哄哄，又或者在发表冠冕堂皇的言论时，像我现在一样，穿着一块小小的遮羞布似的三角短裤。

和很多关心中国的美国朋友聊天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也搞不懂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的尺度要远远大于现实社会中的平面媒体。我当然同意一些朋友所说，互联网是一个高科技，很不容易管理。但如果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那你显然对我们强大的国家了解不够。所以，我宁肯相信这也是高层的一种新思路，而这种新思路也是在考虑到上面三个（或许还有更多）原因后推出的。

而在这种新思路的鼓励下，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监督了政府，部分地震慑了贪污腐败，给民众一个宣泄的渠道，有利于现实社会的和谐；民众参政议政，对国家有了更强的向心力，从而也给政府更多的信心。互联网成为高层了解民意的一个窗口，这是一种良性互动。

回头看看，短短的十年，我们已经在互联网上走了很远，甚至已经把现实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面。当初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它会改变世界，不过过了几年后，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很多人就失望了。当时比尔·盖茨说过一句话：人们对于新出现的高科技，往往过高估计它在短期内的作用，却又总是过低估计它在较长时间里的重要性。互联网就是这样的高科技。

很可能有人会站出来说，你说的都是虚拟的互联网，这和我们现实社会有什么关系？就算你在虚拟的世界里走得再快，又关我们什么事？

那也许是虚拟的互联网，那些网友大部分是穿上马甲的“虚拟人”，或者是隐名埋姓的无名英雄。可是，离开电脑屏幕，他们毕竟也是这个现实社会里真实的人，而且他们彻底打破了现实社会里精英划分的标准，在虚拟的世界里为我们重新确定了精英的概念：只要你愿意，你就

是随时可以发言的精英！

最重要的是，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没有人会否认，网民们在互联网上一路走来，已经走进了贪官污吏的内心世界，跟随公费旅游的官员走到世界各地，还走到监狱去调查躲猫猫事件，走进了两会的会场，现在甚至走进了温家宝总理的会客室。我想，这些都不是那么虚拟的，对不对？

所以我说，虚拟的互联网对于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我们能够走多远，而在于当我们在这里提高了自己的民主素养，练习了我们的自由言论，学会关心国家和自己，维护国家和自己，接受了更多的真理，获得了更多的认同，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后，我们随时能够轻轻关上电脑，离开虚拟的空间，回到真实的世界！

原文《我们还能在互联网上走多远（下）》，有删节

2009.03.05 北京

把互联网变成儿童乐园?

看了“妈妈评审团”召开第一次评审会议的新闻，挺有意思，不过也有一些想法。

有法时要严格依法办事，没法可依时可以赶快督促人大立法，绝不应该把“低俗”的内容交给各地甚至电信公司来任意发挥，这是违反《宪法》的。鉴于这种法律常识，我们要问“妈妈评审团”两个问题：第一，谁授权给你们来“评审”互联网内容的？第二，你们认为自己的未成年孩子不能看的内容就应该删除，网站就应该关闭？难道全中国人民都不能看？哪怕那内容是《宪法》保障我们看、《刑法》不禁止我们看的内容？无论是扫黄还是反低俗，都不该以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的方式展开，也不该搞成一场信息和精神领域的“严打”。

“妈妈评审团”的创始人说“儿童利益优先”，要把妈妈们组织起来，删掉互联网上低俗和不健康的内容，他说自己很有成就感。还有的在会上说，要让互联网适合儿童，把互联网变成“护联网”。我的孔子啊，打着“妈妈”的神圣名义，打着“为了孩子”的更加神圣的旗号……互联网不是儿童乐园，也不是幼儿园啊！

如果真要“儿童利益优先”，那么每家的儿童年龄也不一样吧。儿童包括从0岁到18岁，只要从中间9岁的算起，哪怕是用西方最开放国家的标准，中国所有的新闻网站，包括人民网都必须关闭。因为中国任何一家网站（除了专门为9岁以下孩子设立的儿童网站）上都会有对于9岁的孩子无法解释清楚的“低俗”内容（例如犯罪新闻和社会新闻中的成人词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看到不适合你家“儿童”的内容就删，那么，一本新华大辞典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汉字涉及“低俗”内容，是不是都应该删除？

让我们进一步发挥所谓“孩子利益优先”的原则。既然用这个原则来治理整顿虚拟的互联网，那么，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对付孩子们生活其中的整个真实社会？妈妈们去新华书店看一下，所有的书籍，有几本适合9岁的孩子阅读？再到街道上看看广告，是不是应该拆掉所有无法向9岁孩子解释清楚的图片？再请看看电影和影像制品，你会带你9岁的孩子看有杀人和强奸内容的电影吗？还有在全国各地合法开设的成人用品商店？你是不是也要以母亲的名义“删除”我们现实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也想把现实社会变成一个只适合你儿子和女儿的幼儿园？

管住自己的孩子该上什么网站、不该上什么网站，以及多大年纪才能独自上网，这才是做母亲的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你可以限制自己的孩子上互联网，但你不能以“儿童利益优先”的名义把互联网变成一个只适合你的孩子的学习园地和迪斯尼乐园，那是违反《宪法》也违反人性的。而且，别忘了，你们的孩子也会长大的，到时他们也许仍然会生活在一个被打着“妈妈”神圣旗号的人继续管理着的成人世界，他们被当成了“祖国母亲”庇护下的“儿童”。当我们把互联网和社会变得只适合儿童的时候，不但儿童不会成长，而且我们成人也会变

成“儿童”。

今天你以“妈妈”和“孩子”的名义损害《宪法》，违背法律，随心所欲界定“低俗”内容，损害他人的表达权和知情权，明天会有更多的“母亲”打着保护你和孩子的各种招牌来损害你们的权利和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父母积攒了一点钱之后，宁愿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到“色情成灾”的外国去读书的原因。

我想，作为“妈妈评审团”的妈妈们，作为任何一个不想自己的孩子受到色情和暴力侵害的家长，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依照《宪法》和其他法律来督促政府加强网站管理，尽快制定详细的界定“色情”和“低俗”的标准（法律不允许有模糊的、以某个母亲或者某群包着二奶的道德领袖的意志来界定的“低俗”内容）。如果有可能，尽快实行国际通用的法则，实行包括电影、网络在内的成人分级管理制度，并制定专门保护未成年人免于色情和暴力侵害的法律。

请别再以“妈妈”的名义干那些事了，请别每天以“评审”的名义把自己赤裸裸暴露在色情和低俗的东西面前。我都于心不忍了，请把这些低俗的东西留给专业的警察叔叔，或者那些有法律博士和硕士头衔的专业人士，好不好？妈妈们，还是多点时间和你们自己的儿子与女儿待在一起，做妈妈该做的事吧。

2010.01.23

中国的“网民外交”

即便那些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国家，有时他们为了短期的国家利益也会违反民主自由的原则，甚至不时在国际上搞出为了“国家安全”而忽视普世价值的事。就拿美国来说，美国人在国内追求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普世理念的时候一直毫不含糊，但在国际上，却常常违背自己在国内推崇的那些价值理念，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从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无法否认的是，指导国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大原则迟早会走向统一，统一在国际人权公约与普世价值理念之下。可这个路还有较长一段要走，且并不平坦。在这之前，“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还会像两个幽灵一样，经常会冲击一下国际关系里的普世价值理念。

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与国际地位迅速崛起的关键时刻，处理中外关系与国际问题时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普世价值理念，显得尤其重要。有时，国内对如何处理指导外交的这些原则的争论，甚至超过了国际问题本身激起的风波。更加“添乱”的是，中国的外交碰上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网民外交”的兴起。

在中国，“外交无小事”已成为金科玉律。可是，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任何一个牵涉中外关系的国际事件，几乎都能够在网络上成为热点，而这些“热点”就形成了我所说的“网民外交”。“无小事”的外交，也自然成了“小民”们关注的对象。

也难怪现在的西方智库对中国的“网民外交”重视异常，他们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的：第一，他们发现“网络外交”对中国外交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认真研究涉及中外关系的网络民意，可以帮助他们推测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第二，网络上有一些非自发的网络“民意”，或者说是政府引导下的“自发民意”，正好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意思。研究这种“网络民意”，就等于直接研究中国政府的意向。无论如何，研究自发与“非自发”的“网络民意”，相辅相成，形成了西方智库针对中国“网络外交”开发的研究系统。

自从有了互联网，西方研究中国外交的专家学者几乎像找到了“富矿”似的。要知道，在这之前，他们要揣摩中国外交，除了靠情报机关花高价收买某些已经移民到西方的决策者以及外交官的配偶子女之外，就是盯住外交部发言人，或者那些中国政府资助的专家学者们，研究后者时还得了解一下他们是否和中国官方某个大人物有“关系”。不过，说到在国际关系方面的“网络民意”，我也有担忧之处。这两天就最近几件国际事件浏览了一下互联网上的“民意”，感到不但普通网友，就算是专家学者与理想追求者们，也常常迷失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普世价值理念”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中。

网络上最有代表性的“网民外交”呈现这样两个趋势：一是以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流的专家学者们为代表，他们在外交关系研究中几乎完全摈弃了普世的价值理念，一切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是从，弄得自己鼠目寸光，完全搞不清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与总体利益也一定要得力于他所持有的价值理念，并受这种理念支配。

这些主流学者的研究颇能得到一些网民的喝彩，尤其是当他们把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国际社会逐渐确立的普世价值理念故意对立起来，逢“普世价值”必反、逢美国必反、逢西方必反，甚至快要弄到“逢世界必反”的时候。谢天谢地，好在我们这些年的外交决策者并没有完全跟随他们走。

举个安理会制裁伊朗的例子。当中国投了赞成票的时候，有些专家竟然认为这是中国向美国卖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凡是美国支持的我们就应该反对。说实话，从近期国家利益来看，投票制裁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供应绝对有影响。但如果中国在更大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核武器的扩散上妥协退让，最大的受害者绝对不是美国，而是过去多少年来，一直靠拥有核武器而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再说，核武器不扩散早就是国际社会（在五大核武器国家的威逼利诱下）达成的一项共识，不能为了一点点石油进口破坏这共识，也不能为了“逢美必反”的偏见而破坏这一价值理念，自绝于国际社会。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少数同我一样在国内竭力推崇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理念的朋友（有些是自由主义学者），他们刚好走向另外一个方面：在国际关系中过分强调普世价值理念，而把“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完全从属于这些理念。从理论上或者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他们是无懈可击的。但大家不应该忘记，这些普世价值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同世界交往中都没有能够完全实行，中国一个贫穷国家，又如何能够一步到位？结果甚至出现了一些要欢迎外国人来统治中国，把中国

变成美国殖民地的言辞。这些东西，你同任何一个非种族主义的西方人说，他们都会摇头的。

谈到外交事件，说到外交事件中折射出的国家利益与价值理念，往往比国内问题更需要平衡与妥协，甚至有时必要的退让也是不可少的。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十节选

2010.07.13

“跨省”的另一端

香港民间智库推出了一篇《“网络问政”：互联网发展的中国路径》的文章，很有意思，让我想起了一些往事。五年前在海外做的一个学术项目就涉及互联网的中国将何去何从。正如天大智库的文章所说，不外乎两种理论：作为前所未有的开放平台的互联网，将会挑战甚至终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只不过是一个传播平台，作用如何，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当时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互联网很可能会被公权力利用来加强集权统治，但比较微弱，不成气候。

大概是前年在德国开会时，与一位埃及来的互联网异议分子同台发言，她讲了一些埃及人如何利用网络维权的事，我也没有好好听。轮到我发言时，我提到了“广场”，“博客就是中国网民们的虚拟广场”，我们在上面实行言论自由。据说第二天，翻译成德语的这段话被转载了5000多次，创造了纪录。

但很显然，即便是虚拟的广场，也并不平静，冲突不断发生，例如“跨省”。而且冲突越来越严重，现在连县委书记也认为自己在网络中成了“弱势群体”，早前也有官员深情地感叹：“没有网络的好日子”一去

不返了。

然而，从有限的资讯来判断，领导们对互联网还挺重视的，“触网”与网民直接交流，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吸取网络上的民意。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思索，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政府会找到一种新的办法在网络上沟通民意、引导民意，加强执政能力，甚至部分实行某种有中国特色以及网络特色的民主？把“跨省”变成另一种意义的互联网民主。

我想这也是香港智库提出这篇文章的意义。

2011.02.16

观念篇

无梦一代的80后病

躺平了世界就不存在

到达天安门东站后我问一位地铁女服务员，哪一个出口离孔子雕像最近，她显然不知道什么孔子像，转身问她旁边的另外一位80后女孩，她竟然也是第一次听说。我有些迷茫，我可是专门来寻找孔子雕像的啊。她们告诉我身边的这个出口通到历史博物馆。我来到上面，还没有出门就瞥见有9.5米高的雕像，原来离这个出口不到20米。两位女孩都不知道？还是根本不关心这个不起眼的雕像？我来不及细想，迈开大步走过去，但因为昨晚才落下北京今年的第三场雪，加上我好多年没有在这样的雪上踏过，被滑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还好，骨头没散架，只是屁股有点疼而已，准备爬起来时，看到地铁出口的一位小伙子快步向我走来，“你没事吧？”他伸出手要来扶我。我说没事没事，自己赶紧爬了起来。看着这位80后离开的背影，我才意识到自己滑倒的真正原因是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一直不愿意加入评价孔子的行列，原因是我对批评孔子与抬高孔子的做法都持保留态度。我对那些把我们几千年的专制独裁、奴性顺从与思想僵化都一股脑地归咎在孔子身上的做法不以为然。孔子是当时中国

一位最了不起的思想家、教育家与道德启蒙者，他一生都想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但到死都没能如愿。生前只好与一帮粉丝东奔西走，授权弟子们记录他走遍中国的博客，他本人则偶尔发发微博体的论语。他的思想（精神财富）对于当时与后来的专制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

至于后来很多人（董仲舒等）对儒家进一步发展，赋予新的内容那是另外一回事。从孔子原装的微博（论语）与他编写的书来判断，他的很多道德说教无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中，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一些激烈反对孔子的人，认为孔子的思想奴化了中国人，没有民主思想，必须彻底清除，我认为实在是没有必要。大家只要别带着对自己历史的偏见甚至仇恨的情绪，再去认真阅读一下和孔子同时代的欧洲那些大思想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在他们被放大了的思想中，其实也有非常多糟粕的东西。例如当时的大学者几乎都对民主（所谓暴民的民主）没有多少好感，甚至在当时一些主张民主的思想家的著作中，民主就从来不是一个好东西。只不过西方后来的学人在梳理前人的时候不像我们那样，故意把好的东西丢掉，反而把糟粕拿出来炒作。而同时，整个西方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要把无论在思想与理论上都不比孔子差的同时代西方大学者树立为偶像或者“教主”。

和同时代的中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孔子当然也是有局限性的。但若是认为西方现在在民主政治上的先进就是两千年前其古人奠定的基础，而中国至今的困难一定是孔子造成的，就牵强附会了。从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哲学等方面来说，孔子留下了很多空白，没法和西方大哲们相提并论，但这是我们整个民族文化与文明的问题，不是孔子的问题。至少他关于教育与道德方面的说教就不比西方教育家与道德家们逊色，而

且，用当时尚处于先进地位的方块字表达出来，意犹未尽，更显魅力。黑格尔在评价《论语》时说，那里面的思想，哪个民族都有。你可以说黑格尔认为《论语》没什么了不起，也可以同样说，原来“哪个民族都有”的那些思想，我们孔子早在两千年前就说出来啦。

可以这样说，如果道德与思想领域也有“普世价值”的话，孔老师的很多说法是符合“普世价值”的。我们没有必要用西方人曾经达到的水平，以及我们现在站立的高度，去评价孔子的所有思想与做法。更不能把他变成“教主”，把一个两千多年前知识分子的说辞当成“教义”全盘接受，或者各取所需地尽情发挥。

更不能像有些人一样，把孔子抬出来，就是要树立起所谓中国的价值观，而且准备用这种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来对付“普世价值”。这样做的人，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普世价值。

当今说“普世价值”的中国人要远远多于西方人，原因很简单，那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实在太普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普通人的基本生活常识，没有必要整天挂在嘴上了（只有总统候选人说得最多）。可是，在我们这里，竟然有那么多人反对普世价值。我很想问一句，你们到底搞清楚什么是普世价值没有？

当今“普世价值”最普通的说法包括自由、民主、法治、宽容、人权。人权放在后面，是因为有时连人权都不提（前面几个就包括了人的最大政治权利）。普世价值虽然现在很普通，但即便在西方也不是自古就有的，如果你一定要从古希腊那时的反民主学者的著作里找到“普世价值”的光辉。其实，不要说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一部《论语》就能挑出很多。但，既然西方人说起普世价值的时候，从来不引经据典，我们也没有必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拿现

代西方的发展来说，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也是从二战以后才逐渐成形的。

普世价值包含的这几个内容，都是非常简单的，根本不用绕弯子，即便你偷换概念，也不至于得出那么咬牙切齿的结论啊。这几条普世价值，别说普通的人类，即便动物，估计也不会排斥，你说，谁不喜欢自由？谁不想为自己做主？哪一个民族没有主张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谁不想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和谐与宽容的社会？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二战后直到现在西方人嘴巴里说的“普世价值”已经越来越简单，简单到你无法提出反对意见。举一个例子，美国人拥抱的“普世价值”在历史上可并不都是这么简单的，例如他们从建国起就鼓吹自由——宗教自由，可你能告诉我这个自由的含义吗？一百多年后，中国华工“猪仔”被运到美国时，因为不信仰他们的基督教被歧视得一塌糊涂。而记载称有中国人带着自己的信仰物（菩萨之类的雕塑），被白人当成邪教之物予以没收、烧毁。从这方面来说，我甚至可以说，西方之所以大多数信仰宗教，并且一国人大多信同一种宗教（例如天主教），正是宗教“不自由”的结果。哪里像我们中国，一个小乡村，信菩萨、信土地爷、信猫儿狗儿的都有，没有绝对的信仰自由，能有这么多信仰？中国的神仙可是比世界所有宗教里的神仙加起来还多啊！如果中国的皇帝不许你信仰各种东西，只需信仰他们发明的某种宗教，那时，中国人倒是都有信仰了，但，那是宗教自由的结果吗？

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现在说的“普世价值”，不但不是西方自古就有的，甚至二战以前，他们自己都没有完全接受。现在的普世价值里的宗教自由，绝对不是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也不是信仰佛教的自由，而是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以及更重要的：你还拥有不

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所以，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他们所谓的“国教”基督教组织，也不能主办集体的祈祷等活动，美国钱币上还留下了违反“普世价值”的东西“In God”——上帝的印记。可见，现在的普世价值里的“自由”，已经和西方人以前甚至二战前的“自由”有了不同的价值与道德标准。正因如此，才更加“普世”。

这种例子还有非常多，而我们一些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却常常还陷在早期资本主义确立的一些带偏见的价值观与文化观里。他们认为西方的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支持民主的人的自由，却不知道，尤其是在西方，在民主制度已经确立的国家，所谓自由，更多的是反对民主的那些人的自由。支持民主的人能够上街游行，反对民主的人照样可以去，在美国，甚至一些极端的纳粹组织都有上街游行的自由。美国的共产党组织不但可以游行，每年还在纽约举行大会招兵买马，这难道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自由?

更有意思的是，悬置道德判断与具体的某种文化理念不说，过去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普世价值，还加上了必不可少的“宽容”(有的人也使用“包容”、“多元”等词)，这一宽容，让普世价值的界限就更加宽广了。也可以说，普世价值本身包含了对那些不相信甚至反对普世价值的人或者组织的“宽容”，有了他们，就是多元的一部分。各位，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西方人几乎从来没有为“普世价值”而争吵得面红耳赤了吧？没有必要啊，普通人接受这些价值理念，至于一些不普通的人不愿意接受，大家宽容你了，但在民主的制度下，你不可能以一己之利或者一党之私来强奸民意、倒行逆施。这就是简简单单的普世价值的威力所在。

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发现，当今普世价值里根本不包含我们常常

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文化因素，而且也排除了道德——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一般人都不会认为普世价值里包含了不要随地吐痰与尊老爱幼的品德）。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美国立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民主大佬都认为共和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教育美国人。用什么教育？当然是西方的文化精粹与西方价值观里的道德标准。仅仅从这点来说，当时的"普世价值"根本不能普及，所以，美国人自己也知道，没有相同文化底蕴的黑人不应该立即拥有民主等"普世"的投票权。

和早期西方人（例如英法与美国）动不动就搞殖民、搞文化歧视、搞种族主义不同，当今的普世价值不是穿西装，也不只是吃麦当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被美国占领了，被美国人用普世价值洗脑了，但却没有被美国人殖民。于是，接受了普世价值的日本，他们的文化几乎完好无损，一些习惯或者毛病，例如过于温文尔雅的礼貌、变态得连我都顶不住的AV，有哪一个不散发着日本文化与道德的原汁原味？甚至很多文化产品（例如日本动漫）已经开始渗透与蔓延到西方国家。这些文化，剔除了军国主义的糟粕，带上了"普世价值"的光环，畅通无阻，威力无穷，一点也不比所谓西方文化差多少。

回到孔子。孔子的整个思想与说教更多地集中在教育、道德与人际关系上。孔子的思想相当一部分代表了中国文化，当我们用现在的普世价值来审视这些文化的时候，会发现它们与普世价值根本不存在冲突，甚至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难道一个人一旦孝顺父母，就不会选举了？美国人选举时可能不看候选人是否是个孝子，但中国人完全可以选一个孝敬父母的当总统啊——孝敬父母的总统就会破坏民主制度？再说，当今我们所有的道德品质与行为规范几乎都是历史上某个人物主张过的，可他们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局限性，活在今天的我们最幸运之处

就在于可以在简单的普世价值观支配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西方目前推崇的这个几乎成了空壳的“普世价值”，需要的内核正是各个不同的民族与国家自己的文化、风俗、习俗与道德标准，如果没有了自己的道德标准，给你一个民主制度，给你一个好的法治，你又能如何？难道我们选举领导人的标准应该是会吃西餐而不是使用筷子的？

同样的道理，哪怕你有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资源，还有孔子这种道德教育家留下的精神富矿，可你始终没有一个符合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法治”的框架与环境，结果会如何呢？很简单，孔子宣扬了几千年的道德为什么始终无法深入中国人之心，更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

因为，没有普世价值提供的那几个框架，再好的文化与道德教育，也会沦为被统治者用来驯服、愚弄老百姓的精神鸦片与奴役工具，而糟蹋这些普通人珍惜的宝贵的文化瑰宝与精神财富的恰恰正是绝对权力不受限制的历朝历代的独裁统治者。那些要复兴中华文化，抬出孔子的人不妨回顾一下：要想真正贯彻孔子的思想，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接受普世价值，建立一个制度框架，让大家在框架里，制定出符合中国文化与道德标准的法律法规，选出符合中国文化与道德的精神楷模、圣人，以及领导人？

可怜的孔子，始终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他想通过各国统治者来推广自己的教育思想与道德理念，却弄得自己如丧家之犬。他应该明白，那些美好的思想与道德，只有在制度的保障下，才能最终开花结果。现代的人如果还闹不明白，请把目光从孔子雕像稍微移过去一点——斜对面。

厘清了文化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反对与支持孔子的人就不应该再那

么固执了。这一点我们真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的“孔子”比我们多得多，但没有一个人会蠢到把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树为两千年后的现代人的偶像，更不会提出什么国教。这些“孔子”的思想，也大多只是在专家学者与学子们的研究中出现，尤其在他们的一些思想已经成为当今普通人的常识时，你有必要一定用“三人行必有我师”来告诉孩子们要谦虚向他人学习？难道“两人行”就没有“我师”？孔子宣扬的很多道德其实在西方小学二年级的课堂上就被灌输过，而现在热传的《弟子规》，和我在西方读小学的儿子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差不多，根本没有多少冲突之处。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在“礼崩乐坏”的今天，那些扮演了道德楷模的人信用崩溃，国人们不再相信任何活着的人的情况下，我们顺势抬出了两千年前的孔子。可这怎么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价值观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建立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却同时把中国的文化与传统中残留的一些道德标准也破坏殆尽。一派认为中国的失败，是因为从五四以来，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理念，于是，现在要复兴传统文化。这本来没有错，可他们竟然要用传统文化来对付先进的价值理念，就错得离谱了。另外一派则认为从五四以来，传统文化破坏得还不够彻底，只有彻底清除中国文化，最好连筷子也不用了，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普世价值了。这些人对普世价值的认识，恰恰停留在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那个阶段，他们应该到现在多元化的西方社会去好好住一段时间。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多个方面给了我们积极的经验，这三十年来，上面提到的几个普世价值层面（自由、民主、法治、宽容、人权），我们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进步，在诸如经济自由与经济权利上，进步更是非

常巨大。而同时，我们在传统文化上也拨乱反正，从而出现了很多复兴儒教的知识分子。这都是进步，不能否认。可要想更进一步，让中华民族真正崛起，摆脱几千年的恶性循环，我们既不能从普世价值中退缩，更不应该妄自菲薄，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是要在普世价值下，重新认识、发扬我们的文化，抱持“宽容”的普世价值精神，拥抱世界各国与各地先进的理念，正如我们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科学方法一样。

我们要走出这一步，首先就要认真对待站在那里的孔子以及躺着的各位先贤，包括老子、孟子、墨子、荀子等，还有在天文地理与文学艺术上延续了中华文明的人，还有从孙中山到如今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

这就是我摔疼的屁股给我带来的一点想法，但我知道也许只不过是想法而已。屁股上隐约传来的疼痛，让我再次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年轻了，时不我待。可对于一些简单的事情，就有那么一帮人，宁肯让中国人一代一代的等下去，老下去……

还要等多久呢？我猛然想起——也许，我今天已经得到过答案，或者得到过启示？莫非希望就在他们的身上？那两个根本不知道孔子雕像在哪里的 80 后女孩，还有那位热心的 80 后男孩？

“走遍中国”系列之二

2011.02.28 北京

一天才赚75万

上次到墨尔本，朋友告诉我那里有一位大陆来的煤矿老板的儿子，来到澳大利亚不到半年，先是用现金买了宝马，随即又换了崭新的奔驰，据说还要换比奔驰更酷的跑车，当然，这速度与他换女朋友相比，实在算是慢的。不停换女朋友的结果是，他无法过语言关，也就换不成学校。这位煤炭老板的儿子最近有点不高兴，可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无法上学，他不高兴的原因是，最近中国生意不太好做，老爸现在一天才赚75万。

这次到悉尼，又听到一个煤老板儿子的故事，据说这位不换女朋——他租了五六个地方，一个地方放了一个女朋友，一个也舍不得换掉。有意思的是这些女朋友还都是大陆来的官员们的千金。只是最近他老爸突然给他打电话，说煤炭生意可能要被抢走了，问儿子手里现在有多少钱。儿子说，还有几十万啊。老爸一听就摔电话了：老子不是给了你一千多万，才两年不到，只有几十万了？

在出国的人群中，最早多是高干子弟，后来是富翁把孩子一个一个送出去，再后来连要为一个美好中国奋斗的知识精英们也歇菜了，急不

可耐地把独生子女送到海外与达官贵人的子女们一起接受资本主义再教育。更让人震惊的是，最近有迹象显示，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的打工仔，也开始为襁褓中的独生子女攒钱留洋了。

其实，如果有其他的选择，谁愿意把子女送到一个文化和语言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中国人是最注重家庭的，我们不是因此常常嘲笑西方人家庭观念淡薄，父母不关心子女吗？可是你什么时候看到西方父母忍心让未成年的子女到一个异域去学习和生活？

而且，你知道中国大陆出来的孩子们都在怎么生活吗？每一次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听到那些留学生的故事，我都很难受，也为他们父母觉得不值。我不排除这些孩子今后有些能够成为融入当地社会的精英，甚至还会继续出现几个诺贝尔奖得主，为整个中华民族争光，但代价是什么？是更多的孩子始终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或者在学生阶段就出事了，而那些看上去没有“出事的”，又有多少心理和性格受到了伤害，谁知道呢？

可我不能告诉中国的家长们，不要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因为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反复上演的悲剧相比，把孩子“流放”一样送到海外，至少是一个保险的做法。

不过，由于部分留学生不照顾人家的“国情”而过早地暴露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实力，结果他们受到了所在国家政府的报复。目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毕业后的中国留学生就业，特别是政府部门和高科技公司，都有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有些是明文规定，但更多的是心照不宣，也有内部操作的。

其实，海外留学生去年澎湃的爱国热情是从大陆网民那里传过来的，他们作为中国愤青中难得享受游行示威自由的群体，义无反顾地冲

上了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街头。可是，他们不但把力量过早地暴露给了资本主义，也同时暴露在大陆那些爱国爱红了眼的愤青眼中。

国内情绪多变的愤青在利用了这些海外留学生之后，海内外爱国者们在爱国的大旗之下短暂结盟之后，迥异的利益最终让他们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就在五星红旗遍布欧美之后不到两个月，大陆互联网上质疑之声四起：这些不用再喝大陆毒奶粉的年轻人是谁？他们的家庭都是什么背景？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在外国留学？他们毕业后有多少回国的？

2009.11.23 悉尼

留学的富不富都是“事”

留学天堂澳大利亚，接二连三地亮起了红灯。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数据，从 2001 年起大约有 2646 名国际留学生被拘押，当中大多数来自中国，拘押是因为出勤率偏低，学业通不过。此前也有报道，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死亡率奇高、犯罪率也偏高。《侨报网》最近引用澳大利亚官方统计，在澳中国留学生的自杀倾向为澳大利亚当地年轻人的四倍。

这些报道实在让人忧心，澳大利亚留学不便宜，能够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去留学的家庭绝大多数非富即贵，可那些忙着奔前程和赚钱的家长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孩子在澳大利亚的境况？究竟是澳大利亚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留学政策出了毛病，又或者正如最近沸沸扬扬传出的一种观点：这些到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孩子本身不怎么样，其中更不乏坏孩子？

相对于其他国家，澳大利亚的留学移民政策比较宽松。只要有钱，学校入学的门槛比较低，签证也比较好拿，加上只要从澳大利亚大学毕业，再搞点假材料和假动作，技术移民成功率也高，所以留学生的人数

众多。由于很多学生的留学目的并非学习，出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

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留学生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笼统指责他们是纨绔子弟、留学垃圾，是坏孩子，实在是有失公平。

价值观、世界观的冲突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姑且不说留学的孩子都是在高中、大学阶段出去的，就拿我自己来说，三十多岁去到西方，仍然在学习和工作中感到了两种价值观的冲击。虽说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初来澳大利亚的中国孩子可以找到中国大陆能够得到的所有东西，唐人街甚至比中国大陆的街道还更加具有中国传统风味，可是，内心深处价值观的冲突却阻挡了他们真正融入主流社会。在热闹的留学生活背后，这些留学生内心的孤独和压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中澳教育制度的不同也是一个原因。很少家长会问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大陆的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孩子突然被转到西方的教育制度下，他们能够适应吗？例如，中国的教育是以老师和课本为中心，而澳大利亚的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很多时候，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才是最重要的，老师只是起引导作用。这使得在中国受惯了填鸭式教育的学生一到澳大利亚突然“轻松下来”，老师不会强迫他们学习了，慢慢就真正松懈下来，结果考试的时候才发现该看的书没有看。

中国新一代留学生和二十年前的老一代留学生相比，更缺乏谦卑学习的态度。上一代中国留学生无论家境如何，内心深处都存有一份“谦卑”，这和我们国家落后人民贫穷有关，可也因祸得福，他们带着这份谦卑的心，不但更容易适应西方的环境，也有更强的求知欲望。如今，当我们国家崛起强大了，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孩子们也大多是富家子弟的时候，不但没有了这种谦卑，取而代之的甚至是“趾高气昂”，我不止一次听到刚出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大加贬损，对澳大

利亚这也看不惯，那也不习惯，认为还是中国的好。这种批评的精神是很好的，但把这种心态带进学习中，就有问题了。你可是花费一百多万人民币去学习的，没有谦卑和虚心的心，学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面对，那就是留学的目的。以前老一辈留学生的目标很明确：学到知识、赚到钱、拿到文凭，回国或者留下来。而现在留学澳大利亚的绝大多数学生目的也很明确：取得文凭，移民，拿到“身份”后再决定住在中国或者澳大利亚。在众多中国留澳学生中，相当大一部分并不是他们自己想来留学，而是家长要求他们来的，其动机无非是让孩子留学澳大利亚取得移民资格，并以此作为整个家庭的一个退路。大家想一下，这样被父母劝说出来留学的孩子，能够真正安心读书学知识吗？

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不是坏孩子，留学制度也没有问题，澳大利亚社会和留学市场也相对健康。还是那句话，这些孩子们需要更多的关心。澳大利亚学校关心的是钱，中国政府关心的是他们学到了什么，以及能够为祖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家长们关心的是孩子能否在澳大利亚拿到文凭和绿卡。于是，只要能够让孩子去留学，一切都OK了，各方皆大欢喜了。

其实，这样被弄到澳大利亚去留学的孩子们往往会在学业和感情上遭受诸多困扰。如果我们社会和家长对此问题有所认识，多一点沟通、理解和关心，问题也许不会那么严重。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有删节

2009.08.13

打倒“三俗”主旋律

最近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反三俗”。所谓“三俗”，就是庸俗、低俗和媚俗。胡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掀起了“反三俗”的高潮。8月6日，文化部长蔡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给出了“三俗”的原因并连发六问，包括每年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没有多少力作，每年三十万种出版物也乏善可陈。

蔡部长的六个问题问得好！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问题，但如何去解决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谁不知道中国文化与精神生活中庸俗、低俗和媚俗已经成为主流了？当然要反，可如何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我们在文化与精神领域经历了“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迎来了“反三俗”。根据前两次的经验，我们是用“清除”的办法把“精神污染”清除掉，用“反对”的办法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拒之门外，或者藏在寝室里，自己捣鼓。

我们成功了吗？这个暂不讨论。我只想提醒一下各位，清除被污染的精神，最好的办法是用一种新的不被污染的精神取而代之，否则，人

没有精神，乱七八糟的东西自然乘虚而入，不被“污染”才怪。看看现在，反来反去，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最腐朽、最糟粕的“文化”，反而都跑到中国大陆来了。

也难怪，大家一听到“反三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封杀谁了，要删除谁了，要关闭一些电视频道了……可我总认为，不能重蹈覆辙了！可喜的是，虽然文化部长对“三俗”痛斥了一番，他开出的药方并不是“铲除”“清除”之类的。也许他和我们一样清楚，一年两万首歌与三十万种出版物对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并不算多，而如果按照“三俗”的标准把他们都“清除”掉，估计到年底，我们最多剩下八首样板戏一样的红歌，以及几本红宝书一样珍贵的图书。

文化部长开出的方子是：“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引路。”“多用引导的办法，少用行政的办法，团结、带领艺术创作人员，逐步形成强大的良好的创作风气。”这个说法虽然和我的思路还有一定距离，但比起用行政手段大刀阔斧“清除”三俗，已经是大大的进步了。

“三俗”不好，可为什么不应该用行政手段来对付？原因很简单，形成三俗的根源除了部长所列举的三条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可以这样问：为什么“三俗”歌曲、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还可以这样问：那些不“三俗”，那些有思想性、有人文关怀，那些真正忧国忧民、发人深省的好作品都到哪里去了？

我支持党中央“反三俗”，更欣赏文化部领导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我认为，“反三俗”最有效的办法不但不是收紧控制、打压甚至清除“三俗”，反而是放松控制，让有思想、有人文关怀有现实意义、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优秀文化产品能够降临中国大地。

有人说小沈阳是庸俗的，可实话告诉大家，我就喜欢看小沈阳的小品，而且，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像小沈阳之类的小品演员，有些更加“三俗”。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连美国的杂志也说小沈阳庸俗？

原因很简单，人家在说你这个国家庸俗，是你的文化氛围与文化政策把小沈阳弄成了主流。如果在西方，我看小沈阳（或者外国的庸俗小品与脱口秀）只是一种娱乐，而我最主要的文化享受还是电视黄金时间里宣扬西方“主旋律”的作品，还是有深度的新闻追踪，还是 Larry King 访谈节目，还是以揭露统治者阴谋与社会阴暗为主的新闻栏目《六十分钟时事》等。可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电视上，一个本来应该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却登堂入室，成了主旋律，这才是真正的“三俗”啊。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文化部门承认的“主旋律”是人为的矫揉造作的，是比小沈阳还装腔作势的蹩脚货。

比“三俗”更可怕的是用行政手段、用专制手段一刀切地清除“三俗”，同时封杀那些高尚、有思想与引领中国人向上的作品。当后者都被“清除”了，被禁止了，或者根本就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你用什么来对抗“三俗”？你又用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与精神走向世界？

说起电视连续剧里的庸俗与媚俗，可能没有比那些描写清宫戏、皇帝老爷沧海遗珠、格格们与皇亲国戚打情骂俏更过分的；说起高雅与有一定思想性的，《走向共和》算是一个。结果如何呢？后面那个从屏幕上消失了，前面那些“三俗”的代表作品被上百次、上千次地重播。请问，如果都有相同的平台，即便观看后者的人数并不及前者多，但“三俗”能够那么猖獗吗？“三俗”目前之所以如此猖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不“三俗”的文化产品了，“三俗”最可怕

的是，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三俗”其实已经成了我们的主旋律……

至于部长说的“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善于发现、提倡反映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引路”等，我是这样看的：中国目前文化与精神领域的危机来自于缺乏国人都认同的价值观，因此在价值观都得不到共识的时候，“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广典型”等等行为，可能会弄出更多名正言顺的“三俗”作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建国六十年里，政府文化部门可是一直没有停止树立文化界的典型，今天样板戏、明天“致富光荣”……而这些典型后来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证明是毒害中国人精神的真正祸首，也成为当今“三俗”猖獗的深层根源。

2010.08.07 香港

“宽容”这把钥匙

我并不否认时评与杂文本身就是以冷嘲热讽与批评为主的文体。这其实也是鲁迅与胡适的区别。鲁迅是杂文与小说的大家，他选择的文体决定了他是一名战士，一名把杂文当成“匕首”的战士。而胡适是一名学者与思想家，他不能也不应该偏激。鲁迅绝不宽恕，胡适有包容心，虽然这主要由教育与修养所决定，但也多少受到两人职业的影响。后来的人，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严重弄混了一点：他们把鲁迅当成思想家顶礼膜拜，而把胡适当成了“最有思想”的作家推崇备至。

鲁迅和胡适都不可少。鲁迅的性格和杂文也许缺少了宽容，但宣称“我一个也不放过”的鲁迅本人正是“宽容”的产物。鲁迅的文章虽然像匕首一样犀利，但肯定不像真匕首一样能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更没有军阀和蒋介石的子弹“犀利”，如果那时的当权者也像鲁迅一样“一个也不放过”的话，经常“出离愤怒”的鲁迅即便逃脱了割喉管、被枪毙的命运，估计也很难不遭受五六年甚至十一二年的牢狱之灾。更不用说，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鲁迅先生竟然享受到如此宽松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说，鲁迅本身就是宽容的产物，而不是“一个也不放过”的

楷模。

尤其当我涉足政治，包括和政治有关的研究与写作之后，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缺乏的正是政治包容与宽容。而缺乏这些，要想走出几千年的恶性循环，可能比登天——登上月球，要难很多。

有人可能以为“宽容”是对他人的恩惠。其实，当你学会了宽容，当宽容变成了你无法分割的品质的时候，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被你宽容过的人，而是你自己。

因为，所有对他人的宽容，归根结底是你对自己的一种宽容。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对他人毫无容忍与包容之心的人，一些极端的人，一些要死要活的人，如果你观察一下，会发现他们其实一直在折磨自己，他们本身就是不宽容的受害者。

在北京时，有一位很“刁钻”的年轻人问，对于那些对我们毫无宽容之心的人，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答案依然是：宽容！因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不完美的，你永远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要求所有人。即便我现在告诫年轻人，你一定要宽容、宽容，再宽容。可现在和未来，还有很大一批人不会接受宽容，也不会对他人宽容。世界好像依然如故?

其实不然，当我们宽容了那些不懂得宽容的人时，我们自己才算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宽容。

宽容本身即是价值观的一部分，没有必要依附于其他的价值之上。它不是强者特有的“品格”，更不是当你主张“民主、自由、法治”的理想之时，当你自认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时候，就不再被你需要的东西。而且，宽容确实是一种很有力的武器，但当你把它纯粹当成工具、当成“武器”去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宽容。

宽容不但是生活态度，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人生的价值观，而且，也是解开中国政治死结的钥匙。从这一点来说，宽容甚至比我写了几年的“民主、自由、法治”这些概念更加重要。成熟的民主是与妥协、宽容无法分开的。

宽容的品质改变人生。有了包容与宽容，并不是说我们的立场会软弱，或者毫无原则地妥协与退让，正好相反，就好像我那些向公权力开炮的博文，正好都是因为我懂得了宽容才写就的。有了包容之心，我们依然犀利，只是不会再伤害无辜；有了宽容之心，也许你依然有敌人，但你却不再有害怕；有了宽容之心，也许你依然有仇恨，但那却是基于爱。

有了宽容之心，我们才可以一如既往地推崇那些愿意为了理想而不惜一切、轰轰烈烈去拼搏、去牺牲生命的战士们；有了宽容之心，我们更愿意为了理想而谦卑地活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我想对所有的青年读者说，假如只能拥有一种品质，请选择“宽容”。

2010.03.29

当批评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时髦

打从我记事起，“知识分子”就是同“犯罪团伙”差不多意思的。直到今天，讽刺、批评和攻击知识分子依然是一种时髦。这几天，我做了一些梳理。

以前统治者要想折辱谁，或者想转移一下“劳动人民”的视线，只要把这个人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不管是什么族群和团体（阶层），只要对现实不满了，或者自己的利益受损了，就要拿知识分子撒气，什么“被收买”、“犬儒”、“没有用”、“不敢站出来”……仿佛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是由他们在管理和运转这个国家似的，你的苦难都是他们造成的——那么，知识分子作为整体遭受到比工人、农民、军人等大得多的苦难，又是谁造成的?

古今中外，一切极权专制和不民主的制度都是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天敌。所以，当血的事实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否认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中国知识分子境况之恶劣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却在于：他们不但是统治者折磨的对象——这在很多国家出现过，包括苏联等，也是广大的愚民和暴徒们羞辱的出气筒——这一点在其他国家还真

不多见。

当人们用“忧国忧民”来定义与要求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划分与定义。在当今，这个划分本身就是有政治目的的。知识分子不是石头缝里跳出来的，他们都是从社会各个阶层里产生的，充其量是更勤力读书、喜欢钻研或者更会考试的一批人而已。在现在的西方国家，知识分子根本不能称为一个阶层，他们产生于社会各个阶层，又存在于各个阶层之中，并且各行各业几乎都是由有知识的人挑大梁。没有人会把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社会问题归咎于知识分子头上。

从上面第一点，我们得出第二点：知识分子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也是人，有血有肉，有家有室，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他们同农民、工人以及所有其他群体一样，应该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权。而 1942 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生存权受到极大威胁的群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应只是用来要求和约束知识分子的座右铭。然而，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历史，我们却可以说，世界上还真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更配享受这句赞誉的。

大多数时间里，知识分子在受苦受难，并且多是为国家和民族在受难。相比知识分子阶层来说，其他大多数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成了帮凶，这当然是被统治者愚弄的结果，但却不应该成为借口，更不应该至今还不思反省，把全部责任推给知识分子。

作为一名涉猎多种行业，唯独没有当过“知识分子”的我，将在这一系列短文里谈谈我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与主题：

当我们质问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做了什么的时候，最好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和民族曾经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做过什么。

当我们为自己的处境抱怨，从而把怨气发泄在知识分子身上；当批评知识分子成为政治正确的表现，成为一种时髦；当知识被践踏，知识分子长期遭受统治者与愚民折辱的时候，我们的“处境”难道不是自作自受！

《论知识分子》系列之一节选

2010.06.02

只给男性读者的寄语

在2010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想对男性读者说几句知心话，至于为什么只对男人说，看完你就知道了。回首2009，一百六十多篇博文，我已经啰唆得够多了。一篇又一篇硬邦邦的政治博文弄得一些老读者都抱怨得了“审美疲劳”，所以，今天我想谈一下感情，说一下爱情，但只对男性读者说。

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民主到来之前，我们该如何生活》的博文，今天我想说的是，民主到来之前，我们该如何相爱。年轻的读者可能以为岁月催人老，或者我脑子进水了，竟然糊涂到连人家如何相爱也要指手画脚。

我还是从自己的写作经历入手“娓娓道来”吧。我一直想写的是文学作品，对感情生活和爱情故事情有独钟（见《致命系列三部曲》），并认为情感特别是爱情始终是人类文学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相比较而言，我后来从事的涉及政治的博文写作，倒是一时之需。

从偏重感情、爱情到清一色的政治题材，我好像在两个世界里畅游，体会到感情世界和政治社会的区别，这一区别也在分别生活于这两个领域的男女身上烙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人类发展到今天，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就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吸取了一些教训，有了无数的覆辙可以借鉴，从而找到了一条迄今地球上大多数民族都能够接受的光明大道。照耀这条大道的就是普世价值的光辉。有鉴于此，我才敢每天都在博客里大言不惭、侃侃而谈，因为，以我的学识和经历，加上我坐在巨人的肩膀上，使得我对自己的主张比较有把握。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我说的绝大多数话都是无可厚非的，我大多数的“预测”和理想已经是其他国家的历史，而这些历史也终将变成中国的现实。

可是，说到人的感情问题，有读者来信请我对他们的爱情发表评论，我就傻眼了。要知道，政治是人类集体的事，而感情却是非常个人的。在感情世界里，是否也有一种被世界上大多数男女都接受的爱情模式或者“普世价值”？当然没有啊。我写博文不厌其烦，主要是希望国家能够避免在政治的道路上“重蹈覆辙”，可在爱情的世界里，你能用自己的经验告诫年轻人：我当初如何如何就失败了？你不能这样啊。因为恰恰相反，人类中的每一次婚姻都是在“重蹈覆辙”，很多美好的爱情正是在“重蹈覆辙”的时候绝处逢生、柳暗花明。

正是有了这一对比，让我在反过来暗中对照一些干革命和搞政治的男人时，发现了更多的问题。那就是在一些“政治动物”长期执著地追求政治理念（包括长期从事政论相关的研究与写作后）之后，他们的大脑逐渐形成了非此即彼、旗帜鲜明的思维方式，当他们面对不太关心政治、更多地沉湎于情感世界的女性的时候，他们一下子乱了方寸。

我就拿普世价值开刀。大家也知道，不管多么艰难，当今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人们肯定是自认为站在人类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上的，虽然妥协也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但政治是非此即彼的，要么民主，要么专制，不容妥协。那么，在非政治领域，在男男女女的爱情

生活里，那些普世价值是否适用？作为一个普世价值的追求者，作为一个号召要把民主不但当成目标，也要当成生活方式的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普世价值引入男女爱情和家庭生活中，这样做结果会如何呢？

你说有几个家庭是搞“民主”的？搞民主的家庭就比搞“一言堂”的家庭更和谐？还有，爱情能不能以理服人？可不可以动不动就“讲理”？有几对夫妻吵架时是在“讲理”？至于婚姻，谁都知道是“自由”的坟墓。当然，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一些追求民主自由的“搞政治”的人士，在男女交往和家庭生活中，也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担当“启蒙”和“先锋”的角色，动不动就对把感情看得高于政治理念的女性训斥一通，或者责怪他们“为什么不知道牺牲”，难道不知道“我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这就大错特错了，各位爷们，政治虽然不能让女人走开，可是大多的女性是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这和女人的天性有关，政治领域的“非此即彼”和爱情里的“爱上就无对错”是有点水火不容的。任何人沉湎其一，就很容易忽视另外一个。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想用个人的感情生活主导政治，或者把政治原则弄进感情里，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看到太多从事与政治有关的工作的男人们，他们的感情、家庭和爱情生活出现的问题远远超过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男人。而当我听他们倾诉感情问题的时候，仿佛在听政治汇报。这些政治动物们很难明白，感情的世界是讲爱的，而不是讲理的地方。你能够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甚至成为意见领袖，但到了爱情的世界，你不一定玩得转，甚至可能变成感情上的“弱智”。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在感情上“弱智”，比不上女人们感情丰富，

而在于自以为是的男人们很可能真以为“人都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而忘记了当时古人说的“人”只是指男人（当时的女人根本就不参与政治），从而把女人们看得低“人”一等，要用政治那一套来统治女人的感情世界。

其实，当我说男人是政治的动物，女人是情感的尤物的时候，我不但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而且，正如我在《民主到来之前，我们该如何生活》中强调的“生活高于民主”一样，我倾向于认为情感世界甚至是比政治领域更高的一个层面。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人类的政治有终极，写来写去，就没啥可写，追求来追求去，最终将会达到一个比较平淡无奇的阶段。可是情感的世界却博大无边，永远会让我们恨得痛不欲生，爱得死去活来。

鉴于我的绝大多数读者是男性“政治动物”，那么，在2010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想再好为人师一次，希望在新的一年和未来很多年里，我们都能携手一起追求共同的政治理想，但在任何时候，在面对对政治不那么感兴趣的女性、我们爱的女人的时候，都不要摆出一副政治正确的、唯我独尊的面孔和态度，更不要让政治的“理性”烧坏了我们的大脑，漠视女人们充满“感性”的感受。不能一方面责怪女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却对女人们的感情世界无动于衷。

路还有很长，时间永远不够用，但多给你爱的女人一点时间，也多给你的家庭一点时间，那会是殊途同归、事半功倍的。这是我送给所有男性读者的金玉良言，也是我送给为数不多的女性读者的最好的新年寄语。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政治还是情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因为爱，我们才去为所爱的人追求，但我们千万不能在追求爱的过程中，反而把爱给遗忘了。

2009.12.31

我们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2012？

我把灾难片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有限的天灾人祸，如大饥荒、坠机、战争、地震、火山、海啸、外星人入侵、妖魔鬼怪和传染病等，另外一种则是终极灾难之世界末日。好莱坞绝大多数的灾难片属于前一种，描写人类末日的灾难片几乎没有几部。

这两种灾难片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灾难的规模和对人类的伤害程度，而且在于这个灾难是否会终结人类本身。按照这样的标准划分，《2012》是属于好莱坞少有的描写世界末日的灾难片。而前一种灾难片就数不胜数了，例如《联航93》、《日本沉没》、《泰坦尼克号》以及《2012》的导演先前执导的《独立日》与《后天》等。

前一种灾难片比较好拍，也比较好看，原因是人类有丰富的面对自然灾难的经验和教训，而且有一套完整的知识结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来支撑。看完这种电影之后，观众会想通或者看穿一些问题。可是，末日灾难片则完全不同，特别是注定了的、毫无希望的世界末日，其本身超过了我们人类的知识结构和理论高度，不管导演如何拍摄，走出电影院时，观众心中的茫然和空白都会比进去前要多。

从严格意义上讲，《2012》还不算是我界定的世界末日灾难片，因为片中人类并没有彻底灭绝。当然，没有人会拍摄人类完全灭亡的灾难片，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观众喜欢刺激，喜欢娱乐，为什么不让他们彻底惊悚一把？

那些导演之所以小心绕过这个禁区，是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这和我们人类的知识结构、对宇宙和自己的认知、价值理念和宗教信仰有关。我现在依据灾难的原因、规模和损害程度把好莱坞大片进一步分类，并在各类型中找出一个比较突出的“指导思想”。

小范围的获救机会比较大的灾难片，如地震、饥荒、战争、病毒流传等，在处理这些灾难的时候，比较突出一条主线：制度和价值观。看多了这类灾难片，你不得不承认，好莱坞其实是推广美国价值的急先锋。

那么，那些小范围却毫无获救希望的灾难片呢？例如空难，或者《泰坦尼克号》这种很难幸免的小范围灾难，这种片里前面说的因素当然还在，然而，更重要的却是人心、人性、人文关怀等的体现了。例如，看《泰坦尼克号》这部片子，你就会略过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而更关心人类在这个时候的本性，包括亲情、爱情等。

现在让我们再把灾难升级一下，例如《后天》这种灾难片，整个美国北部地区都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急速降温，房子冻住了，人冻成了一条一条的冰棍。这个时候，好莱坞的导演们当然还是在制度、价值观和人性（尤其以家庭、爱情为主）上继续打转，但如果仅停留在此处，是不够的。这时，人类精神层面的更高的财富，超过了制度、爱情和感情的玩意出现了——那就是形而上的哲学、终极关怀。人类在这种灾难中思考的是：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应该如何生活，怎么与自然和谐相处等。

现在让我们把灾难提到最高级别：人类末日。当人类注定要灭亡的

末日到来的时候，好莱坞的导演们用什么价值、理论和信仰体系来抓紧观众的心？用什么让我们走出电影院时，仍然能够积极地思考社会制度、紧握爱人的手，以及积极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信仰的关系？制度在这里毫无意义，就连我们现在争吵得你死我活的普世价值观也因为即将没有“世（界）”而变得不值一提。那么人性呢？至少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碰上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现象：人类都没有了，人性还有什么意义？你以为你是上帝吗？你真以为人性可以独立于人类而在宇宙间流传？

那么，面对这种不是毁灭个体或者族群，而是要终结人类的灾难，人类自身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显然没有。科学、人文都是让人类活得更好的学问，哲学是人类发明来解决那些用其他科学无法解决的有关自身问题的学问，是所谓高于其他学问的学问。而宗教则是对哲学无法解答的问题——死亡——做出回应的人类更高的智慧。可是，虽然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末日审判和人类终结的教义，但迄今敢把“世界末日”搬到现实世界里的，充其量是一些躲在山上不下来、最后排成一圈集体自杀的邪教组织。

由此可见，《2012》的导演是比较勇敢的。当然，他没有勇敢到让人类真正灭绝，而是弄出了三条船，把下一个纪元的人类“祖先”装了进去。谢天谢地，他用这种方法，才避免了把一个“世界末日”片子拍成宗教宣传片。可是，由于他是在灾难片上走得最远的，因此他颠覆了人类的认知、理念和信仰。

这就是我和一些朋友看完这部电影，感到心里空空如也的主要原因。这部电影让我们知道，好莱坞的电影，并不都是打打杀杀，所有的电影都是人类知识、价值观、理念和信仰的反映，所以，我们看了电影

才觉得“有点意思”，甚至很有“意义”。

导演也是按照这个套路拍摄的《2012》，他不遗余力地玩好莱坞导演们在其他灾难大片中玩的那些故事情节和理念：普世价值支撑下的，最后不肯自己保命的美国黑人总统，肥胖的亿万富翁拿钱买两个儿子和自己的命，要求马上关掉舱门不让外面的人进来的代理美国总统——发号施令的权贵集团的代表，以及那位充满了人性的黑人科学家，更不用说一个为了家人而历经艰险爬上了保命的诺亚方舟的作家……

这部集海难、火山爆发、地震、空难、海啸等灾难于一身的电影，同样把所有能够塞进去的“精神因素”都塞了进去：制度优越（美国的和中国的）、价值观、多元文化、人文关怀、人心、人性，几乎一个不漏。

可是，我看完之后，却并没有产生看其他灾难片之后的那种感觉，反而严重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例如，他描写的配角（或者说故意弄成反面形象）大富翁和最后代表美国总统发号施令的“权贵”代表人物，并不让人反感；而他着笔那么多的两个人物，一个带着家人开后门偷偷爬上飞船（结果差一点让人类灭绝）的作家，另一位在飞船启动前十五分钟要求开舱门救人，大发一通人性不同于动物之类的论调的黑人科学家，他们并没有让我感到精神的力量，还有很多类似的情节安排，总让人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认为看电影，如果只是看热闹，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可如果要想看出“意义”，则必须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灾难片发生的大背景之中。可是看《泰坦尼克号》海难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陆地上；《后天》把北美洲人都冻成冰棍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电影院有空调的房间里；《日本沉没》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你在亚洲大陆；那些空难和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你一般都不在现场，也不会在那架飞机上，所以，你

即便紧张万分，也能够心平气和地思考人生和世界。

可是，《2012》世界末日到来，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被毁灭的时候，你在哪里？很遗憾，你在地球上，就在被毁灭的万物之中。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那是这部电影的失败；而如果你有了这个感觉，你将会意识到，这部电影是一个失败。

这种感觉使得一切都不再一样了，你不再是一个悠闲地坐在那里思考制度、价值观、人生、人性和哲学问题的旁观者，你是一个即将被灭绝的种族。这难道还不足以颠覆你所有的知识、理论体系和精神信仰的支柱吗？

记住，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来，再让我们来看一下《2012》里宣扬的那些本来应该让我们思考的精神主轴：你真以为美国总统最后和人民死在一起就是美国精神的胜利？你难道没有发现，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在三年前就知道地球要灭亡，可他们竟然对六十亿的人类保密了三年？地球上现存的哪一个制度和价值观能够为这种行为辩护？

还有，好莱坞电影中永远不变的主题：个人主义（表现为个人英雄主义）在这部电影中发挥到了极致，一位作家用自己的小聪明发现了真相，带着家人不顾一切找到了救命船，并用“开后门”的方式爬到船上，结果给那艘船造成了危害，差一点一船人同归于尽。导演在这里花费大段时间描写这一家人如何一个不少地登上了保命船，最终关上舱门，把毁灭了的地球——以及六十多亿人——关在了外面。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类灾难片的时候，发现在主人翁成功时，观众却并没有鼓掌或者长松一口气，为什么？因为被这位以自己家人为主的个人英雄关在外面的，应该就包括我们这些那一刻就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以及电影院外面的那些人。和以前的灾难片不一样，他不是冒险拯

救我们的英雄，而只不过是我们中比较幸运的一个。

我这里当然不是要推翻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人心、人性这些当今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也是我在争取的东西），我只是想说，当你把一个更加宏大——宏大得超出了我们的知识、想象和信仰的场景搬了进来的时候，你的知识、信念和精神支柱却不足以支持你的故事的场景。于是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地方。

这种不和谐在《2012》中比比皆是，我再举一个例子：电影把制造三艘救命方舟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人，因为“中国制造”已经在世界打响了名头。所以，当美国人看到中国人制造的方舟后，惊叹道，选对了地方，中国人什么奇迹都能够创造。

是吗？就拿“中国制造”来说，中国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大量的下岗工人、在农村已经不太好生存的更大量的农民工，以极其低廉的劳动力，默默工作，制造了“中国制造”，也创造了奇迹。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真要征集那么多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三年造出如此大规模的太空船，除了中国工人，谁与争锋？

可是，本来毫无疑问的事情放到了另外一个我们都感到陌生的场景（世界末日）中，一切都不一样了。请问，中国农民工和低廉的劳动力为啥会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最终在世界打响了“中国制造”的牌子，是因为爱国？还是为了祖国的和平崛起？是为了挽救美国的经济危机？还是为了拯救世界？

如果你到珠三角那些过得并不咋地的农民工中去问这个问题，估计他们会这样告诉你：工作是因为家里没有地种了，制造这些买不起的耐克鞋是因为需要钱买馒头、娶媳妇和盖房子，受这些资本家欺负却“无怨无悔”是因为要活下去、活下去……

不错，不管你怎么样包装，“中国制造”成名的背后，是那么多民众要活下去，要活得更好，所以能够创造奇迹。可是——当他们知道把他们集中起来是为了制造三艘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权贵、精英和各类动物离开地球的船，而完工之日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时的时候，请问，“中国制造”能够完成吗？从人性出发，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完成——像秦始皇修建陵墓一样。

有人要说了，那些中国工人肯定被隐瞒了事实，不过，这并不妨碍普世价值，因为只能用这种方式拯救人类。不错，拯救人类，但记住，在两种人眼里，拯救人类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有信仰、相信上帝主宰一切的人来说，诺亚方舟不应该载着这些被权势和金钱挑选出来的人。对于不相信来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自己和家人、族群的死亡大概与世界末日差不多。至于下个新纪元的人类祖先是各国总统和富翁、精英，还是从土地中慢慢长出来的小虫子、猴子，抑或是上帝重新用泥土烧制的，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这就是世界末日给我们留下的知识、理论和信仰空白，这就是《2012》让我看完后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也是聪明的好莱坞导演很少拿这类超过人类能力的灾难搞娱乐的原因。

谢天谢地，《2012》只是一部商业电影，世界末日看起来不会来了，人类积累的优越的制度、人性的光辉、普遍珍惜与呵护的价值观、智慧结晶的哲学以及人文和宗教关怀还不会受到挑战，更不会随人类一起消失。

可是，如果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人类赖以生存的那些优秀制度、价值观、人性的光辉和智慧的结晶就被挑战，又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有时，不一定要等到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才能体验到末日的乱象……

2009.12.09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黑眼睛看世界　一个民主小贩眼里的世界
作者=杨恒均著
页数=212
SS号=12810822
出版日期=2011.07